

内 112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19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九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封面题字：舒 同

封面设计：马少展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九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875印张 163000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60,000册

书号11310·26 定价1.45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文 献

津浦路东苏皖边区抗日民主政府

- 一年来施政工作总报告(节录) 邓子恢(1)
新四军在抗战烽火中成长着 张鼎丞(22)

访 问 记 录

-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张云逸(33)

回 忆 录

- 浙东四年 谭启龙(39)
新四军第五师的抗战历程 任质斌(63)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公安保卫工作回顾 汪金祥(82)

江淮春晓.....谭希林(104)

日记摘登

《秦蜀日记》(节录).....武志平(113)
对日记的补充和说明.....(158)
附件: (一)杨虎城给武志平的信.....(169)
 (二)孙蔚如给武志平的信.....(171)
 (三)王宗山给武志平的信.....(173)

专题资料

淮南抗日根据地概述.....《淮南抗日根据地》编辑委员会(174)
浙东抗日根据地概述.....浙江省委党史办公室(196)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浙江
.....《抗日先遣队在浙江》征编组(220)

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报.....凌步机(245)

津浦路东苏皖边区抗日民主政府 一年来施政工作总报告*（节录）

邓子恢

各位参议员，各位来宾：

我现代表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向参议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总报告。路东联防办事处是去年四月十八日成立的。当时由各县县长及驻军代表的联席会议产生了路东联防委员会，并由联防委员会中推选了办事处主任。当时推选了六合县长贺希明同志为主任。八月二十日，第三次联防委员会开会，改选我为主任，方毅同志为副主任。我于八月二十五日才接理办事处的工作，同时又因兼任新四军江北政治部主任，事务很多，所以除了工作方针及大的问题亲自会商，及重要的会议参加以外，其余一般工作都由方副主任主持。因此这个报告难免有欠充分的地方。我报告以后，望方副主任补充，并希望各参议员给以批评和指教。

路东联防办事处于去年四月才开始成立，到现在只有九个月，为甚么我的报告说是一年呢？因为还早在这之

* 这里发表的是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四日邓子恢在津浦路东临时参议会上所作报告。

前，津浦路东地区便已有了实际的民运工作。而在前来安县的县长李志成卷款潜逃之后，三月十五日，来安县民代表大会便首先选出了郑县长。同时，就在那几天，嘉山县的抗日民主政府也成立了。以后六合在四月初，盱眙在四月间，天长、仪征、高邮在五月间，淮宝在七八月间，都相继的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民选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事实上是在去年二、三月间开始，因此，我的报告就包括了一年来的工作。

一年来国内形势变化的基本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在相持阶段中，敌人侵华的困难日益增加。抗战已经继续了五个年头，我国愈战愈强，敌人愈战愈弱……

至于我国方面，抗战的力量却更加发展了。以下两个主要的事实便足够说明：第一，我国抗战的主力仍然保存着。四年的抗战，日本企图歼灭我国抗战主力的阴谋完全失败，而且敌后的游击部队如八路军、新四军及地方武装，反而在敌寇的“扫荡”中更加壮大了。不特如此，还建立了许多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使日寇前后受敌，有力的拖住了它的尾巴。第二，国共合作，全国团结抗战的国策，虽然受到了亲日派阴谋家的阻碍，发生投降、分裂的危险，但〔投降、分裂〕到今天还不敢马上实现。在全国军民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意志下，亲日派，反共派投降分裂的阴谋，最后会被制止。就使部分人投降，而中国抗

战局面并不能就此改变。敌我相持，敌更困难，我更发展，这就是一年来国内形势的第一个特点。

一年来国内形势的第二个特点，是敌人政治进攻加紧。正因为敌人军事上侵华的困难增加，所以敌人从武装占领以后，便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而以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次。这不是说敌人放去了灭华政策，而是敌人采用更巧妙的不战而胜的灭华政策。所谓不战而胜的灭华政策就是“以华制华”，就是“诱降政策”。敌人怎样来诱降呢？一方面是以“反共”为号召，来分化中国内部团结，引起国共分裂，瓦解抗战阵线。一方面是提倡“中日提携”，“经济合作”，允许发还被没收之中国资本家的工商业，并实行中日合资营业，以引诱中国大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则是军事威胁与政治引诱：有时高唱三路进攻重庆来威胁我国当局，但有时候却又自动退出南宁、龙州，并声言愿以重庆政府为谈判对手，来引诱我当局去上当。这就是一年来敌人政治进攻更加巧妙，更加恶化的表现。但在敌后则以“军事扫荡”为主，配合以政治欺骗分化政策，企图消灭我抗日武装与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以便大量攫夺我资源，奴化我人民，而遂其“以战养战”的迷梦。敌人的政治进攻更巧妙，同时敌后“扫荡”加紧，这便是一年来国内形势的第二个特点。

国内形势第三个特点，便是一年来反共高潮增长，由不断的局部磨擦发展到内战投降的危险局面。自从前年平江惨案、竹沟惨案、经扶惨案，一直发展到去年路西路东以致（至）苏北的磨擦，然而这还是局部的。到了去年十月

间，形势就更加恶劣，国民党当局用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发出所谓皓电、齐电，要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移到黄河以北去，并调了二十九个师大举向华中进攻。同时，以三十万大军布置陕甘宁边区周围，准备进攻八路军。并构筑五道碉堡封锁线，来封锁陕甘宁边区。在全国大批捕杀共产党员及抗日人士，封闭进步报馆，解散抗日团体，镇压民众抗日民主运动，而全国范围内的国民党军队却与日本军队保持休战状态。这些严重现象，证明什么呢？证明国内形势已由局部的反共磨擦而进到投降内战的局面了。不知者还以为这是国共两党闹成见，以为这仅仅是国共两党的磨擦，与我们无关。这是绝对错误的。因为时局发展到这一步，这不是什么成见，也不仅仅是国共两党间的关系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了。道理非常明白的，中华民族要生存就要抗战，要抗战就要团结，而要团结就首先要国共合作。现在国民党军队不抗日而反共，与日本人及汪精卫起了“共鸣”。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四年来坚持敌后抗战，敌伪军“扫荡”不停，而国民党军队不予援助，反调动大军进攻，与敌人“扫荡”相配合。此种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之举，并不是什么成见，不是什么报复，更不是什么两党关系不好，而是因为有些人要投降了。他们受了敌人的军事威胁与诱降政策〔的影响〕，受了亲日派何应钦等的包围鼓惑，便发生动摇。想中途放弃团结抗战国策，来与敌人妥协，实行其所谓“光荣和平”的迷梦。但他们又不好公开投降，因此便先从“反共”下手，来策动内战。一方面与日本人唱对台戏，求得日本老爷的谅解，另一方

面企图把抗日最坚决最有力的八路军、新四军打掉，除去投降的障碍物，以便利他们将来好大摇大摆去投降，去配合敌人来向中国老百姓大屠杀，大掠夺。所以，一年来的反共磨擦，并不只找共产党磨擦，反共军所到之处，人民遭殃，鸡犬不宁。如现在路西梁园、周家岗等处反共军所到之地，每保民众要派电话线五百斤、报〔电〕线杆子五十根、白米五十担、经费五百元；周家岗等处民间的鸡、鸭、猫、狗都杀得清光，难道这些猪、鸡、猫、狗都是共产党吗？这证明“反共”其名，而残民其实。如果内战爆发，则地方受累更多，而抗战前途更不堪言了。但是亲日派顽固派尽管投降反共，究竟投不投得成，反不反得到，这个把握倒不在反共派身上，而在八路军、新四军与全国抗日人民的身上。一年来路西李本一、颜仁毅辈之失败，与秦庆霖、韩德勤之灭亡，这就告诉他们：共产党与抗日人民是不大好反的，投降是不大容易的。因为今天的共产党与全国人民，已不比十年以前那样的好欺负的了。一年来的反共磨擦，内战与反磨擦的胜利，及全国反投降反内战的高涨，这便是国内形势的第三个特点。

津浦路东所处的环境

津浦路东所处的环境，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津浦路东是处在华中敌后的重要地区，居于南京背后，津浦路南段之左侧，又在江淮之间，有丰富的资源（粮食，牲畜，棉，麻）与广大的人口（三百万）。因此，在中国抗战的战略上，它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

里建立根据地，就等于在敌人背后打下了一个楔子。在今天可以起着牵制敌人的重要作用，而且消耗敌人，破坏其“以战养战”政策，同时兴奋了敌后广大民众及全国抗战军民；将来反攻时，又成为收复南京、上海的最前进〔的〕阵地；而对于我军，在过去是华北与江南联系的桥梁，今天又是苏北与华中各抗日据点联系的枢纽。所以路东根据地便成为敌人、汉奸及亲日派的眼中钉，而为敌我必争之地。这是路东地区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一年来路东是处在敌伪不断军事“扫荡”与各方面进攻的环境中：

（1）敌人在军事上是采取增筑据点，步步为营的渐进办法与大举“扫荡”相配合（如去年九月的七路“扫荡”），企图占领路东地区，摧毁我根据地。

（2）在政治上则采取分化政策，在“反共”的口号下实行“以华制华”：利用汪逆组织和平救国军，并利用地方自卫团、反共青年团、维持会等方式建立伪军、伪组织；利用青红帮、会门组织大民会，而且于军事“扫荡”时，带着敌占区民众到我根据地来抢东西，企图造成敌占区民众与我区民众的对立；策动土匪来骚扰抗日民众与危害行政人员，他却藉剿匪之名，来收买民心；并利用顽固分子（如来安的梁竹荪，嘉山胡明玉等）来进行破坏；敌人在传单上大吹其“反共”宣传，到处宣传只打新四军、共产党，不打老百姓，企图破坏我军民合作，孤立我军，以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总之，敌人在政治上所采取的政策，是挑拨离间，实行分化我内部的团结，分散我力量，以达其

“以华制华”之目的。

(3)敌人在经济上以前是吸引我资源，高价收买我粮食，推销日本货。后来则对我实行经济封锁，禁止布匹、药材入境，并于“扫荡”时大烧大抢，企图摧毁我农村经济。同时破坏我法币，推行敌伪币，企图扰乱我金融。

(4)在文化上则实行奴化政策，散布和平反共救国，共存共荣的荒谬言论。并宣传伪造的三民主义，企图造成顺民心理，消灭我民族意识。在敌占区，更进行奴化教育。同时肆行其毒化政策，推销鸦片、海洛英，设赌兴娼。凡一切足以消磨我人民民族意识，使其萎靡不振者，无所不用其极，很明显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奴化路东造成顺民条件。

(5)敌人不仅公开的向我军事进击，而且还秘密的实行奸细政策。不断派遣男女侦探、奸细、特务工作人员混入我军政机关、民众团体、地方，来进行其刺探军情，造谣惑众，带路，放毒在饮水里，指示飞机轰炸目标等。同时，还有所谓干探政策，这是指比较有教(·)，受过训练的敌探，混入我军政机关，长期埋伏着，进行挑拨离间、分化、破坏，及组织部队叛变，盗窃机密等阴谋。

上述这一切，都是敌人一年来所不断采用来向我进攻的方法。有人说，因为新四军在这里，所以敌人来进攻，烧杀，假使新四军开走了，便可以太平了。这话是不对的。因为这是敌人在相持阶段中加紧对敌后“扫荡”，企图巩固其占领区的既定政策，并不是新四军引起起来的。

敌伪不断的扫荡与用各种方式向我进攻，这是路东地

区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一年来路东又是处在顽固派多方压迫与反共军不断的武装进攻中。且看一年来顽固派在津浦路东西所做〔犯〕的阴谋罪行。

（1）对抗日怠工，两年来他们未打过敌人，与敌人保持休战状态。这不是他们军队打不得仗，而是由于韩德勤、李品仙等高级将领，同时也是国民党当局对抗战动摇，把中心放在反共事业上，怀着恐日病，一味保存实力，自私自利，不打敌人。

（2）武装走私，运粮资敌。不论韩德勤、李本一、秦庆霖等部队都是如此。这是公开的秘密，尽人皆知的事。因此造成去年的严重灾荒。

（3）纵兵扰民，苛捐杂税，层层剥削，摊派频仍；而且迫种烟苗（如路西李本一迫民众种烟苗），贪污中饱，造成民穷财尽。

（4）自己不抗日，反禁止民众抗日（特别是六合的洪家骝和杨月波，竹镇至今还传说所谓洪、杨之乱）。取消抗日团体，捕杀抗日青年，甚至捆绑女同志裸体游行（如李本一在古河之所为）。

（5）公开反共、反新四军、八路军，禁止民众售粮给抗战部队（如李本一在路西对新四军实行经济封锁）。逮捕抗属（连新四军江北指挥张云逸同志的夫人与公子都被其逮去），造谣，诬蔑新四军为“土匪”，为“游而不击”等等。不惜制造一切谎话，作为进攻新四军的借口。

（6）公开武装进攻新四军，屠杀抗日民众。去年三月

以来不断的武装磨擦，都是这些顽固派得意的杰作。不仅进攻新四军，而且骚扰民众。军行所至，奸淫烧杀，无所不为。甚至不惜配合敌伪实行夹攻，丧尽天良，言之痛心。

(7) 密布特务机关，不对外面倒〔对〕内，组织反革命暴动与部队逃亡（如去年七月一日至七日路东各地的暴动，当时秦庆霖、胡明玉等并同时前来进攻），造谣破坏，卑鄙齷齪，无所不为，甚至利用土匪骚扰，企图以此来破坏抗日民主政权。

(8) 实行经济封锁，禁粮入口，置民众因灾荒绝粮于不顾，把抗日区域当做“匪”区（如李本一在路西所为）。

上述这些罪行，不管顽固派主观如何，但实际上则便利敌人“扫荡”，为敌人伪化皖东扫清道路。他们之中有些已经公开投敌，如滁县樊公纯、嘉山胡明玉、来安之梁竹荪等顽固分子，出入于滁城、来安之间，认贼作父，恬不为怪。顽固派多方压迫与反共军不断的武装进攻，这是一年来津浦路东地区的第三个特点。

第四，一年来路东虽然处在敌伪“扫荡”与顽派武装进攻的严重环境中，这是路东困难的特点，但另一方面路东却有另一个特点，就是路东有了进步的、抗日的、民主的力量。依靠这些力量，路东民众进行了胜利的斗争。这是些什么力量呢？

(1) 首先是有了进步的军队——新四军与地方抗日武装。它不仅坚决抗日，而且坚强有力的能击溃任何敌人的进攻，而不为敌人所消灭；它不仅抗日，而且赞助民主，爱护人民，与人民打成一片。这些进步武装正在一天天发

展而壮大起来，成为坚持路东抗战的骨干。

(2)有了进步的党派——共产党，尤其有了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与中共中央的代表胡服同志在这里指导。他告诉我们如何去分析环境，如何去与敌人斗争，如何去领导民众，使我们有了方针，能不断的进行工作，获得了胜利。在一年来的斗争中，路东共产党已逐渐壮大起来了。

(3)有了抗日民主政权，路东地区以前是伪组织充斥，以后又恢复顽固派一党专政；而现在则是抗日民主政权。这个政权与伪组织不同，与顽固派一党专政的政权也不同。它是抗日各阶层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是坚决抗日的，是进步的，而且是民众自己的，为民众谋利益的政权。虽然我们的工作还未做得尽善尽美，但这个政权它是抗日的民主的进步的，则是有目共睹的了。只有这个政权才能动员广大人民去与敌伪及一切反动势力作斗争。很明显的实事：在去年九月“扫荡”时，如果仍是顽固派的一党专政的政权，那末要动员广大群众来配合新四军粉碎敌人的“扫荡”，就是不可能的了。

(4)津浦路东有三百万民众，有足够的资源，有大量的武器，有广阔的原野与有利的地形。这些人力、物力、武力，以前虽在敌伪与顽固派压迫欺骗之下而未能发扬，但在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以后，在反“扫荡”与反磨擦的不断的胜利斗争中，现在已经大部分动员起来了。他们已经表现了自己抗日的意志与抗日的力量。

(5)因此，津浦路东现在已成为华中敌后一个不小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依靠这个根据地，可以生长更大的抗日力

量，予敌伪更重大的打击，缩小敌占区，兴奋华中敌后广大群众与全国军民，直接威胁南京，牵制敌人的更多兵力，以配合全国抗战的坚持。

(6)津浦路东虽处在敌后，但与华中各抗日据点，路西、淮泗、皖北、苏北、江南等地区相连接，与全国相呼应；我们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配合的。

这便是津浦路东的第四个特点。

一年来我们的任务与工作总方针

(甲)根据国内外形势与路东环境的特点，我们的任务是建立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以便长期坚持路东敌后抗战。为什么要坚持路东敌后抗战呢？为的是在此牵制敌人，消耗敌人，破坏敌人“以战养战”的计划；同时生长抗日民主力量，以配合全国抗战，兴奋全国军民，以便使抗战坚持下去；阻止亲日派，反共派，投降妥协阴谋，以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最后胜利。为什么要长期坚持呢？这是因为路东是敌后重地，处在敌、伪、顽三方夹击中。路东有了进步力量，但还不够壮大，而全国反攻又不是马上到来，所以不是一下子所能获得最后胜利，而必须长期坚持，一切都要作长期打算。这就是我们一年来一切工作的总方针。

(乙)正因为要长期坚持路东敌后抗战，而又要能够粉碎敌人的军事“扫荡”与政治分化阴谋，所以我们的根据地不仅要抗日的，而且要是民主的。只有团结各阶层、各

党派来共同抗战，才能长期坚持这个地区。因此，我们要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的政权，就不仅要是抗日的，而且要是民主的，不是一党专政的，不是少数人包办的，而是实行三三制的（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在政权里各占三分之一），要民选行政首长，要有民意机关，要保护一切抗日民众的民主自由，要吸引广大人民来参加政府工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内部团结一致，才能动员最广大人力、财力、物力、武力来长期的与敌伪及亲日派顽固派作坚决持久的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

（丙）因为要民主，要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我们的施政方针便要依据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而不能超过这些原则和纲领。但也不能徒托空谈，象顽固派那样的挂羊头卖狗肉，而是要使之彻底实行，实事求是。从我们的临时施政纲领草案看来，便可知我们是没有超过上述这些原则和纲领的。我们并没有如象那些别有用心之徒所说的这里“赤化”了，实行“共产”了。更没有所谓“违法”，或者破坏“行政系统”。因为我们所执行的是国家的基本法则三民主义，与当前全国所遵循的抗战建国纲领；我们所破坏的是敌伪政权，所摧毁的是伪组织，而不是中国政权；我们所建立的是抗日政权，是孙总理民权主义中所指示的民权主义的政权，是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所说的县自治的政权，而不是工农专政或者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与顽固派政权所不同的地方，只是他们是一党专政，是违反民权主义的，而我们是各党派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

是合乎民权主义的。对三民主义他们是说而不行，挂〔羊〕头卖狗肉，而我们是说了执行，言行一致，实事求是罢了。那些说我们不合法的，破坏“行政系统”的这些话，只证明他们的无耻造谣，别有用心，否则便是他们的无知。

（丁）为了坚持敌后抗战，就不能不与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破坏民主的亲日派反共派作斗争。不管他们主观上如何，他们实际上是帮助着敌人，替敌人伪化路东扫清道路。尤其当此敌人“扫荡”加紧与灾荒严重的敌后环境中，更不容许这些别有用心之徒来破坏。目前亲日派反共派策动反共内战，尤为丧心病狂。我们须动员一切力量来反对这种祸国殃民的反共内战。不制止这种反共内战，要坚持敌后抗战是不可能的，目前路西抗日民主地区的缩小与敌占区之扩大，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上述几点，就是一年来我们施政的总方针。这是为了什么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建立和巩固津浦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以便在此长期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而不是别的。这就是我们一年来工作的总目标。

一年来在工作中所获得的成績

第一，是粉碎了敌人无数次“扫荡”，坚持了路东敌后抗战局面，保护了三百万人民身家生命财产之安全，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在敌人四面八方重重包围的〔敌、伪〕环境中，我们居然能够保持这样一块不大也不小的抗日根据地，不仅不曾被敌人“扫荡”掉，而且还日益壮大与发展

起来；不仅保存了自己的抗日力量，而且还能够不断消耗敌人，给敌人以重大打击。特别是去年九月间，粉碎了敌伪海、陆、空军二万余人的七路大“扫荡”。当时，敌人已经占领了我们的汉涧、半塔、旧舖、竹镇、马集、铜城等重要据点，汪精卫在南京广播大吹其牛皮，说什么“二十万大军荡平路东”，什么“直捣”“共匪”巢穴，什么“军事包围计划已经完成”等鬼话。京、沪及全国的爱国同胞都替我们担忧，但结果被荡平的倒不是我们，而是“皇军老爷”与那些“二鬼子”一个个从路东滚出去。事后总结，敌伪死伤在六百人以上。我们呢？虽然伤亡了二百余人，但却缴获了许多枪弹，收复了一切失地，而且大大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增强了内部团结与民众抗敌经验，兴奋了华中敌后广大民众，推动了全国抗战军民，而敌人则经过这一次大“扫荡”，汹涌而来，狼狈而返，尝了路东军民反“扫荡”的铁拳，一直到今天还在慎重考虑，而不敢再轻易来尝试。

第二，是肃清了土匪，保证了地方的安宁秩序。由于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势力之层层压迫与剥削，路东一向是匪患频仍。特别是南京沦陷以后更是敌伪横行，土匪遍地。流氓、兵痞借端敲诈，市镇上则娼妓充斥，乡间则乞丐塞途，因此造成了路东阒惶不安的局面。不仅一般民众吃亏不小，即大户人家又那个不诚惶诚恐。这确是当时路东社会的大危机。自去年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以来，政府在号召人民抗日锄奸中，联系到防匪问题。成股者由新四军派队扑灭，散匪则由地方青年队、自卫队负责清剿。在政治方面，政府采取宽大政策，号召土匪回家耕田，不咎既往；

在经济方面，厉行改善民生，使人人有工做，有田耕，有饭吃，从基本上消灭土匪来源。一年以来，可以说路东内地土匪已经肃清了。有些地区差不多做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不仅如此，连街上的妓女、流氓，乡间的乞丐也在一天天减少中。人民是过着安定的生活，这也是一个大奇迹。在敌伪统治区与顽固派政权统治区这是永远梦想不到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他们没有“剿匪”呢？不是的，他们是在天天喊“剿匪”，但在另一方面却在制造土匪：租息的加重，捐税的抽剥，衙门的敲诈，兵匪之难分；而敌人、伪军还以枪弹资匪扰民；顽固派及某些为富不仁的分子将武装借给土匪行劫而坐地分脏也不乏人；而贪官污吏，贿赂公行，庇匪不办；军队剿匪更是诬良为匪，借端勒索。大家想想，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官府，这样的军队，有什么法子来肃清土匪呢？结果是民众越穷，地方越苦。俗语所谓“人穷起盗心”，于是狡黠之辈，因饥寒交迫，铤而走险；而被人诬陷之良民更只有走入土匪之一途。这就是旧社会土匪发生的政治、经济根源。一年来路东土匪之被肃清，正由于我们实现了民主，改善了民生，发动了民众，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再加以军事扑灭与政治争取，才获得了今天的成绩。当然，由于我们工作还做得不够，特别是边区政治未能彻底改革，民生未尽改善，又有敌、伪、顽从中策动，纵匪殃民，因此边区土匪尚未能扑灭，内地盗窃还未能完成〔全〕肃清，还需要大家以后更加努力的。

第三，是实现了民主政治，保障了抗日人民的民主自由（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居住、行动等自由），

建立了民选政府民主政治，实现了廉洁政府与民主作风，废除了官僚制度。在社会上禁止了无理压迫与借端勒索的现象。大家讲公道，讲平等，这是数千年来政治上空前的大改革，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雏形。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敌伪统治区与顽固派政权统治区的政治罢！在敌伪统治下的人民，简直是过的奴隶牛马的生活，不仅想〔享〕不到什么民主权利，而且连住家、行路、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每个人住家都要有一张县民证，行路要有通行证，经过鬼子岗哨要磕头敬礼。中国人说话稍为不小心，就会被称为抗日分子抓去杀头。都市中的人民在街上行走常会被流弹所伤。这个流弹一种是抗日分子扑杀汉奸的，另一种是汉奸暗杀抗日分子的。尽管你做中间分子，但流弹是不讲人情的。因此，在敌占区的人民，只好闭门不出，对时事不闻不问。以为这样可以平安无事了，但却有别的麻烦：一遇鬼子查人口的时候，常常半夜三更被军警搜查，动不动就被指为嫌疑分子抓去坐牢；青年妇女们被敌人夜间越墙强奸者更是不敢作声；遇到抽壮丁时，男人更是逃脱不得。被拉去打中国人，打又不好，不打又不行。如果打得不好，替敌人当了炮灰，就等于死了一只狗，还要被人骂为汉奸，落得一身臭名。战时如此，平时生命也无保障，象仪征城门口的故〔？〕事，老百姓不仅要向鬼子哨兵磕头，还要你站着被狗咬，不准你回手。中国人当不得日本狗，这便是敌人统治下亡国奴的悲惨生活。但在顽固派一党专政统治下的人民怎样呢？有没有自由呢？事实的回答，也并不见好得多少。路西就是最明确的例子。在那里

人民同样被拉夫、被鞭打、被强奸，也同样被诬为共产党、新四军而抓去杀头。说话、行动、住家同样没有自由可言，没有公理可说。不过，这里是受的中国人的压迫，而那里是吃的日本人的亏，不同的只有这一点。所以路西人民把顽固派称作“小鬼子”。虽然不可以把顽固派军队当做顽固派头子一样来咒骂，但论其残暴黑暗的行动，则的确是同敌伪区没有什么差别的。在重庆、在西安更是暗无天日。一般抗日青年不仅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不自由，就连看书也没有自由。常常有些抗日青年因购买阅读抗战书报而受警告，以致被绑票失踪。甚至全国有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因批评大后方米价高涨，而被国民党特工人员从演说台上抓下来，送上飞机强迫出国去游历。这便是一党专政统治下的大概情形。从这些悲惨的画图里就可以证明一个真理：只有抗日民主政权，才是中国人民大众自己的政权，才是真正以民为主的政权。只有在这个政权下，人民大众才能得到自由解放，不仅从敌人铁蹄践踏之下的殖民地状况解放出来，而且从顽固派一党专政的半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抗日民主政权下的人民，不仅享有抗日的民主自由，而且自己参加了政权，掌握了政权。人民掌握了这个武器——政权，靠自己来解放自己，靠自己来达到民主，来取得自由，而不是靠着别人来赏赐。这个民主与自由才真正有了保证，也才算是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当然在抗日民主政权下也有些失掉了自由的，那便是那些认贼作父的汉奸和那些拥护一党专政反对民主，压迫人民大众的反共顽固派。这些人抗日民主政府是不给他自由，不

给他讲民主。恰恰相反，对付这些人，民主政府是要实行专政的。因为对这些人如不采用专政手段，让他自由来破坏抗战、破坏民主，那么我们大多数的抗日人民就要失掉自由，而重复过着亡国奴及顽固派统治下的悲惨生活了。

第四，是改善了民生，初步发展了国民经济。在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又处在战争猛烈、兵荒马乱的年头，如果说在敌伪区与顽固派统治区里是工人失业农民破产，那么我们这里倒是工人、农民与一般劳动大众生活改善了。单就食粮来说，去年这个时候路东民众已经是十家中八家没有饭吃，而今年却是十家中八、九家吃饭无忧了；就衣服来说，据确实调查，中心区的民众到去年冬，有三分之二做了新棉衣，三分之一做了新棉被，许多农民买了耕牛，许多农民身边有着几百元以至成千元现款。在敌占区与顽固派统治区是生意萧条，商场冷落，那么我们这里却是工商业日见发达。不论在竹镇、在汉涧、在铜城、在半塔、在吴公铺都是市场上人山人海，道路中车马塞途，商店里货不停留。乡村间的工业、小手工业如织布、纺纱、纸烟公场、纸烟公司等都逐渐开设。如果不是敌人“扫荡”与烧杀抢掠，那么我们的工、商业还要更加发展。在敌占区与顽固派统治区是物价飞腾，民不聊生。但我们这里却相当保持平衡，单拿粮价来说，在南京、上海是一百二十元一担的大米，八十多元一担的小麦，五毛钱一小碗的面，一块〔？〕角钱一斤的猪肉，一块二毛钱一斤的青菜，一块钱十二两的盐。重庆则是三百五十元一担的大米，四块钱一斤的猪肉。西康大米更涨至五百八十

元一担。大别山是一块钱三两的盐。而我们这里就在荒旱地区，最贵的米不过五十元一担，麦子是卅余元一担，猪肉一块钱二斤，盐一块钱二斤半。在敌伪区域，盐米是被日本人统制了，中国商人买卖不得，眼看日本军阀资本家发财。而顽区中，则粮食被顽固派强迫收买。如合肥全椒等处，街上米价涨到五、六十元一担，而顽固派却要老百姓一块钱六升卖给他。无为、舒城、庐江等地民食多被顽固派标封，贱价收买，美其名曰供应军粮，实际则是“武装走私”。李本一，刘子清等在全椒、古河运米资敌，这是顽区中公开的秘密。但在我们这里，政府与军队从不采取统制政策。除了违禁品以外，其余一切都无限制，让老百姓自由交易，公平买卖。在敌伪区域是农村生产逐年降低，荒地日多，生产品不能自给。在我们这里则农村生产已开始增加，荒地日少。去年这个时候，许多老百姓成群结队的在田中挖野草吃，吃芝麻饼，山头上饿死了人。但今年这个时候，老百姓吃豆饼的还未发现，这可见粮食生产已开始增加。如今年能好好动员民众努力春耕，积极生产，则农村生产力之提高与社会经济之日益富裕，民众生活之更加改善，是可以想得到的。这就使我们将储蓄着更雄伟的力量，好去战胜敌人。

第五，是加强了内部团结。如果说，在敌伪顽区域里是矛盾重重，磨擦环生，党派与党派，阶级与阶层，政府与人民，军队与政府，彼此都互相冲突，互相斗争，地方械斗，姓氏不和，那么我们这里则是内部团结更加巩固，阶级斗争日趋缓和，党派磨擦已经消灭，地方民众之间也

表现和谐共居，讲公道，讲和气。观乎民众打官司之比前大大减少，便可证明。这是什么缘故呢？原因就在于实现了民主，改善了民生，大家有饭吃，讲公道，而又大敌当前。在对内和平，一致抗日的大前提之下，就形成了全路东军民之大团结。

第六，是人民文化政治水平提高了。首先是对民族国家更关怀，对敌人、汉奸更仇恨，对抗战更积极，对民主政权更了解，对抗日军队更爱护。而到处抗日歌声更悠扬盈耳。戏剧运动之向上开展，小学教育之普遍于乡间，更可见路东人民文化程度之提高。所谓“衣食足而后知礼义，仓廩实而后知廉耻。”这个古话是正确的。

第七，是兴奋了敌占区广大民众。他们从事实上看到了新四军与抗日根据地民众给敌伪以不断打击，看到了敌伪对抗日根据地的害怕与无办法，看到了根据地民众的生活改善与民主自由，使他们感到抗日有办法，中国不会亡。同时，使他们看到了新中国的雏形，找到了自己解放的出路。因此提高了他们的政治情绪与抗日斗争（性），可以说路东不仅成为我们抗日的根据地，而且成为敌占区民众解放的灯塔。

最后，由于上述这些成绩的获得，可以说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已经打下了巩固的基础。依靠这一根据地，我们可以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可以保卫路东三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可以从此生长出更雄伟的抗日民主力量，更有力地去粉碎敌人的“扫荡”与反共军的进攻，来更加兴奋华中敌后民众，推动他们起来，共同抗战，实现民主，以配合全

国斗争，完成抗战建国事业。因此，我们是有着光明的前途的。但必须认识到，这是长期的曲折的过程，在敌人不断“扫荡”与反共军企图进攻中，可能某些地区变成游击区、敌占区，但在我们不断胜利中，也可能某些敌占区发展成为游击区，再发展成为根据地。因此，就需要我们有更大的努力，与艰苦的长期的斗争，使路东根据地巩固地向前发展。同时，在发展中去求得巩固。如果以为路东根据地就这样太平了，巩固了，这是极其错误与危险的。我们是必须克服这个不正确的观点。

.....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供稿)

编者注：文中疑为错字漏字或多余的字，均用()表示。

新四军在抗战烽火中成长着

张 鼎 丞

一 新四军成立至全部集中的时期

新四军的前身，是中共领导之下的在苏维埃运动中成立起来的武装，是过去主力红军西征时留守在中央苏区的一部分部队。这一部分的部队，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曾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直到全国神圣的抗战爆发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它才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坚定方针下，经过多次的交涉，始正式改编为新编第四军。

从它成立的时候起，即遭遇了很多的困难问题。第一，它与八路军的环境是不同的。当着八路军正在顺利地开赴前线作战的时候，新四军在中国南部还在进行国内和平的谈判。我们在和平谈判中，比战争时候的损失还要大得多，例如在闽南，我们因受骗被消灭了一团的武装，在其他地区也有不少的类似事件发生。这样，使得我们有的指战员，对于集中问题，都不免起一种怀疑，认为我们的部队在没有打日本以前将要被零星地消灭干净，而引起不愿或反对集中的情绪。第二，我们部队所在地及周围的一些反共分

子，因为过去历史所造成的极深的阶级仇恨，因为阶级性决定了的极深的反共成见，以致他们仍继续着企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活动。某些区公所乡联保甲长更表现得无聊。他们用威胁利诱一部分新四军指战员家属的方法，来阻挠和破坏我们部队的集中。第三，是部队本身的困难。最主要的是经过三年最艰苦的斗争，部分的部队发生了疲劳现象。许多指战员的家属被屠杀，被奸淫了；许多指战员的家属因受到各种特殊的压迫和剥削，而感到了生活没有出路，没有办法；许多指战员的家属跟着我们的部队，哭啼着诉说困难问题，生死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怎能不影响到我们部队的情绪呢？其次，向来未远离家乡的部队要开到前线去作战，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但这些困难都被我们克服了，我们终于在四个月的短期间内，将散处在七个省份和四十几个县份内的部队在安徽集中起来了。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任何其他部队所不能做到的奇迹。但我们怎样能够胜利地完成集中的任务呢？这主要的是依靠于：第一，我们的部队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地方的党与部队中的党都能够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第二，有长期的政治教育，部队的主要成份是工农劳苦群众。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各种的革命斗争，他们是一支在革命熔炉中磨炼出的坚强队伍，没有这样的基础，克服困难是不可能的。第三，我们的部队得到了全国进步分子的拥护。特别当八路军在平型关大胜以后，他们更热烈地同情和积极地帮助我们。他们曾对我们的战士以及战士的家属进行了不少的

解释和鼓励工作。第四，我们有经过长期锻炼的坚强干部。他们能够在任何困难条件下不发生动摇，他们能够为了革命忍受任何的苦难与折磨。由于这种坚毅不拔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曾在部队中建立了极深刻的信仰，使得战士们对我们的干部感到比自己的家属还要相亲相爱，使得他们宁肯离开自己的家属而不愿脱离我们的部队。

由于这些条件，使我们能够胜利地于四个月内完成集中的任务。新四军的集中，表现了我们党的一致性，表现了我党中央领导的正确，表现了全党对我党中央的热烈拥护，表现了共产党对民族抗战的忠诚与热情，表现了共产党是能够克服一切困难的，是一个无坚不摧的革命政党。这一切不仅更获得了全国人民与爱国人士的同情与拥护，而且还给予了一些企图破坏与瓦解新四军的分子以有力的回答。

二 新四军的集中 开赴江南战场

新四军集中以后，新的困难问题又摆在我们的前面：第一，因为我们的部队过去是散处各地，没有什么联系，所以，许多指挥员都还不熟识他的战斗员；因为我们的部队，进行了长期的游击战争，所以有些不习惯于正规军的组织与生活；因此，我们要求需要短时期的训练。但这种必要的要求没有得到允许，相反的在集中后的第二天即接到上级的命令，要立即开赴前线作战。第二，我们的武器是不好的。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兵工厂，大部分的枪都使用

得很旧很坏，有的缺少瞄准器，有的长枪锯成了短枪。此外，还有许多土炮、刀矛之类的原始武器；在服装方面也大部是不整齐的。这种情形，使得许多同情我们的人替我们担忧，有些不怀好意的人，对我们轻视和嘲笑。第三，开赴前线的时候，上级命令一切民运工作、宣传工作应由当地负责，新四军不得过问。我们所要开去作战的地区，过去曾受到反共宣传的影响，而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又正在那里进行各种反共的欺骗宣传。这一切使江南一部分民众，对于我们多少有些不了解。同时，我们又不能公开进行群众工作，所以，要使新四军能很快的与群众打成一片，能很快的获得群众的拥护，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第四，我们的部队过去是长期散布在山僻地区，习惯于山地的生活与山地的战斗。但现在所到的地区是广大的平原，是江河错综与湖沼满布的地区，这对于我们部队，是一个新的环境。

在这些条件下，我们要顺利地与现代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现代化军队进行作战，确实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因此，我们应该设法克服这些困难，而且，在我们坚持的努力下，这些问题的大部分是被我们解决了。如在开拔的行军中，我们争取短暂的时间，进行必要的政治的军事的训练；我们抓紧了机会，进行平原游击战的实习，沿途演习打骑兵的战术，练习了游泳划船的技能等等。我们以实际行动，以军队本身的良好纪律，纠正了一部分民众对我们的错误认识，揭破了日寇汉奸的一切造谣污蔑。这样，提高了我们部队的信心，与争取了群众对我们的同情与拥护。

三 在江南战场上一年余来的抗战

新四军开到江南战场后，即直接开始了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战，在一年多中间更遇到了不少的困难。第一，江南战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阵地之一。由于中国的坚持抗战，使日寇速战速决的企图，陷于完全失败，而不得不采取长期战争的方针。要执行这一方针，它就要巩固它的战略据点，加紧欺骗和搜括江南的广大民众和丰富资源，以达到它“以华灭华”和“以战养战”的凶毒目的。因此，它从没有放松过对新四军的攻击与“扫荡”。特别是在武汉失守以后，更增派二师团以上的兵力围绕在新四军的周围，在沿铁路及公路线建筑了坚强的工事，如碉堡、炮垒、铁丝网等。经常实行对我们封锁，包围，袭击和搜索。经常用海、陆、空军配合着向我们作战，企图消灭我们。第二，新四军在江南作战，没有很多的友军配合。从南京失守后，只留有很少的游击队。而这些游击队，如革命叛徒孔荷宠之流，真是“游而不击”，专门欺压抢掠老百姓的，所以江南民众均称之为“小日本”。这种部队对于抗战，对于新四军不仅没有帮助，而且有许多害处。其他的某些友军，部分的对于新四军亦怀有成见。如经常宣传新四军要消灭，捕杀新四军的来往人员等等。第三，江南地形是有利于敌不利于我的。不仅广大的平原便利于敌人新式武器的运用，而且江河交错，对于我们，也有极大的不便。敌人不仅可以经常用军舰轰击我们，而且还可以用决堤的方

法来淹没我们；再加上铁路网、公路网的密布，更使我们感到莫大困难。只要我们一打响了枪，敌人即用有线电或无线电报告，于两三个钟头内就要派大兵从四面来实行包围。第四，我们的活动地区又是特别狭小，这对于游击战争是非常不利的。第五，江南一带是土匪多，失意军阀政客多，各种会门多，烟、酒、嫖、赌多的一个地区，这些人很容易被敌人利用去当汉奸、侦探，而且在事实上也已产生了不少的这种败类。

处在这样的—一个战场，处在这样的一种困难条件下，我们怎样能和敌人作战呢？在有些人看来，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它有最坚强的抗战决心与胜利信心，它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所以它不能，也不会屈服于困难，它相信困难是一定能够克服的。我们的任务，是坚持江南抗战，开展游击战争。要在这当中，来钳制、疲惫和消耗敌人，来配合全国的抗战。根据这种任务，根据主客观的作战条件，我们新四军决定主要的是采取灵活机巧的游击战术。我们认为“积小胜成大胜”是持久抗战阶段在敌后抗战的作战方针，每个小的胜利只要能够消耗敌人都是极有意义的。新四军现在还没有八路军那样的条件来取得较大的胜利。因为我们开一团人，敌人即要来二团人，我们走几个钟头，敌人只须几分钟。

由于我们正确的估计了敌我形势，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所以新四军在一年来，能够克服上述困难，坚持江南的抗战；能够击破敌人多次的三路、五路、九路的围攻；能够粉碎敌人扫荡，或至少能粉碎敌人驱逐我们离开江南的计

划；能够在一年中间获得以下成绩：与敌大小战斗共五百三十次，共打死打伤日伪军六千九百余名，俘虏九百多，缴获步枪二千一百余枝、机关枪一百余挺，击毁汽车一百九十辆、汽船九艘，破坏铁路、电线、公路、桥梁等更是不可计算。其次，摧毁了不少的汉奸政权及伪维持会，恢复了中华民国在江南的政权，证明日寇是无法灭亡中国，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第三，我们组织了群众武装，动员了群众参加抗战。

这些成绩虽然比不上八路军，但在江南那样环境下，这已是很大胜利了。我们怎样能在很多战斗中取得胜利呢？这主要的是由于我们作战多采取袭击的方式，五百多次战斗中大部分是乘其不备，出其不意，进行夜袭。在起初一个时期，日寇轻敌，警戒疏忽，又得不到群众帮助，它的耳朵是聋的，眼睛是瞎的，所以我们经常能获得胜利。但以后日寇得到教训，在各处建筑坚固工事，而且防备森严。这时候我们就常常实行强袭强攻。我们冲进了敌人的据点即发生白刃战，用手榴弹，我们同样能取得胜利，因为怕死是敌人无法克服的弱点。后来，敌人建筑堡垒及地洞等，我们即实行火攻，多次将敌人堡垒烧毁，敌人全部消灭。象这类战斗，我们特别应注意的条件：（一）靠敌情的侦察详细与真确，如何处有铁丝网，有地道，有沟，有伪军等都必须弄清；（二）靠我们的坚定性及刻苦耐劳的精神，要善于隐蔽，在行动时要越暗越好，狂风暴雨的晚间更好；（三）靠动作敏捷，特别是在冲锋的时候，使敌人来不及架机关枪；（四）靠牺牲的决心。由于新四军具备着这些条件，

所以在袭击中几乎每次都能取得胜利。我们的死伤从没有一次是超过敌人的，特别是在芜湖附近的官陡门的一次战斗，是最标准的一次远袭击。根据敌人的地形与兵力，看来我们好象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敌人不仅有四面坚强的堡垒封锁着的地点，而且四面还有湖有河川，敌人不仅有很多的伪军，而且附近还驻守有大量的日军。但我们终于取得了胜利，半点钟内全部消灭了伪军二百余，俘虏六十名，而我们则只有三个轻伤的。此外，小部队的袭击也能发生很大的作用。如有一次我们只派了一排人去扰乱南京雨花台，敌人不断的开了一夜的机关枪。有一次我们计划袭击南京飞机场，虽是没有完全成功，但使得敌人五十余架飞机在空中旋飞了一整晚，二十余架坦克及许多的机关枪也乱开乱放了一整晚。其次，伏击也收得一些成绩，但比较困难一些，这主要的要靠我们能够沉着和耐苦。最后，讲到我们有时也受到敌人的包围和袭击，这时候靠我们勇敢的冲锋，靠我们小部队独立作战的机动性，靠我们服从命令执行命令的坚决性。由于我们能够这样，所以新四军不仅没有被敌人消灭，而且反能以小的损失，获得较多的胜利。

四 新四军与江南民众的关系

新四军能够克服困难，能够获得以上胜利，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有广大民众的同情与拥护。这种同情与拥护是怎样得来的呢？在这一方面，我们也遭遇着不少的困

难：第一，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残酷镇压，用残杀那些与新四军来往的家属，甚至焚烧整个村庄的野蛮手段，来威胁群众；第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汉奸的欺骗政策，在一部分群众中发生了某些影响，如抢甲村的财产，把东西分给乙村的群众，进行抚慰难民等；第三，我们经常在和敌人作战的环境中，很少时间进行民运工作；第四，最困难的是我们受到限制，不准我们公开做民运工作。这些条件虽然使我们的民运工作受到一些限制，但我们一年来仍然有很大的收获。我们是怎样去进行这一工作的呢？

第一，我们用实际行动来揭破敌人的造谣欺骗，我们真正秋毫无犯的严明的纪律给予了群众以很大的影响。如果没有这一点，纵使你口头上说得怎样好，群众也是不会相信你的。第二，我们用实际的战斗的胜利来宣传群众。如我们抓住俘虏，即用不着召开群众大会，群众也会集拢起来看俘虏，问问怎样捉来的；这时候就可以讲许多抗战问题。第三，我们与当地党政各界协商，在他们的允许下进行抗战宣传工作，或是共同筹备纪念大会。第四，我们过年节时驻在老百姓家里也请老百姓会餐，使军民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这样，我们不仅帮助建立了各种性质的民众团体，如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农民抗敌协会、妇女抗敌协会、工人抗敌协会、青年抗敌协会等，而且动员了几万几十万的民众去进行破坏铁路公路等工作，武装了几千民众直接参加抗战，激起了群众对我们自愿的各种帮助，如守卫放哨，帮助我们抬伤兵收容伤兵及收拾战场，帮助我们侦察消息，

经常送给我们慰劳品等等。有一次我们的一个指挥员被打死了，全乡几千的民众自动给他举行了公葬，而且还有许多流泪的。有一次一个农民被日寇强迫带路去打新四军，他藉口到屋里取东西，秘密地告诉了他的老婆然后才去带路，等到达目的地时新四军早已离开了。因为他的老婆请人飞跑地来报告我们了。这类的例子实在举不胜举。不仅这样，而且还有许多父送子，妻送夫或兄弟父子同来加入新四军的。如果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参加新四军？则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道：“因为新四军好啊”。我们再说“别的军队也抗日呵”，他们则举出许多实例来证明新四军好。不管我们怎样说，他们的答复总是“还是你们好啊！”不仅这样，甚至还有向来仇视共产党及新四军的某些资本家，也在各方面来帮助我们。如在某地的一个资本家，曾赠给我们几架机关枪和许多捷克式的步枪，还去募大批捐款给我们。

五 总 结

新四军虽然还是一个不大的部队，但它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指战员的努力下，在江南广大民众及全国先进同胞的同情与帮助下，已经在不断地克服困难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了。并且在一年余的抗战中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胜利地完成了它“坚持江南抗战，开展大江南北游击战争”的基本任务。新四军的胜利，告诉了全国同胞，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力

求进步，克服分裂、投降的危险，那末，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新四军的胜利，告诉了全国同胞，要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必须加紧团结和力求进步，一切破坏团结及阻碍进步的分子在实际上是削弱抗战力量和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新四军的胜利，告诉了全国同胞，抗战中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我们努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在克服困难中可以增强自己的力量，增强全民族的力量，来最后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新四军的胜利，告诉了全国同胞，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是最坚决抗战的一支力量，是最彻底执行命令及忠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它揭破了一切反共分子对新四军的造谣污蔑，给予了一切怀疑新四军及企图瓦解新四军的分子以有力的回答。新四军以后将一本既往方针，在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下，在抗战统帅的指挥下，坚持大江南北抗战，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而奋斗到底。这是我们可以昭告于一切关心新四军的人士以及全国人民的。

（原载《解放》杂志，1939年第83期21—24页）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张 云 逸

新四军成立后，我在皖南军部担任参谋长。当时，党组织在大别山有一个工作委员会，书记彭康，不久就改为鄂豫皖区党委，郑位三任书记。新四军在江北有一个第四支队，是由两支武装合并组成的：其七团和九团是高敬亭领导的原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八团是周骏鸣从河南竹沟带来的原桐柏山游击队。

我过江以后，把庐江、无为一带我党领导的游击队合并成立了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孙仲德、政委黄岩、政治部主任桂蓬。

一九三九年五月初，军长叶挺到江北来视察，于五月五日在庐江东汤池宣布成立江北指挥部。由我担任江北指挥部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时在延安），邓子恢担任政治部主任，赖传珠担任参谋长，统一领导新四军江北部队。七月，以四支队的八团为基础，又成立了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副司令周骏鸣、政委郭述申。五支队是我们独立自主搞起来的。

* 根据一九六〇年张云逸同志谈话记录整理。

抗战初期，江北的地方党和新四军的关系是平行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地方党受长江局领导，军队受皖南军部领导。一九三七年以后，由于上海、南京失守，不少青年学生从城市撤退到农村，要求武装抗日。如果我们当时向敌后发展，这是一个最好机会。但是由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强调发展武装要经国民党批准、承认，因此，虽然发展了一些武装，但都不是新四军领导的。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的，并不需要国民党承认，国民党也不会承认的，只要群众承认就行了。我到江北后，便将四支队九团、挺进团和游击纵队恢复起来，并扩大了游击纵队。但王明、项英主张精兵主义，说一个支队只要两个团就够了。当时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也说：“你们没有钱。兵要精，不要多。”在这点上，右倾机会主义者与国民党的观点是一致的。我曾当面驳斥廖磊说：我们的力量并不是多，而是少。你为什么要往大别山，而不到安庆、合肥去呢？蒋介石为什么要到四川，而不到上海、南京去呢？这是因为你们的力量不够，怕鬼子打！由于东南局负责人什么都讲合法，怕破坏统一战线，所以皖南军部的武装一点也没有扩大。

在江北时，国民党无理扣减我们的弹药，我们就搞税收。还办了一个教导队，把干部训练一月或半月后就放出搞武装。我们武装抗日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虽然是国共合作抗日，但国民党始终是想消灭我们的武装力量的。我们要求得生存，磨擦是一定会

产生的。我当时与东南局负责人争论说：我们现在之所以有磨擦，是国民党欺侮我们力量太小，什么事都还要向廖磊请求。如果我们的武装发展到十万人，那时国民党就不敢与我们闹磨擦了，什么事情还要反过来请求我们，不然他的省主席就当不成。

党中央的指示是要我们向敌后大力发展，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根据地。但东南局负责人却要一切通过国民党，向国民党要委任状，不执行中央向东发展的指示，硬要把已到苏南的部队调回皖南。当时国民党为了割断新四军和八路军的联系，命令我们皖东的四支队和豫皖苏边区的彭雪枫的六支队调到江南去。廖磊还无理限制我们皖东部队只准在津浦路东西三十里之内进行活动，企图借刀杀人，让日本鬼子打我们。当时我们没有接受国民党这个命令。针对这种右倾错误，毛主席有过指示：对国民党不合理的命令，要进行抗议，不仅中央可以抗议，哪个军队都可以抗议。我曾故意对廖磊（廖磊当时兼二十一集团军司令）说：如果我们与鬼子打仗败了，你当司令也不光荣。

以国民党的面目来进行革命，大革命时期我们搞过。但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搞表面的政治宣传工作，不敢争取领导权，同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结果使大革命失败。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的正确方针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达到团结的目的。王明只讲团结，不讲斗争，这是重复陈独秀的错误。他们害怕

破坏统一战线，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他们不了解抗战是全民的要求，不是少数人的要求。为什么蒋介石在表面上也要抗战？因为他们也懂得，不抗战人民会起来反对他。毛主席说过：人心向背，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当时华中比华北的发展机会好，完全可以在华中敌后大力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但由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没有这样做，失去了在华中发展的最好时机。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底刘少奇同志来到皖东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才开始得到纠正。少奇同志来之后，传达了党中央的正确指示。说服了地方党，批评了王明的“苦力政策”，指出不发展群众，不发展武装，不建立政权，做国民党的工具是极端错误的。少奇同志还指出，要抗战，一是要有枪杆子，二是要有“家”——建立根据地，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他还向江北的广大干部介绍了华北工作的经验，从而扭转了局面。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鬼子约有两、三千人向我们发动“扫荡”。江北指挥部把四支队全部兵力调上去反击敌人“扫荡”。我们的装备虽然比较差，但因为在战斗中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战术，战士们作战又勇敢，所以最后在全椒县周家岗一带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并乘胜追击到古河。在鬼子“扫荡”开始不久，驻古河的国民党专员李本一的部队都跑掉了，我们占领古河后，李本一才敢回来。这一仗是随少奇同志从延安来皖东不久的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徐海东同志指挥的。此战政治影响很大，给群众的

印象很好，群众从国民党部队和我们新四军对鬼子“扫荡”两种不同的态度上认识到：新四军是真正打鬼子的抗日部队。

这一仗以后，在少奇同志领导下，我们在皖东地区进行了发动群众，扩大军队等一系列工作。邓子恢同志当时说：我们就是要发展“人、枪、款”，我认为是很对的。革命就是要建立武装、建立根据地，才能有立足点。自从少奇同志来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后，皖东的抗战局面才彻底打开。我们江北党和军队的同志都一致拥护以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原局的正确领导。

一九四〇年春天，国民党桂系军队在淮南路西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调第四、第五两个支队主力在路西反击，从藕塘打到定远，先后建立起定远、凤阳、怀远、滁县、全椒、合肥、含山、和县等县政权。当我在路西反磨擦斗争正激烈进行之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以十个团的兵力进攻来安县半塔；在这里，我方仅有五支队一个教导队的兵力。但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顽强坚持了一个星期。后来路西的主力调到路东支援，陈毅也派叶飞、陶勇部队赶来配合，打垮了韩德勤的进攻。这一仗是建立淮南抗日根据地决定性的战斗。战后，在路东先后成立了嘉山、盱眙、来安、天长、六合、宝应、仪征等县政权。自定远、半塔自卫反击战以后，李品仙再不敢轻易向我发动进攻。

各级政权建立以后，立即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当时天长县我们有个乡长被地主杀死了。因为这关系到新政权

能不能站住脚的问题，我们对反动地主武装进行了坚决镇压，把地主武装暴动迅速地压下去了。

经过减租减息，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群众组织扩大了。有了自己的政权作依托，很短时间内，新四军武装力量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打开了华中抗日的新局面，在淮南津浦路两侧广大地区建立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淮南抗日根据地》编辑委员会供稿)

浙东四年

谭启龙

一、从皖南到上海组织闽浙皖赣 四省联络站

一九四〇年春，我从苏皖区党委调到皖南，担任中共皖南特委书记。过了一段时间，东南局曾想要我带一个电台到浙南去，同刘英一起进到龙跃那里，准备建立新的闽浙省委，由刘英负责，我做他的助手。后来由于那时浙江省委在金华的联络处已不存在，交通线被封锁，我没有去成。这年年底，也就是皖南事变的前夕，我患了病。这时，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正准备北撤，组织上要我转道上海去治病，不要跟随部队一起行动。我便离开皖南，由南芜县委的李友白护送至芜湖，再经南京去上海。

皖南事变爆发时，我正在上海治病。不久曾山、饶漱石等一批批突围到了上海。大约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中旬，突围到上海的同志先后分三批由驻沪办事处护送去苏北，我于二十日左右离开上海，与我同一天走的有饶漱石和曾山。我们三个人去苏北途中，在苏中区党委停留了两天，然后到盐城。

大约在一九四一年二月三日或四日，刘少奇和陈毅找我谈话。谈话的中心内容：一方面是指出顽军反共已经达到高潮（指皖南事变），蒋介石还想把我们主力从江南赶到江北，再从苏北赶到黄河以北，有一个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另一个方面，日本侵略者想乘这个机会集中力量对江南，包括苏北四分区和浦东在内进行大规模“清乡”。估计我新四军在江南大规模武装坚持有困难，可能大部要北撤，在江南只能留下一部分武装坚持。由于新四军军部、东南局的电台和通讯设备都丢光了，华中局和几个省委的联系都中断了。根据上述情况，他们对我说，华中局有一个设想，准备成立一个江南区党委，要我当书记，任务是以苏中为依托，向江南伸进。

不久，我正在苏中一师师部开会，研究组织区党委事宜。突然，刘少奇、陈毅发来电报，说华中局决定不成立区党委了，要我以上海为中心，建立一个闽浙皖赣联络站，任务是打通华中局与这四个省的党组织的联系。这个联络站有五个人，由我负责，其他四个是涂峰、周一光、戈冰，还有一个叫施琼，我当时名义为四省联络员，涂峰他们是政治交通员。

我们到上海后，同江苏省委取得联系，我们的生活、住宿和看病，都是由江苏省委安排的。他们也经常来看我们，王尧山、沙文汉、刘晓则较少出面。四省联络站成立之后，首先要取得与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的联系，我们分成两路，一路是涂峰从陆上去，一路是周一光从海上去。涂峰在温州和刘英联系上了。其次，戈冰到皖南去，他到了

屯溪，没有联系上，同福建建立了联系。后来福建省委曾镜冰曾派交通来浙东，由我们的电台把他们的报告转送给华中局，又将华中局对他们的指示由交通带回去。

二、从浦东到三北，建立 中共浙东区党委

大约是一九四一年五月下旬 华中局打电报给上海，江苏省委转交给我，要我到苏南去找谭震林。那时他们正活动在无锡周围的澄、锡、虞地区。我爱人的家乡在无锡，我就利用这个关系，与严永洁和涂峰三个人到谭震林那里去接受新任务。我们先住在严家，刚好谭震林和江渭清他们的司令部驻在离严家十里路的寨门，遂即去寨门会见了谭震林。

我见到谭震林后，他讲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和任务。他说：一个是蒋介石搞的反共高潮还未过去，顽军还在苏南加紧部署，日伪在苏南的“清乡”活动已经开始。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六师的主力大部分有离开苏南到江北去的可能性。另一个是日本侵略军已经打通了宁波至杭州一线，杭甬路以北是沦陷区，我们已派了姜文光的五十多人的武装去进行侦察。据他们侦察的报告说，三北地区比较空虚，我们去了能够站住脚。谭震林还说：浦东敌人已开始全面“清乡”。我们在浦东有武装力量，一个是连柏生部队，他是国民党的区长，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党员。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一支武装，叫“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在

浦东那里活动。这支武装实际上是我们党领导的，里面有几个人到我们这里来训练过，林有璋、蔡群帆就是到教导队学习后派回去的。还有一个张席珍，是上海巡捕房的，他也同这个部队有联系。第二支是党派朱人俊去工作的伪军十三师丁锡山部队的五十团，朱人俊在那里面发展了一些党员，掌握了一部分武装。谭震林介绍了这些情况后说，浦东有个工委，这个工委由路南特委领导。路南特委由顾德欢任书记，姜杰、吕炳奎、金子明等为委员。他说决定将路南特委、浦东工委包括伪十三师五十团里的关系都交给我，有两个任务：一是以浦东作为跳板，设法向南发展，开辟浙东的抗日游击战争；另一是浦东的敌人要“清乡”，部队要做好向南转移的准备，以保存力量。谭震林当时没有明确给我任何组织和名义，就是指派我去完成这个任务。并把顾德欢在上海市区住家的地点和一些具体情况都告诉了我，叫我去同他接头。现在来看，我就是特派员的样子。原来我负责的闽浙皖赣四省联络站也没有撤销。

我们回到上海后，即和顾德欢接上了关系。以后，我首先在上海法租界一个公园附近见到了连柏生，谈了十几分钟。第二个见到的是吕炳奎，他汇报了浦东工委在伪十三师工作的情况。第三个见到了朱人俊，他汇报了部队到三北庵东一带活动的情况，以后和姜杰也见了面。朱亚民（当时叫诸亚民）、金子明都未见到。从此以后，我知道派到三北那里去的武装可以站住脚，三北的同志要求增派部队去。

据我了解，浦东第一批武装到浙东三北去，是谭震林

决定派去的。蔡群帆和林有璋他们去三北，是我同顾德欢还有吕炳奎在上海顾德欢家决定的。

当时由浦东南进浙东的武装，除了我们直接掌握的连柏生部队外，还有在伪军十三师五十团中由我党控制的由林有璋、朱人俊率领的一部分力量。他们去浙东以后，三北的武装力量增加了。我们在上海研究，决定成立浙东军分会。军分会领导成员是吕炳奎、王仲良和蔡群帆，书记是吕炳奎，统一领导已进入三北的部队。派他们去的目的，就是要想方设法取得与地方党的联系。他们去了以后，开始与宁（波）绍（兴）地方党的王文祥、戚铭渠、张光等有些联系。

林有璋他们带去的武装，还是用连柏生的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的名义，用这个旗帜去开展统战工作。当时三北地区有个薛天白的宗德指挥部，属国民党第三战区，林有璋以同是第三战区的淞沪游击队的部队的关系和薛天白拉上关系，名义上归他指挥。后来又和淞沪游击队第一支队顾小汀建立了关系。他们还结交了几个地方上比较开明的上层人士，有慈北的虞家芝、虞在璋，镇北的朱祖燮等人。由于与这些人搞好了统战关系，所以我们在三北的部队开始没有暴露。我们的部队纪律严明，同国民党部队不一样，在相公殿打了一仗，真正打了鬼子，所以在群众中影响很好。

由于我们的部队与地方党建立了横的联系，与群众已有了联系，这样，我们就在三北基本上站稳了脚跟。这段时间，我仍旧在上海。

一九四二年二月间，设在温州的中共浙江省委机关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破坏，省委书记刘英等一批同志被捕。刘英的爱人丁魁梅和林尧来到上海，同组织上取得了联系，后来见到了我。我就把这一情况立即报告给华中局。华中局回电，指示我们设法同龙跃打通关系。我到浙东以后，曾代浙南特委与华中局用电报联系过几次。

一九四二年五月，浙赣战役爆发后，中共绍属特派员杨思一和吕炳奎等商议，为了争取时机，决定从三北派一支部队（南进支队）去会稽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由蔡群帆带领。南进支队很快就在诸暨方面站住了脚。

以上是我从接受任务到去三北以前这段时期的情况，约有一年的时间。

一九四二年五月底或六月初，我离开上海到了浦东，在海边找到了连柏生。根据华中局的决定，经研究决定，我和连柏生、张席珍还有一个青年王荣桂同去浙东。六月间，我们带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由南汇上船，在古窑浦登陆。登陆后即与吕炳奎、林有璋会合在一起。这时，蔡群帆已率领南进支队到会稽地区去了。我们到浙东后不久，顾德欢也到浙东来了。

我们去的最初任务：第一是熟悉地形，了解情况；第二是统一部队党的领导关系，包括连柏生的部队和朱人俊的部队；第三是同地方党宁（波）属特派员王文祥、绍（兴）属特派员杨思一正式取得联系。我们还从杨思一那里知道（天）台属地区的党组织还存在，但杨思一与它也没有联系，光知道是刘清扬负责。以后，又找到了定海的王起。

这样，就把地方党的关系联上了。

我初到浙东的时候，浙东军分会由吕炳奎、王仲良、林有璋、连柏生几个人组成，公开对部队实行统一指挥。我公开身份为连柏生的秘书，化名胡志萍。我来浙东以后，不再直接和谭震林联系，是通过新四军军部派驻上海的杨斌与华中局和一师粟裕联系的。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八日，我在浙东敌后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还有浙东区党委《关于坚持浙东敌后长期斗争的决定》，都是传达贯彻华中局的指示精神。当时的环境不允许我随身带什么文件，只能凭脑子里记忆的东西作了口头传达和说明。

我们从一九四二年六月到七月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把浙东的情况摸清楚后，向华中局发了一个报告，要求华中局增派军事人员来。因为当时的部队缺少真正懂军事的负责干部。何克希、刘亨云、张文碧、罗白桦、余旭、张季伦、张浪、戈阳等就是华中局接到我的报告后，决定派来浙东的第一批人。何克希等到浙东和我们会合后，即正式成立了浙东区党委。区党委开始由我和何克希、顾德欢、杨思一四人组成，我为书记。不久，华中局对所属各区党委作了全面调整，浙东区党委改由我和何克希、张文碧三人组成，我仍任书记。一九四三年九月底，华中局同意我们增补杨思一为区党委委员，要他多注意地方党的工作。

根据华中局关于坚持灰色隐蔽的方针的指示，我们打算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用“三北游击司令部”的名称，把国民党在三北的顾小汀、魏显庭等武装统一起来。并根

据华中局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二日的指示，准备争取顾小汀当司令，我方何克希、连柏生为副司令。我们同顾小汀谈了好多次，他还是不肯干。于是决定我们自己搞，叫做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由何克希（更名何静）当司令，连柏生当副司令，刘亨云当参谋长，张文碧当政治部主任，余旭为参谋，叶清达做文书，司令部就这么几个人。我对内来讲是政委，对外还是叫“胡秘书”。部队统一整编为三个支队，定名为三支队、四支队、五支队。这个司令部是在鸣鹤场成立的，时间是在区党委成立之后不久。

我们建立了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以后，在浙东形成了统一的领导。我们还将宁绍地方党也作了调整，分别建立了四个地区级的工委，即三北工委、四明工委、三东工委和会稽工委，还继续领导浦东特委。不久，这些工（特）委都改成地委。

从浦东武装南进，到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的成立，可以说是浙东抗日根据地建立的第一阶段，也可叫做准备阶段，组织力量的阶段。

三、坚持三北、挺进四明， 开辟浙东敌后根据地

在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基本上在三北地区活动。我们连续打了几次胜仗，在群众中间的威望越来越高。三北地区基本上为我所控制，各地的办事处（是政权性质的）也都建立起来了，以三北

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基本上形成。

我们的声势大了，对敌伪的威胁也大了，于是日本鬼子就在三北增加了据点，进行“扫荡”。国民党也开始发现我们是新四军、共产党，想加强对四明山的控制。国民党慈溪、余姚县政府的部队加强了对姚江南边一带的防备，企图阻止我们向南发展。这时浦东的敌人也加紧了“清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鸣鹤场开会研究，确定了战略方针，即坚持三北，开辟四明，在完全占领四明山后，再争取控制会稽山。准备去镇海、定海方面发展沿海一带的游击战争。那里原来有王起、钱铭岐、陈子方等领导的一支小武装。为了使浦东这个基点不致丢掉，决定派朱亚民带十一个人，带短枪（木壳和快慢机）回去坚持斗争。这个部署确定后，我们在三北进行了反“扫荡”战斗。杨葛殿一仗打得好。鬼子来袭击，我们司令部和四支队居高临下打死打伤敌人好几十个。就在那天晚上，我们转移到游源，按原来的部署分开行动，我们往南渡姚江向四明发展。

当时刘亨云和张席珍等带领五支队在三北坚持斗争。我和何克希、张文碧等带司令部与四支队渡过姚江，先到十五岙，然后到石门，遇上慈溪国民兵团打了一仗，把它打垮了，一直追到芝林。这样，我们就解放了陆家埠、杜徐、袁马、左溪和芝林等姚南、慈南的一部分地区。不久发展到翁岩一带，并与鄞西的严式轮和林一新保持了联系。林一新部是由我党掌握和领导的国民党鄞县郭青白部第六大队。慈溪国民兵团被我们打垮后，就一直逃跑到鄞西靠奉化那一边去了。朱之光在我们开辟四明地区中起了相当

好的作用。朱之光的父亲朱祥甫老先生是一个国民党的乡长，朱之光通过他父亲的关系，在姚南开展了统战工作。另一方面国民党余姚县国民兵团肖文德和区长陈恩寿还控制梁弄。我们首先团结他们抗战，如果他们搞磨擦反共，就根据自卫的原则消灭他。所以，实际上从鄞西鄞江桥一线以西的四明山区，都为我们所控制。

当时，国民党暂编第三十师八十八团田岫山，八十九团张俊升，因为三战区暗杀了他们的师长，对国民党不满，率所部先后进入敌后，在章家埠、下管建立他们的据点。这两人也同我取得联系。那时，田岫山部以下管为中心，张俊升部以章家埠为中心，日本鬼子和伪军则在沿江一线。我与敌、伪、顽形成三角斗争的形势。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为阻止我军南进，令艾庆璋的忠义救国军自海北向南进攻，企图把我们消灭在三北海边，于是我们被迫进行了浙东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区党委当时研究，要在浙东建立根据地，必须巩固与坚持三北，决心集中力量消灭艾庆璋。所以把南进支队、诸北八乡自卫大队都调回来，和三、四、五支队一起，全部集中到三北，投入反顽自卫战斗。我们采取穿插分割，各个击破，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术，结果消灭了艾庆璋部二千多人。这次战役主要打了三仗。第一仗胜山战斗，首战告捷，歼灭了张立民的忠义救国军特务大队和顽军金山县自卫总队五百余人。接着黄家埠战斗，我们也取得胜利。艾庆璋率领所部逃到谢家塘靠近华盖山那边，我们又组织力量给予歼灭性打击。后来又打垮了顽军平湖县自卫总队，

并俘获顽军平湖县自卫总队总队长谢友生。艾庆璋率残部忠义救国军第八支队王八妹部逃到小越伪军据点里。我们又攻打小越，消灭了他五百人。艾庆璋最后刮掉大胡子化妆逃生。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取得了巨大胜利，三北地区除了日、伪几个据点外，全部为我所控制。

这时的四明根据地，由四明地委书记王文祥、副书记罗白桦率领少数武装在左溪一带坚持。

在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中，我们通过统战工作，争取了三北的顾小汀、魏显庭，还有孙运达保持中立，这也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

这中间，还有一个何克希“单刀赴会”，会见田岫山的故事。有一次，我们从芝林、陆家埠向梁弄挺进途中，得悉田岫山因不满国民党对他的排斥和歧视，决定投降日寇。何克希带参谋张任伟及警卫员等几个人，赶到三七市，劝阻田岫山不要去宁波投敌，同我们联合抗日。当时区党委认为这样做太危险，对他们的安全很担心。何克希虽然对田岫山劝阻未成，却安全返回。后来，日本人要田部驻在周巷对付我们，但田仍同我保持来往，结果他杀了日寇官兵几十个，反正到下管、许岙。何克希又一次去下管和田岫山谈判，订立了互不侵犯协议。张俊升则比田岫山进步些，他向我们靠拢，还要我派干部去。当时我们与田、张的统战工作搞得不错，田岫山也曾到梁弄来和何克希谈判过。我们派黄源，金乃坚、俞菊生、马婉青等去田部工作。派王文祥、金子明、俞德丰等去张俊升部工作。由于争取了他们两部的中立，使我们在四明和三北地区稳定了一个

时期。

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的胜利，使部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区党委缺一批中层干部。于是华中局又接连派来了两批干部，加强了组织建设，提高了部队素质。这时，区党委的机构逐步建立起来，顾德欢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杨思一为组织部长兼会稽地委书记，朱人俊为敌工委书记，方晓协助他。敌工委主要工作对象是伪十三师和杭州、宁波、余姚等城市的敌伪军。以后曾派柯里去杭州建立地下党的组织——杭州临时工委。丁公量是区党委兼部队政治部的保卫科长（后来由邱子华接替）。另外，五支队改由王胜当支队长，邱相田当副政委兼主任（后来汪志华当主任）；三支队由余龙贵当支队长，林有璋当政委。这时力量大了，每个支队有两个大队，每个大队有三个中队。

这时，区党委在杜徐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我們到三北以后，经过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进入四明这一阶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讨论了浦东的问题。当时敌人在浦东“清乡”，浦东武装和干部基本上已到浙东。我们经过讨论决定了今后的方针，就是坚持浦东，巩固三北，发展四明和会稽。另外，还研究了部队要向正规化发展，进行整军训练。

这时，几个地工委已改为地委。王仲良为三北地委书记，黄知真为地委组织部长。陈洪接替王文祥为四明地委书记。三东地委由吕炳奎、王起等三人组成，书记是吕炳奎。后来，吕炳奎兼任海防大队政委。王文祥调任区党委城工委负责人。城工委成员还有原来负责保卫工作的丁公量和王

起、王槐秋。会稽地委，杨思一为书记，马青为副书记。那时海北工委也归浙东区党委管，由刘明负责。区党委后来曾派一支武装去海北，金子明也去帮助过工作，因为站不住脚又回来了。区党委还于一九四三年五月派王平夷、郑嘉治、李一群等去金华地区，和金属特派员接上了关系，是同陈雨笠、江征帆他们联系的。由杨思一与他们保持着联系。

那时，我们已与台属特派员刘清扬建立了联系。后来我要刘清扬、林光他们来到了三北根据地。顾春林从狱中逃出来后，也到了四明山。以后我们又同浙南特委取得了联系。在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以前，浙南特委的交通郑加顺和龙跃的爱人王琳芳都到了三北。我们同浙南党组织有过三、四次往来。华中局委托我们与浙南特委保持联系，但是，我们同浙南特委没有领导关系。

建立三东地委时，吕炳奎、王起他们想挺进定海，建立海岛根据地。他们到了宁波，打算从宁波进定海，结果进不去。后来，一九四四年八月间，区党委同意吕炳奎、张大鹏组织一个连队，打算经大鱼山岛挺进定海，结果被敌人发现，打了一天。血战大鱼山岛，去的人大部壮烈牺牲，只有小部分人突围出来。

为了保持同苏北交通联络，我们组织了一个海防大队，政委是吕炳奎（初建大队时由何亦达任教导员），大队长是张大鹏。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对付土匪张阿六、王八妹等部；第二，维护海上交通，输送干部，保持浙东与浦东、苏北的联系；第三，输送军用物资，保障军队供应；

第四，保护税收，开辟海上经济来源。海防大队在这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一九四三年二月下旬，当我们在芝林的时候，华中局派了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张凯来到浙东，传达华中局的指示。华中局指示的精神，是要我们作好配合盟军登陆浙东沿海的准备，加强部队整训，积极向南发展。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实际上没有执行这个指示。张凯来到四明山住了一段时间后，沙文汉又来到四明山芝林。他传达的是华中局饶漱石意见，主要的精神是估计盟军登陆浙东后可能出现的情况，要我们把部队分成数股，插到天台山、会稽山、浙南等地去，留下少数武装坚持四明。我们分析当时浙东的实际情况，认为要看整个形势发展之后再定。华中局还要浙东部队尽量坚持灰色隐蔽的方针，不要急于公开新四军的旗号。另外，要我们建立一套秘密组织，以备万一武装斗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能够坚持地下党的斗争。

当我们在三北进行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的时候，伪军乘机占领了梁弄。所以，当我们一九四三年春再次挺进四明后，就决定攻打梁弄伪军据点。拔掉梁弄伪军据点后，我们就顺利地开辟了以梁弄为中心的四明山根据地。区党委和司令部都迁到横坎头，部队进行整训，提高军事素质。建立了教导大队，先后由蔡群帆、唐炎、张浪负责；建立党训班和党校，先后由谢飞、涂峰负责。提出部队正规化，一个支队实际上就是一个团，力量更大了。在这时期，林一新大队也拉出来，三北、四明两个自卫总队武装起来了，

定海五大队也来会合了。

到这时候，我们巩固了三北地区，建立了四明根据地，坚持了会稽地区的斗争，取得了浦东反“清乡”斗争的初步胜利，浙东的局面基本上已经打开。以上也可以说是第二阶段。

四、坚持四明，巩固三北，浙东 敌后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到了第三阶段，国民党第三战区命令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副总司令竺鸣涛组织天台前进指挥部，首先派贺钺芳的挺进第三纵队由北庄进占唐田，并要田岫山的挺进第四纵队、张俊升的挺进第五纵队联合向我进攻。我们一再通电呼吁制止内战，团结抗日，可是顽固派置若罔闻，疯狂地向我大岚山阵地进犯。我们被迫进行了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当时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争取田、张中立，集中力量消灭贺钺芳部于北溪。军事上作了如下部署：以五支队（主力）在蜻蜓岗建立正面防御工事，阻止贺钺芳部从正面进攻，而以三支队出击大俞。开始田、张也表示中立。但是田岫山很快变卦了，占我梁弄，抄我后方，把我后方南黄、茭湖等地的兵工厂、印刷厂等等都破坏了。当蜻蜓岗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时，张俊升却从侧翼向我进攻。我两面受敌，只好撤出战斗。三支队在大俞也打成一个相持战。不久，发现贺钺芳部已进至东西岙，于是我们下决心奔袭贺部，发起东西岙战斗。这一仗打伤了贺钺芳，击

溃了贺部主力，但我们三支队和警卫大队也伤亡很大。战斗中我们指挥部所在的山头被敌发现，顽敌组织兵力冲上来。当时何克希、张文碧和我只带了一个警卫班和几个警卫员，大家一起冲击，一阵手榴弹，把敌人压下去。接着，刘亨云带了部队赶到，我们才得以脱险，到了峙岭。这时田岫山正好从鄞西来，拟经大岚山回许岙去。我们决心就在蜻蜓岗伏击田部。本来应该是打歼灭战，结果也只打了一个击溃战，田岫山逃到许岙去了。他们躲进碉堡，我们没法消灭他。不久，田岫山见我们重返梁弄，竟下书要我们让出梁弄，退至龙坑、南庙一线以东，限三小时内答复，否则即以武力解决。我们当时即回信给田说，条件可以商量，但如必欲武力解决，不妨听便。信去后我们从梁弄移驻横坎头，筑起了防御工事。次日田、张率领部队来进攻，他们兵力分散。我们晚上出击，把他们打跑了。这就是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的第一阶段，主要打了三仗。

这次反顽自卫战争的第一阶段没有打好，没有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消灭贺钺芳的主力，主要是不应该打阵地战。以主力五支队来防守，分散了兵力。同时，对田岫山等的反动性认识不足，没有估计到在战斗的紧要关头，会遭到他们的突然袭击。

这时，根据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我们公开宣布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并任命何克希为司令员，我为政治委员，刘亨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

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中，我们把贺钺芳部打垮以后，顽方下狠心动用主力，调来全部新式装备的突击营第一纵

队三千多人，从仙居、天台、新昌经奉西到四明山，采取步步为营，向我进攻。同时，田、张也与他们配合。突击营一进来就占领了北溪、唐田，与田部的驻地下管、张部的驻地章家埠联成一线。我们根据掌握的情况，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一口一口地吃掉它。但突击营鬼得很，不分散行动，不好打它。于是我们决定避强打弱，先消灭张、田。这个方针是对的，群众也欢迎。我们先打章家埠，顺利地占领了制高点章家埠，可是它的几个大碉堡没有打下，张俊升率部逃过曹娥江以西，我们只占领了曹娥江以东一线。这一仗没有消灭张俊升部，于是我们经上虞回师梁弄。后来我们又第二次出击章家埠，并渡过曹娥江向西追击张俊升部到会稽地区，缴获了张部一批弹药，始渡曹娥江东返，回到杜徐、袁马一带休整。这时我们得到情报，知道田岫山进占了梁弄以北的前方村，决定集中三支队、五支队和金萧支队等部兵力，打前方村，消灭田部。由于不了解国民党的突击营尚在田岫山的附近没有撤走，当我们向田岫山部发起攻击的时候，突击营增援田部，我们没有力量阻击，结果这一仗没有打好。

前方村战斗之后，我们还想再打一仗，经过研究认为没有条件再打了，于是决定由刘亨云带五支队、警卫大队和四明自卫总队在四明坚持，区党委、司令部带三支队和教导大队经芝林、石塘渡姚江去三北。我们经过同顽军和日、伪战斗到达了三北。不久，刘亨云率五支队一部也来到三北。

四明山区多少英雄儿女没有战死在抗日的沙场上，却

牺牲在反共顽军的枪口和刺刀下。坚持鄞西斗争的鄞江区委书记李敏（女）等五人，各被顽军连戳二三十刺刀，壮烈牺牲。樟蜜区长徐婴受尽酷刑，被顽固派剖腹挖心，残酷杀害。五支队四中队转战至鄞西后杜桥，遭到顽军突击纵队第五营勾结日、伪军的四面围攻，全体指战员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英勇奋战，除二十多人血战突围归来外，陈行知、毛明孝、肖张等四十三名指战员均壮烈牺牲，表现了人民军队的英雄气概。

一九四四年六月初，日本侵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在浙江发动了第二次浙赣战役，金（华）、兰（溪）之敌再次攻陷龙游、衢县等地，并企图打通温州、丽水一线。国民党在天台山受到威胁。同时日寇又对四明山区进行“扫荡”，国民党突击营就撤退南下，这次反顽自卫战争不久即告结束。

当顽军主力撤出四明山后，我们又从三北回来，主力集中在以梁弄为中心的一带地方，进行休整和补充，并恢复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这时，控制奉化东西岙的土匪王鼎三、单孝升（即小白脸）部三、四百人，与我们建立了联系。经过我们派陈山等做工作，在一九四四年底把王部争取过来，拉上四明山。后来该部编入四支队。这时四明根据地又扩大到嵛（县）新（昌）奉（化）公路以北地区。

在金（华）萧（山）地区，杨思一、马青、陈雨笠等领导的部队在对敌斗争中得到发展壮大。区党委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决定，将金属党组织与会稽地委合并，组成金萧地

委，杨思一任书记。并将该地区武装统一编成金萧支队，蔡群帆任支队长，杨思一兼政委。不久，彭林的独立大队也从国民党那里拉了出来，编入金萧支队。

朱亚民回浦东之后，搞得很好，部队发展成为一个支队（淞沪支队），游击区从浦东发展到了浦西。一九四五年初，华中局派陈伟达来当淞沪地委书记，顾复生来当淞沪专员。

与此同时，浙南邱清华、周丕振的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建立后，他们派人来四明山同我们联系，我们报告了华中局。华中局指示他们北进括苍山，和台属特委联成一片，建立一个以括苍山为中心的据点。一九四五年春，我们派了余龙贵去永乐总队负责。

在浙东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发展的情况下，一九四五年一月，区党委召开了浙东人民临时代表会议，成立了浙东行政公署，通过了施政纲领，连柏生任行署主任，吴山民任副主任。我们还召开了浙东临时参议会，开明士绅如三北的毛契龙、虞家芝，慈南的李纪佑，梁弄的邵之炳，还有鄞西、金萧、浦东的一批乡长和士绅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当议长，郭静唐、何燮侯为副议长。这样，浙东抗日根据地内的统一战线从组织上形成了。

反顽战争前后，郭静唐曾两次受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派遣，来四明山同我们谈判。第一次是一九四三年六月第二次反顽战争开始之前，浙江当局企图实行政治解决。但提出的条件我们不能接受，没有结果。第二次是在一九四四年夏第二次反顽战争结束之后。黄绍竑通过陈沛

派郭静唐找我们。郭把陈沛的部署和兵力都告诉了我们，说陈要我们同他合作。我们要郭静唐再回去做陈的工作。可是他第三次来，知道了国民党的意图，并非真心要同我们合作，于是下决心不回去了，就在四明山参加我们部队的抗日斗争。

接着，中央指示我们向西发展。这时苏浙军区在粟裕指挥下已在浙西打了几个胜仗，准备组织部队由叶飞率领南下，同我们会师，向南发展。我带了三支队一部和一个电台去金萧路西接应他们。去时我们在绍兴新桥头与顽军绍兴县自卫队一个营遭遇。这一仗打得好，把它消灭了，缴获了轻、重机枪。当时，场口以北的中埠是我南下部队预定渡江点。贺钺芳的挺三纵队一个护运大队驻在这里。我们决定消灭它。这个大队经激战后逃走了。我们占领了中埠，迎接主力部队从汤家埠过江。过江来的是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十一支队，我们与之在场口与富阳之间的中埠会合。苏浙军区并派张翼翔（新任浙东游击纵队副司令员）等来浙东工作。十一支队和我们一起活动了一段时间，不久，为了赶赴新登东北十里处配合作战，就过江回去了。我们也率部返回了四明。我们中途从路西回到诸暨时，与杨思一、何文隆等会合，住了几夜。在那里，我们曾与诸暨著名的开明人士、当过北大第一任校长的何燮侯等开了座谈会。这期间留在四明的部队，对第三次投敌的田岫山发起了“讨田战役”，攻占了他的老巢许岙，消灭了田部，解放了浙东第一个县城——上虞。田部被消灭后，张俊升投向我军。新四军军部决定张俊升部编为浙东游击纵队第二旅，

并任命张俊升为纵队副司令兼第二旅旅长。原第三、四、五支队编为第一旅，由张翼翔副司令兼第一旅旅长。

这时，会稽和四明基本联成一片，浙东和浙西互相呼应，形势大好。到这里，可以说是第三阶段结束。

五、抗战胜利，全军北撤

我们在浙东四年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是处在敌、伪、顽夹击的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曾被迫进行了三次反顽自卫战争。我军四年多来，与日、伪军作战，大小战斗六百多次，歼灭日、伪军九千余人。浙东新四军健儿在对日作战中，谱写了一曲曲胜利的凯歌。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后，我党中央连续三次发来指示，这是中央的三次战略决策。第一次指示，命令我们以一部兵力进占宁波，另以一部兵力配合苏南、苏中主力，接收上海。这时，陈伟达他们已到了沪西，朱亚民部已打到上海市郊区附近；何克希带了一部兵力，一直挺进到宁波城下；我们集中在三北的主力，也准备过江进占上海。这时，国民党从峨嵋山上下下来，抢夺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内战危机十分严重。我党中央来了第二次指示，说国民党已空运军队抢占了上海，同时由浙赣路北上的国民党部队，也已到了杭州、海盐、海宁等一线。由于这个情况的出现，中央估计我浙东的部队很难北上。决定要我们主力准备南下，与浙南武装会

合，开辟闽浙赣根据地，而留少数部队坚持四明、三北、金萧的游击战争。当时，我们决定由何克希率领张俊升的二旅在浙东坚持，我率领张翼翔的一旅（三、四、五支队）南下与坚持浙南斗争的永乐总队会合，并准备以张翼翔、余龙贵为正副旅长，我为政委，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刘亨云为参谋长。我们刚部署，并拟派一支小部队先去侦察，中央第三次指示又来了。叫我们全部北撤，留下少数精干武装秘密坚持，限我们七天作好准备。因为重庆谈判已取得协议，所以中央下令南方八个根据地的部队全部北撤。于是我们集中到上虞，在县城（丰惠镇）开了会。

这次会议决定：第一，决定刘亨云和张翼翔率领五支队封锁钱塘江口和杭州湾，集中全部船只，并电请苏中派船南下。当时党、政、军干部和战士共约一万五千人，没有大批船只不行。结果，船调集了不少，机关人员和部队都过去了。第二，留下精干的短小武装，带一部电台在浙东坚持斗争。决定刘清扬、邢子陶，还有朱洪山、朱之光、陈布衣、陈爱中等留下坚持。由刘清扬带一支小武装和一部电台，在四明山秘密活动。凡白区城乡的地下党组织和活动，统由邢子陶负责。金萧地区则留下马青等负责。第三，所有公开人员和武装部队，全部撤离浙东。少数病、弱人员不能跟部队走的，经由宁波去上海，再往苏北。第四，后方的印刷所、兵工厂、伤兵医院等，统归朱洪山、黄明负责，建立公开的留守处，由朱洪山、黄明分任正副主任。并由何克希写信给宁波的国民党专员俞济民和原在天台的“绥靖指挥部”指挥陈沛，说明我们新四军浙东游击

纵队按党的和平民主方针决定北撤，留下人员要他们保护安全。第五，决定由顾德欢起草发布一个《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姊妹书》和发表通电。第六，决定将抗币限期收回，用粮食和现金兑换，以免根据地人民受到损失。第七，还有一条规定，就是估计到国民党来了后会搞白色恐怖，我们的党员可以参加过帮助新四军工作的群众团体名义“自首”登记。

北撤的路线基本上分三路：我与顾德欢等带区党委机关人员、教导大队、警卫大队先走，由古窑浦下船，在奉贤登陆，渡黄浦江至青浦的。张翼翔带四支队跟在我们的后面走。何克希带五支队和后勤机关、银行人员为一路，由临山北渡，至澉浦打了一仗，过沪杭路至青浦。张俊升带二旅比何克希先走，也是过澉浦的。原定经澉浦通过沪杭路到青浦会合，途中因情况发生变化，而改道至浦东，坐海船直到苏北。张文碧、刘亨云和杨思一带三支队、金萧支队为一路，完成掩护任务后才走。我们北撤部队最终在(青)浦西重固镇、观音堂会合(缺二旅)。在那里集中休整了几天，中共上海市委曾来人慰问过我们。在上海的美国人，还有其他不少人，都到观音堂我们那里来参观，还一起拍了照。然后，我们继续北上。

我们北撤途中，有两次损失。一次是澉浦战斗，伤亡较大。另一次是张俊升旅到海宁、海盐后，中途走散了一些人，其中还有一个参谋长徐学道投敌。其他各路部队都没遭到什么损失，顺利到达目的地。我们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和华中局交给的历史任务。最后武装人员在苏北涟水

整编，一旅编成第一纵队第三旅，二旅和余上大队编成独立第一旅。

涟水整编后我们兼程北上。那时中央决定要挺进东北，我们一纵三旅也要去东北。但当我们到达临沂时，天气严寒，渤海湾已封冻，船过不去。同时国民党军队已抢先空运到东北，占领了重要城市。结果，我们就留在山东了。

(吕树本整理)

新四军第五师的抗战历程

任 质 斌

新四军第五师是我党在一九三八年日寇占领武汉、全国抗战转入相持阶段的艰难时刻才着手在鄂豫边区创建的。

鄂豫边区原是革命老根据地。这里的人民经过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洗礼。红军长征后，这里又是南方八省游击区之一，“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之一。这里的人民群众有优良的革命传统，有武装斗争经验。

五师部队的前身，是以个别红军排、少数红色便衣队员和党中央先后派来的百余名红军干部，以及党的地方组织与散处在边区的共产党员，通过发动群众和利用统一战线关系，组织起来的一支支小游击队。这些游击队逐步汇合起来建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扩建为豫鄂挺进支队、豫鄂挺进纵队，最后扩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像“滚雪球”似的“滚”起来的。她是一支土生土长的人民军队。

五师在抗日战争中的战斗历程，前后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冬。这是准备与发动阶段。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太原失守。以后，南京、徐州又相继失陷，日寇步步进逼武汉。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数十万大军，节节溃退，国民党各种机构土崩瓦解，国民党溃军到处乱丢武器。一块钱，一套便衣，甚至一碗稀饭，就可以换到一支枪。

徐州失守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时指示长江局，在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这一地区，要把广泛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军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当作中心任务；动员住在城市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在农村发展党的组织。但是，由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束缚和影响，当时长江局在武汉虽然做了发动群众的工作，但没有拿更大的力量去组织武汉周围的游击战争。虽然也派了一部分人员到农村去工作，但没有强调独立自主地去掌握武装，所以，有些地方的党组织怕“破坏统一战线”，不敢组织武装，甚至不准所属干部收集国民党溃军丢掉的武器。有些搞起来的武装片面地追求利用国民党的“合法”地位，而没有对国民党保持必要的阶级警惕。有些地方，党组织虽然搞了武装，却由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而被国民党“吃掉”。这样，就使我们党错过了在鄂豫边区大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良好时机，同时，也给了鄂豫边区各地的牛鬼蛇神以招兵买马的机会。一时间，牛鬼蛇神都抓起了枪杆，自封“司令”。“司令”多如牛毛。这些“司令”大多数后来成为民族敌人和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然而，鄂豫

边区的党组织，並不是完全都处于上述的那种状态之中。部分地区的党组织和领导同志，在实际工作中，不同程度的抵制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因此在豫南、鄂中、鄂东、鄂西、鄂南的部分地区，燃起了武装抗日的烽火，为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和五师部队的创建，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豫南确山竹沟镇，是我党发动和组织中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支点，是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驻地。党在这里以新四军八团队留守处的公开名义，在豫南各地进行了广泛的抗战动员，建立了地方党组织，开办了各种训练班，培养了大批干部，开展了统战工作。特别是放手发展了武装并陆续派赴敌后，展开抗日游击战争。在信阳地区，党争取和支持了国民党信阳县县长，组织起信阳抗日挺进队，协同党所领导的七十七军军士训练团，在信南四望山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鄂中的党组织通过民主人士的关系，在应城的汤池举办了农村合作事业人员训练班，实际上是我们党的干部训练班。训练了三百多个进步青年，为抗日游击战争准备了干部。接着以应城党所控制的八条枪为基础，通过进步的应城县县长，组织起应城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应抗），在应城地区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孝感中和乡的共产党员，和本地爱国青年一道，赤手空拳，收集国民党溃军丢下的武器，组织了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在当地建立了小型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鄂东党的组织，在黄冈以红色便衣队加上所收藏的七

条半枪为基础，积极搜集国民党溃军丢下的武器，动员党员、积极分子带头参军，组织了鄂东游击挺进队（以后改为独立游击第五大队），並在黄冈建立了一块根据地。新四军四支队驻黄安（红安）七里坪留守处的一个警卫排，加上黄陂地方党所组织的梅店自卫队，组成了新四军第六游击大队，在黄陂、孝感、礼山（大悟）边界，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上述我党所发动和组织起来的武装，为新四军第五师的成立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第二阶段，自一九三九年初至一九四〇年冬。这是部队由小到大，从分散到统一的阶段。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重申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长江局，成立了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原局（以后改为华中局）。刘少奇同志南下，坐镇华中，从此华中的抗战局面为之一新。鄂豫边区的抗日战争，也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鄂豫边地区的党组织所面临的局面是：敌人已在沦陷区遍设据点，並大肆搜罗民族败类，拼凑伪政权，组织伪军；国民党也利用其社会基础——反动封建势力，或在其龟缩深山的数十万正规军的卵翼下，组织反动地方武装，或采用“曲线救国”办法，投降日寇，充当伪军，妄图恢复其反动统治。把沦陷区变成了人间地狱。当时，我们党所发动和组织人民抗日武装，还十分弱小和分散。一九三九年一月，党中央和中原局派李先念同志带领一百六十多人（包括干部六十多人）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从河

南竹沟出发，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四月间，又派陈少敏同志率二百余人向鄂中敌后挺进。李先念等同志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届六中全会胜利闭幕后，从延安动身到鄂豫边区之前，毛泽东同志和少奇同志指示他们，到鄂豫边区的任务是：“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是武装”。为了打开武汉外围敌后抗战的局面，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创建一支党直接领导的足以打开局面、承担这一地区战略任务的人民军队。

一九三九年六月，先念同志率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绕道鄂东，联系了那里党的组织及其领导的武装后，到了鄂中。陈少敏同志也率部到达鄂中。这时鄂豫地区的形势十分吃紧。国民党五中全会为准备妥协投降而制订的“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已在这里付诸实施。一九三九年四月，国民党解散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成立的进步力量占优势的统战组织——鄂豫边抗敌工作委员会。五月，国民党军队吞并了我党发动和组织起来的人民抗日武装——铁道破坏大队。六月，国民党制造了“平江惨案”。而在鄂中，当新四军的旗帜刚一出现，蒋介石即电令新四军军部和五战区当局，说什么，鄂中非新四军防区，必须撤走，否则“以武力解决”。与此同时，国民党三青团和鄂中专署，则阴谋策动原我党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武装——“应抗”第二支队李又唐部叛变。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在这关键时刻，鄂中区党委召开了养马畈会议。李先念、陈少敏、杨学诚同志领导了这次重要会议。会议当中刘少奇同志发来电报，指出：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短

时期内创立一支五千人身上的、党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任务，才能应付各种事变，确立我党在鄂中的地位。会议根据中原局刘少奇同志指示，决定整编豫南和鄂中党的武装，统一打出新四军的旗帜，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养马畈会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一经建立，所属四个团队在统一战略部署下，高举着抗日旗帜，深入鄂中、豫南、汉水和淮河两岸敌后，广泛而勇猛地展开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团队在大别山北麓的罗山县朱堂店首战告捷，一举歼灭了日寇八十余名。九月，一团队在二团队一部的配合下，严惩了前来鄂中京山新街镇“扫荡”的日寇，打得敌人弃尸数十具，突围逃窜。与此同时，我军还抓紧时机，消灭鄂中孝感、应城等地的伪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两天一夜的时间，全部解决了叛军原“应抗”二支队李又唐部三千余人。从而树立了军威，振奋了群众，使应城、云梦、孝感地区的几块根据地联成一片。四团队还飞越汉水，一度攻克汉阳蔡甸镇，痛击伪和平救国军九十二师熊光部，把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燃烧到武汉近郊。鄂东的第六游击大队也以少胜多，全部击溃了伪和平救国军第八军李汉鹏部。十月，刘少奇同志再次到达竹沟，作了应付突然事变的部署：由朱理治同志率领驻竹沟的豫鄂边区党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共六百余人，迅速转入鄂豫边区敌后，只留少数部队在竹沟坚持。朱理治率领的这支部队是抗战初期我党我军挺进到鄂豫边区敌后最大的一支骨

干队伍。

一九三九年九月，国民党蒋介石在日寇诱降和英美劝降下，更加加紧推行反共政策，作为投降日寇的准备。九月一日，国民党反动派在鄂东制造了“夏家山事件”：国民党桂系军队一七二师两个团，纠合鄂东地方顽军程汝怀部，围攻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十一月十一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竹沟惨案”。

为了统一党对这一地区的领导，党中央和中原局决定撤销鄂豫皖、豫鄂、鄂中三个区党委，统一成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新的豫鄂边区党政军领导人，于十一月在四望山召开会议。根据党中央和中原局决定精神，研究了具体部署，把鄂中、鄂东、豫南三个地区党领导的武装统一整编成六个团队，建立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同志仍任司令员，朱理治同志任政治委员。另由陈少敏同志任区党委代理书记，主管地方党政工作。

对于豫鄂挺进纵队能够在第一次全国反共高潮中诞生，中共中央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一经验证明，一切敌后地区，我党均可建立武装部队，并可存在与发展，其先决条件是地方党要有组织武装的坚强信心，要有不怕与顽固派磨擦的勇气与意志。中央还对纵队的活动方针，及时作出指示说：挺进纵队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一时还不能与八路军、新四军取得地域上的联系。因此，必须努力扩大自己，务求扩大到四万人枪。主要发展方向是鄂东。要加强根据地和游击队的工作，建立民主政权，分别建立农民、青年、妇女救国会。尤其重要的是建立自

卫军，还要发展党。军队工作必须发展与整军交替进行。要在武汉等敌占区建立秘密党的堡垒，要加强对周围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实践证明，党中央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纵队创建不久，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五日，日寇千余，附炮三门，在飞机掩护下，“闪击”我领导机关驻地——京山马家冲，妄图一举毁灭我指挥武汉外围敌后战场作战的神经中枢。经过抗击以后，敌人的进攻被打退了。

国民党鄂东专员、鄂东游击队总指挥程汝怀的二万多地方顽军，继续依附桂军，勾结敌伪，破坏抗战。他们在围攻我党在鄂东的武装——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后，进一步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并残酷摧残我地方党组织，成为开展鄂东抗日游击战争的积极破坏者。纵队为了配合兄弟根据地击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反击程汝怀部对我党我军的猖狂进攻，并牵制进攻我新四军第四、五支队的桂军，从一九四〇年一月至四月，李先念同志指挥纵队主力，曾三次出击盘据大、小悟山的程汝怀部，歼灭了他的第十九纵队的部分有生力量，为开辟鄂东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纵队的另一部高举着抗日旗帜，以机动灵活、跳跃回旋的英勇姿态，于二月中旬飞越汉水，初战汉阳侏儒山，进击伪军汪步青部，直叩武汉门户，使武汉敌人戒严三天。

五月，日寇集中了六个师团的兵力，对鄂西北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了一次战役性进攻，以压蒋介石投降。六月一日侵占襄樊，六月十五日占领宜昌。根据形势的发展，

为了牵制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改善我军在鄂中的阵地，扩大回旋地区，纵队主力于六月回师路西，进军白兆山和京（山）钟（祥）以南山区。七月进军襄（河）西，八月进军天门、京山、潜江边界地区，并于七至十月在白兆山腹地，胜利地粉碎了日寇对平坝镇的三次进攻，给敌人以重大的杀伤，使其企图在大洪山的支脉——白兆山安上钉子的阴谋被粉碎了。

在我党正确政策的影响下，汉阳伪中国人民自卫军两个旅于八月十三日反正，参加我军抗日。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部队发展与整军交替进行”的指示，充分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军工作，边区军政委员会于八月份召开了军政干部大会，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集中地反对了干部思想作风上的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等不良倾向，从而使边区的部队从思想上真正地达到统一，保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贯彻执行。这在新四军五师的建军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在这一阶段中，边区随着武装斗争的开展，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也迅速地开展起来。一九四〇年一月鄂中根据地的基本区内开展了民选运动，改造或重建了乡、保政权。同年九月，召开了第一次军政代表大会。会上按“三三制”原则，成立了全边区的最高政权机关——军政联合办事处。十月，召开了边区财经会议，试发了流通券。民兵与基干队的组织纷纷成立。文教事业亦大力开展。这年秋收之后，信阳和应城还进行了减租减息试点工作。

至此，边区已扩大到十几个县的范围，建立了九个县

的民主政权，部队也从一支支分散的游击队，发展为拥有一万五千人的游击兵团，民兵发展到约十万人。

第三阶段，自一九四〇年冬至一九四三年冬。这一时期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是边区我党我军坚持敌后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也是部队和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与扩大的阶段。

从一九四〇年十月起，国民党蒋介石发动了以消灭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为目的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一年一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中央军委及时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决定将华中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其中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第五师。在迎击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暴风雨中，我师在挺进纵队的基础上，边作战、边建军。四月五日，全师组建完毕，师长兼政委李先念同志在白兆山中通电就职。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第四师由豫皖苏边区转移至皖东北，鄂豫边区的地位更加突出和孤立，敌、顽、我三角斗争也日益尖锐化。日寇虽然为了迫蒋投降，在边区周围发动了几次对正面战场的战役性进攻，但其经常性的活动则是对边区进行频繁的“扫荡”、“清乡”和“蚕食”。国民党军队多次伸入边区，某些顽军更进一步与敌伪勾结，联合对我。我军遭到空前严重的敌、顽夹击。与此同时，边区由于遭受敌、伪、顽长期的掠夺和破坏，特别是一九四〇年与一九四一年连续发生了旱灾，五师部队遇到了严重的财

政经济困难。因而，这一阶段边区的斗争处于十分艰苦紧张的境地，我党我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但是，鄂豫边区的人民和五师的指战员们，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五师诞生后便以崭新的战斗姿态，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加强了对敌斗争。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和解决部队的财政困难，五师于一九四一年六月进一步开辟了直逼武汉近郊的汉（汉阳、汉川）孝（感）（黄）陂地区。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二月，我师选择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武汉日寇兵力减弱的有利时机，向敌后作战略展开，以相当兵力南下汉川、汉阳、沔阳地区，发起了侏儒山战役。我军三打侏儒山，每战皆捷，歼灭了驻守在这里实力最强的伪定国军第一师汪步青部，解放了武汉西郊的大片国土。侏儒山战役震动了武汉，给予武汉人民以极大振奋，也给予武汉日寇极大的威胁。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开始进攻浙赣线。为牵制日寇的新进攻，我师又以一部兵力从鄂东跨越长江天堑，挺进鄂南敌后，打开了鄂南抗战的新局面。这就扩大了我军的回旋地区，创造了从南线战略包围武汉的敌后战场。同年十二月，日寇以三师团全部、四十师团和伪一师一部共万余人，附炮八十余门，分十四路合击“扫荡”我大小悟山，企图围歼我豫鄂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我军趁各路敌、伪军尚在运动之际，连夜分数路向平汉路西和陂安南等地区突围，粉碎了日寇的万人大“扫荡”。一九四三年二月，为配合鄂西正面战场作战，牵制与打击日寇，扩大我敌后抗日根据地，我军又进军襄南，进一步从西线推进对武汉的战略包

围，发展河、湖、港汊地带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以老苏区洪湖为中心的襄南敌后根据地。在此基础上，我军进一步向湘北敌后发展，于十一月挺进到洞庭湖滨和桃花山地区，开辟了湘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反顽斗争方面，边区我军首先配合全国粉碎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坚持了鄂中、信南等基本区，继续发展了襄西地区。而且在大小悟山建立了边区的指挥阵地，打开了鄂东局面；並一度与战斗在皖西的新四军第七师部队取得了联系。一九四一年九月至十一月，当桂顽第七军三个师及地方顽军大举向皖东新四军第二师地区进犯时，我师遵照军委命令东进鄂皖边，从战略上策应了兄弟部队的反顽斗争，並且发展了鄂皖边地区。当鄂东桂系势力与程汝怀的矛盾激化时，我军就利用这一矛盾，对程汝怀各部队进行了广泛的争取工作，以孤立桂军。当程顽依附桂系疯狂反共时，我军则果断地还击了程汝怀部队，于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三月先后进行了浠水、广济、蕲春漕河镇等战斗。一九四二年五月至十二月，更是风狂雨暴的八个月。在这八个月里，国民党五战区对我全边区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先后投入进攻边区的兵力，计有十二个正规师、四个保安团、十一个游击纵队和五个独立支队，人数达十万之众。顽军还无耻地勾结日、伪军向我夹击。面对这种严重的局面，我们确定了“咬紧牙关，熬过困难”，沉着应战，坚持自卫的方针。首先对深入根据地的顽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然后主力以运动战相机歼灭反共而孤立的顽军。五师的主力部队十三旅，转战四方，配合各军分区部队给顽军以歼

灭性打击。其中八月底至九月初的礼北战斗，我军歼灭了保安第四旅旅部及两个团，该旅旅长蒋少璦、三团团团长刘亚卿、礼山县县长钟锦德等均被我俘获（战后将其释放）。军部首长曾来电嘉勉这一战役的胜利。经过八个月的生死搏斗，虽然我白兆山、天汉湖区和襄西等地一度被敌、顽侵扰，但边区我党我军不仅没有被顽军的“清剿”所消灭，反而在战斗的烈火中又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是新建立了鄂南敌后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三年三月，蒋介石发表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这是他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信号。接着，他就一面酝酿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闪击”延安，一面部署进攻其他解放区。五月，他亲自下令以国民党五战区部队主力，与鄂豫皖三省地方顽军协同“进剿”五师。五月下旬，五战区“进剿”部队进入划定地区，发动了以我鄂东地区为重点的猖狂进攻。六月初，我师集结主力，对侵入我陂安南中心区的蒋嫡系部队三十九军五十一师发起反击，重创该顽，将其驱逐。然后，乘胜挥师东进，于六月中旬发起浠水白石山战斗，反击顽鄂东挺进军第十七纵队，歼灭该顽一个团及纵队直属队一部。六月底至十月，五战区继续纠集兵力大规模进攻我边区，并勾结敌伪对我实行夹击，妄图“围歼”我军。我五师健儿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援与配合下，以游击战术机智英勇地与顽军作战数十次，粉碎了顽军四次极其猖狂的“进剿”，为制止第三次反共高潮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当时，国民党五战区“长官”李宗仁在给李品仙的电报中哀叹说，这次军事行动，“不惟无多结果，反使

共匪流窜我防地。似此情势，言之实堪痛心。”

五师在这一阶段还加强了部队建设。当一九四一年击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师军政委员会于六月召开了全师政治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部队政治工作经验，提高了干部的政治工作水平，对巩固部队，加强政治工作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重大作用。政工会议后，部队更加注意了提拔工农干部担任政治工作和加强知识分子新干部的锻炼。为了大力培养干部，以适应部队发展和提高的需要，于十月间在随营军校的基础上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还加强了军事训练和司令部工作建设，加强了行政管理和后勤建设，进行了一系列巩固部队的工作。一九四二年四月，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在全边区建立了三个军分区，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统一了各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师部除十三旅仍作为师的主力部队担负全区战略机动任务之外，其他正规旅都基本上固定在一定地区作战。还将一部分主力转化为小团，分布到各军分区以便在敌、顽夹击的严重局势下，能够独立、分散地开展游击战争。由于五师与军部的交通联系一直没有打通，毛泽东同志于七月二十一日亲自拟电稿，同意华中局意见，决定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五师的行动。一九四三年二月，五师召开了军事工作会议，总结了五师诞生以来的军事斗争经验，讨论了新形势下的军事建设问题。会后，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部队建设，抓住战斗间隙进行军事训练和阶级教育，提高了广大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和军事素质。

边区的根据地建设，在这一阶段也全面展开。为统一与加强边区抗日民主政权，一九四一年四月间召开了边区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按照“三三制”的原则，正式选举产生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最高行政领导机关——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各地结合战争动员，加强了改造政权、组织群众、发展地方军和人民武装等各项工作。为支持长期抗战、战胜严重财政经济困难，边区党委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作出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决定。三月，召开了边区首届抗日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鄂豫边区施政纲领》，进一步调动了各阶层人民抗日的积极性，使边区掀起了根据地建设高潮。一九四三年一月，边区党委在大悟山蒋家楼子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李先念同志任边区党委书记兼五师师长和政治委员的决定，边区自此全面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蒋家楼子会议，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的精神，解决了增强战争观念的问题，统一了对进一步发展军事力量同迎接抗战胜利之重大关系的认识，通过了一九四三年边区军事建设计划。会后，边区党、政、军、民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都以“一切服从战争”为最高原则，保证了军事斗争和军事建设计划的顺利实施，使政权工作、群众工作与军事建设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互相促进。

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经过几年的艰苦卓绝斗争，胜利地形成了从东、西、南、北对盘据武汉之敌的战略包围。截至一九四三年冬，我主力军与地方军由一九四〇年底的一万五千余人发展到近四万人，地区由一九四一年初的十余县扩大到五十一个县（其中基本区十四个县、游击

区三十七个县),边区人口由一九四二年的四百七十三万五千余人(基本区二百一十六万四千余人,游击区二百五十七万一千余人)发展到一千零二十余万人(基本区四百二十余万人,游击区六百余万人)。

第四阶段,自一九四四年初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这是边区在胜利与失误交织中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阶段。

为了加强对鄂豫边区党、政、军、民的领导,华中局于一九四三年底派遣郑位三同志来边区任华中局代表。在郑位三同志的倡议和边区党委的同意下,从一九四四年起执行了“以巩固为中心”的方针,进行了整风、生产和组织群众等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其中特别是在整风运动中,郑位三同志传达和介绍了延安整风情况,使长期孤处敌后的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认清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与王明“左”、右倾错误路线斗争的实质及其重大意义,从而大大提高了无产阶级觉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同时,由于认真贯彻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始终采取了理论联系实际与和风细雨的方法,所以运动的发展一直是健康的。

一九四四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为摆脱困境,急图将中国大陆变作它垂死挣扎的基地,接连发起了河南战役和湘桂战役。四、五月间,日寇以五、六万兵力进攻河南。国民党汤恩伯和胡宗南的四十万军队,一触即溃,在三十七天内,失城三十八座。在这种情

况下，中央及时指示五师和华北、华东兄弟部队同时向河南敌后进军，完成缩毂中原的战略任务。但当时边区领导指导思想过分寄希望于华北多派八路军南下，同时对日本很快就会投降的形势估计不足，因而在抗战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和中央指示下达后，仍坚持实行“巩固为主、发展为辅”的方针。只派遣了一支千余人的部队挺进河南敌后。这支部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迅速发展了豫南、豫中七个县的新区，开辟了东西宽一百四十余里，南北长二百余里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地方武装发展到八千余人，一度打通了与华北八路军的联系。事实说明，河南敌后形势确实极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如果五师当时能拿出主力进军河南，完全可以使中原、华北呵成一气，实现席卷中原的战略任务。这样，不仅使边区长期力图解决的“改变孤悬敌后处境”的战略目的能够实现，而且还可以为五师由抗日战争转向解放战争进行战略转变时，造成背靠华北，威逼武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极为有利的局面。同时，扩大我之活动地区，也大大有利于解决部队财政困难。

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在“以巩固为中心”的方针指导下，五师大部主力继续陈兵大悟山中，一则固守大悟山阵地，一则进行长期整训和进行“组织群众大多数”的实验工作。一九四四年五月和八月，国民党广西军集中了几千人的兵力两度向我大悟山进行了猛烈的进攻。我军则以打阵地战的作战方法，死守硬拚，进行了壮烈的“大悟山保卫战”。这就使一部精锐主力陷于被动挨打的窘境，受到完全可以避免的消耗；加上坐吃山空，财政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困

难。

当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跨入一九四五年时，正是德、日法西斯处于总崩溃的前夕。为了争取在中国人民面前出现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一九四五年一月，从延安奉命南下发展华南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三五九旅，胜利地到达边区，带来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又一次的指示。至此，边区党委才确定将工作方针改为以发展为主。派出鄂东军区的一部兵力，配合三五九旅向江南进军，创立了湘鄂赣根据地。但五师的主力仍驻守在大悟山中未向河南进军，故对大局未起决定作用。

三五九旅南下，为边区送来了大批红军老干部，大大增强了五师的骨干力量，这对提高五师部队的素质起了重大作用。但边区领导在调整和配备部队的各级领导骨干时，对一部分原来经过长期斗争考验而又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干部未作适当安排，这对以后更为艰巨的斗争，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及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庄严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英勇转战武汉外围敌后战场的新四军第五师，由于党中央、华中局的正确领导，在敌、伪、顽夹击的复杂斗争中，团结了抗日的各阶层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开创了以

鄂东大、小悟山为中心的纵横千里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了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和一千三百多万人口，建立了三十九个县的民主政权。部队由开始的几支小游击队发展到五万余人的人民武装。这支英雄部队，同边区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一道，抗击着武汉地区日寇各师、旅团的大部或一部和伪军全部。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新四军五师部队曾对敌、伪军作战一千零三十五次，共歼灭敌、伪军四万一千六百六十七名，其中毙、伤、俘敌、伪军三万零一百一十名，敌、伪军投诚与反正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七名。作战中缴获炮二十三门、掷弹筒三十九个、机枪二百一十八挺、长短枪一万一千五百五十六支。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人民的抗日斗争，对于全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起了重大的战略配合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 东北公安保卫工作回顾

汪金祥*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军挥师进入东北，夺取了先机之利。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大举向东北运兵的同时，派要员、特务潜进东北，网罗和收编日、伪残余，大肆发展反动党团、特务组织，建立各种地下军。于是，兵匪蜂起，国特蠢动，反革命势力到处泛滥，社会治安陷于极度混乱之中。面对这一非常复杂的局面，一九四五年九月，东北局设立了负责除奸保卫工作的东北局社会部。一九四六年六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内又设立了东北公安总处。在我解放地区，相继建立了省、市、地、县和铁路系统的公安机关以及基层保卫组织，逐步形成了从上到下的保卫组织系统。这是建设政权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保卫政权的一个有力支柱。

这期间，我们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根据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和任

* 解放战争时期，作者曾任东北局社会部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安总处处长。本文系根据作者生前写的《汪金祥回忆录》整理的。

务》的决议和《加强除奸保卫工作的指示》，立即把打击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反革命势力。一九四七年一月，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全区第一次除奸保卫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一年多的斗争经验，确定把保卫根据地政权建设、生产建设和支援前线军事斗争以争取东北全境解放，做为公安保卫机关的基本任务；重申了对敌斗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制定了侦察工作的方针和策略，并作了全面的斗争部署。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各地公安保卫机关在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依靠军队和地方各部门共同努力，进一步展开了紧张激烈的斗争，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为解放全东北作出了贡献。

横扫日伪残敌 摧毁国民党社会基础

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六月，在东北各城市，什么治安维持会、国民党党部、党务专员办事处、铁血除奸团以及先遣军、光复军、反共救国军等反动党、特组织和土匪武装帮股，纷纷冒了出来。在不少县城都被这类反革命势力控制或骚扰。这些反动组织的成员，绝大多数是打着蒋家旗号的伪满军官、警察、特务、官吏、恶霸、土匪、地痞、流氓、会道门头子之类大小汉奸和社会渣滓。他们狂喊着“把共产党赶出东北去”、“迎接中央军”等反革命口号，疯狂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其主要手段是暗杀和暴乱。仅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以前，较大的反革命暴乱，就发生四十多起，我不少干部、战士甚至领导干部都被劫

持，被杀害。广大群众对这些摇身一变的伪满残余和民族败类恨之入骨，迫切要求清算他们，惩办他们。我们紧紧抓住除奸、清匪、反霸这个斗争环节，取缔和破获各种反革命组织，搜捕和惩办隐伏的战犯、汉奸，狠狠打击敌人，争取广大群众。

我们进入沈阳不久，就发现了“三青团行动委员会”反革命组织。为首分子是伪满军官王书麟。他在沈阳市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张宝慈的指使下，成立了武装行动队，专门从事暗杀活动。我们根据情报，直捣匪巢，捕获暴徒三十多人，缴获全部枪支，彻底摧毁了这个反革命组织。十一月下旬，我们又粉碎了一千多名暴徒围攻沈阳和平区公安分局的反革命武装暴乱。这起暴乱是辽宁省国民党党部书记长李光忱勾结日本关东军上校中川成作共同策划的。我们组织全市性搜捕，捉获匪干数十名，抄查了国民党省市党部，逮捕了十数名党部骨干。

十一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军进占锦州，并沿着北宁路向沈阳方向进犯。在我占领区，隐蔽的敌人又活跃起来，妄图策应国民党军的进攻。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也就是旧历除夕晚上，正当群众欢度抗日胜利后第一个春节的时候，在通化市，一场规模更大的反革命暴乱发生了。这次暴乱中有日本暴徒以及被裹挟的日本人三千八百多名参加。我个别机关单位被侵袭，造成了一些伤亡。这起暴乱，又是辽宁省国民党党部书记长李光忱一手策划的。他派近藤和阿部两个日本特务携活动经费二十万元，到通化市联络该市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孙耕晓，密谋日本人暴乱。孙耕晓很快与原日本关东军一二五师团参谋长藤田宝彦勾

结起来。李光忱委孙耕晓任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主任，委藤田宝彦为这个军政委员会的军事部长，组成三个暴乱指挥部。把所有日寇骨干统统发展为国民党员，命令在通化市的日本人不分男女一律参加，同时联络市外温德喜等国民党建军土匪帮股，作为暴乱的策应。他们妄图先夺通化市，后取整个通化地区，然后立即成立“中日联合政府”，以“配合中央军占领整个南满”。大年三十白天，群众和被胁迫参加的青年学生，就向我公安局揭发了他们的阴谋，提供了孙耕晓、藤田宝彦的活动据点。我通化地区分党委书记吴溉之获知后，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动员一切力量，作了战斗部署。会后军分区参谋长茹夫一立即带兵逮捕了孙耕晓、藤田宝彦等数十名匪首、匪干，搜获了暴乱的命令、计划、印信、名册等全部罪证。由于事出仓促，时间紧迫，还未来得及全部摧毁他们的指挥系统和组织系统，暴乱就发生了。在暴乱面前，我方干部战士沉着应战，奋勇还击，以一当十，以少胜多，有力地阻击了敌人的进攻。拂晓，李红光支队赶到了，顿时枪声大作，喊杀声响彻山城，守卫机关的战士们立即发起冲锋，暴徒们纷纷溃散逃窜。战斗前后不到两小时，除击毙者外，俘敌二千多人，获得了反暴乱的重大胜利。

为了充分利用这个典型事件，宣传党的对敌斗争政策，震慑、分化敌人，教育和争取群众，二月十七日，在通化行署广场召开了全市庆祝反暴乱胜利大会。接着，将孙耕晓、藤田宝彦押赴市内丁字大街，召开公判大会，展出了他们的全部罪证。会后，依照群众的要求，将两犯绑赴刑

场正法，并分别惩办了其他重要罪犯。一般暴徒，经过感化教育，都纷纷坦白悔罪。二月十九日又召开释放大会，向他们进一步宣传了党的政策，指明了他们今后的出路。这些人被感动得痛哭流涕，表示今后一定要走中日友好的道路，绝不再与中国人民为敌了。

这次反革命暴乱，又一次向我们发出了警号。我们必须把反暴乱问题，把搜捕战犯、汉奸和铲除恶霸问题，提到重要的斗争日程上来。

一九四六年五月，东北局转移到哈尔滨后，哈尔滨市公安局在市委领导下，开展了强有力的除奸反霸斗争。除搜捕了一批战犯、汉奸外，首先公审处决了两个长期压在人民头上的大汉奸恶霸姚锡九和李九鹏。

姚锡九靠当把头、开烟馆起家，又是市内数一数二的大房霸。张作霖统治时期，他为帝俄修建松花江桥，故意将排水管抽出，淹死一批水下作业工人，从中捞取大笔抚恤金，变成了暴发户。日伪统治时期，他当上特务，并任滨江省第五警察署长等职，甘为日寇鹰犬。太平洋战争爆发，又出巨资买下松花江桥，支援所谓“大东亚圣战”；还特地制造了两辆大型囚车和数十付特号加重脚镣，送给日本宪兵队，用来残害爱国抗日志士。

李九鹏是日本高级特务、市家理教协会会长。他依靠日本宪兵队开了一个东北独一无二的大赌场，又在车站、码头、旅馆、饭店等处，布置一批地痞流氓诱人参加赌博，所获巨利对半交给日本关东军。因赌博而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仅在赌场附近自杀者就有百人之多。

这两个大汉奸恶霸，平日抢男霸女，图财害命，不少良家妇女被他们奸污，许多美满家庭被他们破坏，群众无不恨之入骨。

哈尔滨市公安局逮捕这两个大汉奸恶霸之后，许多受害者纷纷要求人民政府为他们伸冤雪恨。松江省主席冯仲云根据群众的要求，依法宣判姚锡九、李九鹏死刑。这两个大汉奸恶霸的伏法大得人心。群众一致反映：“横行两个朝代的大恶霸，国民党来了不治罪，只有共产党才敢于为民除害。”群众开始认识了共产党，反霸清算斗争和支前生产的积极性随之也高涨起来。

这期间，北满、东满、南满、西满各地公安保卫机关，也都从解决群众迫切的政治要求入手，搜捕了浮在面上的和活动暴露的日、伪残敌。

一九四七年，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展起来了。我们本着参加土改、保卫土改的指导思想，随着大批干部下乡，组织发动各地公安保卫干部投到土改运动洪流中去，一面帮助农民斗地主，分土地，学会做群众工作的本领；一面打击破坏土改的反革命势力，保卫土改胜利果实。在土改后期“挖坏根”斗争中，各地又发动农民，普遍对汉奸、恶霸、建军土匪等再一次进行了大清扫。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各地共挖出汉奸、恶霸、建军土匪一万二千多名，松江省和哈尔滨市公安保卫部门协助农民捕获逃亡地主、恶霸七千六百多人。同时，根据东北局关于保护和发展城市工商业的指示，对农民进城要求逮捕地主兼工商业者，严格把住审批关。除他们在农村的土地可按政策由农民进行分配

外，不得以“挖浮财”为名，逮捕和斗争本人，侵犯工商业资本及其他财产，从而保护了城市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深挖暗藏敌人，大力开展隐蔽斗争

一九四六年夏，在公安保卫战线上，国民党反革命势力遭我严重打击之后，已经由公开转入秘密，由暴露变为隐蔽，进一步实行武装土匪政策。据当时不完全统计，有各种名目的国民党军以上地下建军土匪武装三十七股，师长、军长以上建军头目二百三十多名。他们分受国民党党、政、军、特十六个系统的加委，到处拼凑人马，气焰甚为嚣张。他们喊着“专打八路，敬等老蒋”的口号，在我根据地争城夺地，打家劫舍，流窜骚扰。有的还借我扩军之机打入我军内部，进行暴乱活动。这些武装起来的敌人，是我根据地建设的一大祸患，是配合国民党军进犯的内应，必须首先集中力量彻底予以消灭，才能给根据地建设提供安全稳固的政治环境。于是，我们根据东北局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和决定，积极贯彻了军事清剿和侦察破案相结合的行动方针。对大股的和公开骚扰的，以部队清剿为主，公安保卫机关予以配合；对小股的和活动隐蔽的，以公安保卫机关侦破和公安部队清剿为主，部队予以配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各地党委进一步加强对公安保卫工作的领导，动员军事力量和群众力量，普遍地展开了紧张激烈的战斗。

哈尔滨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是东北根据地的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国民党特务活动集中的地方。一些国民党建军指挥机构和首脑人物就潜伏在这里，收编和指挥北满各地的土匪帮股，妄图策应国民党军的正面进攻。我军入哈尔滨后，就由公安大队配合我军主力部队，对哈尔滨市和周围各县的国民党建军土匪进行了清剿，歼灭匪股四十多个。在市内，则开展侦察破案工作，把斗争锋芒指向了隐蔽起来的国民党建军指挥机构。

哈尔滨市公安局在五月间逮捕了国民党“中央先遣军”第五战区总指挥曹兴武、军长白久泰。此后不久，伪满汉奸姜鹏飞又潜进哈尔滨搞地下建军活动。

姜鹏飞原是伪满第七军管区少将参谋长，一九四〇年被派到华北任伪绥靖总司令部部附、唐山行营主任和冀东特别区行政长官等职，曾指挥日、伪部队对我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过灭绝人性的大“扫荡”。“八一五”前夕，他又同蒋介石挂上钩，被任为国民党冀东挺进军总指挥。日伪军队刚刚放下武器，蒋介石又数次电催他“火速退至关外，尽量收容伪军”，担当“扰乱后方和占领哈尔滨”的任务。这个汉奸反革命潜进哈尔滨，野心很大，来势不小，立即引起了我们的严重注意。

经过初步侦察，发现他急欲策反我军干部。我们乘机派人打入，取得了他的信任，同时配合广泛的外线调查，案情逐渐明朗起来。他的建军番号是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二十七军”，姜鹏飞为二十七军军长。他到哈尔滨后，就制定了所谓“接收东北要纲”，决定收编日、伪残军和土匪帮股组成地下武装。他利用东北旧关系，先后发展了王捷

三、张福平、陶子清、姜风鸣等爪牙，作为他地下建军的骨干；又将北满各匪股收编组成十六个师，作为他的军事实力。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发布“招抚日本武装同志文”，搜罗登记溃散的日本官兵三千多名。当时，国民党军正在扬言进攻哈尔滨，姜鹏飞认为时机已到，数次派人去长春国民党保安长官司令部联络，要求拨给电台，空投武器。他的地下联络员取回杜聿明“配合新一军进攻，同时进驻哈市”的命令，捎来国民党新一军军长潘毓昆“将于八月八日进攻哈市”的口信。他即刻调度人马，准备进行军事策应。就在这紧急时刻，呼兰县公安局截获了姜鹏飞发布的第十号密令：命谢文东、李华堂、左建堂匪股集结在蜚克图；刘昨非匪股运动到阿城；刘松坡匪股埋伏在哈尔滨市郊；刘景山匪股封锁松花江桥；吴俊峰匪股控制太平庄，妄图对哈尔滨形成钳形包围。

破案时机已到，哈尔滨市公安局于八月二十六日，通过内线将姜鹏飞等匪首匪干诱至天泰栈全部逮捕。他的军参谋长张东坡未去天泰栈，闻讯带几个亲信化装逃跑，在三棵树车站，被早就等在那里的公安人员擒获。至此，姜鹏飞地下建军的指挥机构顷刻化为灰烬。

姜鹏飞在狱中祸心不死，心存幻想。又透露八月二十八日，与他合谋的黄枪会活佛李明信将率道徒举行暴动，妄想等待这天，出狱再干。

李明信是在华北作恶多端的日本特务，“八一五”后又当上军统特务，被委为“东北复建国军”少将军事委员。他衔命潜入哈尔滨后，以活佛降世的骗局，啸聚匪徒、道众

三千多名，同姜鹏飞暗中勾结，妄图配合进行暴动，一同拿下哈尔滨。然而，他们的暴动阴谋，当天就被我严阵以待的警备部队彻底粉碎了，李明信以下匪首全部就擒。

继姜、李两案破获之后，哈尔滨市公安局趁热打铁，将“东北救国军第六路军”破获，逮捕了军长崔大刚、副官长倪信生等罪犯五十三名。

姜鹏飞收编的北满各匪股，在我军部队的清剿追歼下，也于当年年底陆续被消灭。谢文东、李华堂之类“座山雕”式的匪首，或者被击毙，或者被捉获，受到人民的制裁。

东北局领导同志对这次破案胜利非常重视，亲到哈尔滨市公安局进行慰勉和祝贺。中央社会部也发来嘉奖电，电报说，这一系列破案的胜利，“给了蒋、日特务机关以重大打击，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勾结敌、伪反对人民的罪行，对争取东北自卫战争的胜利，巩固东北解放区的建设，教育东北的人民群众，起了重大作用”。

北满、东满、西满各地公安保卫机关，在这期间都加强了对建军案件的侦破工作。到辽沈决战之前，共破获这类案件六百三十多起，捕获匪首、匪干六千八百多名。各级公安部队直接出动剿匪一百七十多次，歼灭土匪两万一千四百多名。收降土匪二千多名，缴获枪支二万多支。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特务机关改变了斗争方式，加紧了情报派遣活动。他们向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城市连续派遣特务。我们根据东北局的指示，进一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把同国民党间谍、特务的隐蔽斗争放在突出地位，积极加强内线侦察，深挖在我根据

地内暗藏的敌人。据统计，国民党党、团特务组织潜伏在哈尔滨市的有八十二个之多。但都经我侦察，被一一打掉了。唯有军统特务张禹的“哈市特别组”，非常顽固狡猾，竟与我们较量了三年之久。他们六次过江，六次蹈我罗网，直到一九四八年长春解放，他们才最后被我消灭。

一九四七年七月，嫩江省公安处破获了一起同美蒋勾结的齐齐哈尔天主教总教堂案，逮捕主教胡干普、事务主任博施德、神父魏佑民、修道院长陆化行等主要罪犯十四名。搜出电台、美制雷管、炸药、手枪、子弹、情报底稿、禁止教徒参加土改的通令等罪证。嫩江省公安处在一九四五年冬，就发现了这个教堂进行特务活动的线索。一九四六年四月第二次进入齐齐哈尔后，立即采取侦察措施，争取爱国进步教徒，了解教堂内幕，他们的罪迹从此一个一个地暴露在我们面前。原来，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国民党派人一度接收齐齐哈尔期间，胡干普、博施德等人就同国民党嫩江省长彭济群、齐齐哈尔市警察局长熊文洪勾结起来，并送去有关东北历史、地理的情报，接受了“帮助中央接收东北”的特务任务。一九四六年四月，彭济群等接收大员逃往长春，他们又将特务电台、建军物资藏在教堂；将国民党特务张宝山、光复军联络员关塘林、关竹林、建军大队长华文东、周作泽等人掩护在教堂里，发给他们活动经费和枪支弹药，密谋暴乱。胡干普还派人到哈尔滨、昂昂溪、白城子、拜泉等地，刺探我党、政、军情报，通过电台向彭济群发报。

军调三人小组到齐齐哈尔后，他们又同美军中校巴劳

夫挂上勾。巴劳夫走后，他们按事先规定的地址将搜集到的我内蒙方面和齐齐哈尔满族方面的情报，向驻在长春的美军执行部发去。国民党军进犯北满失败，胡干普、博施德等人焦急万分，更加疯狂起来。他们严令教徒不准参加土改，不准参加解放军，还派人去哈尔滨联络，准备掀起暴乱。

就在这时，嫩江省公安处报经东北公安总处审核批准，不失时机地破了全案。这是我们侦破的第一个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案件。为了打准敌人，不出纰漏，东北公安总处将一外籍主犯调到哈尔滨，再次进行了审讯和核实。审讯中，胡干普、博施德等外籍罪犯，声言他们是“办教”的，“从来不干预中国的政治”。后来，在确凿的罪证面前，他们理屈词穷，如实供认了所犯的特务间谍罪行。

于是我们向东北人民法院起诉，法院经过审理，复核，在法庭上严正宣布：除两名从犯教育释放外，对胡干普、博施德以下十二名罪犯，分别判处三年到十二年的有期徒刑；其他教士、修女、教徒与本案无关，一律不问，他们的宗教活动，政府不加任何限制和干涉；教堂所有合法财产予以保护；与本案有关的国民党罪犯，由嫩江省公安处协同法院依法追究，分别惩处。

这期间，北满、东满、西满、辽东、辽南各地公安保卫机关，都本着侦察工作的方针和策略，对隐藏在根据地的国民党党、团、特务组织开展了侦察破案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到辽沈决战前夕，共打掉县以上反动党、团组织

一百九十多个，捕获党、团骨干分子二千多名；破获间谍、特务案件三百多起，捕获派遣、潜伏特务一千六百多名。在斗争中，加强了侦察工作的队伍建设和业务建设，使我们在隐蔽战线上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

整顿社会治安，改造旧城市面貌

随着北满根据地的扩展，我们已经拥有了一批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大小城市。但这些城市是在殖民地政策下畸形发展的城市，它留给我们的的是一个情况复杂、治安紊乱、犯罪突出的烂摊子，残留着日伪统治者践踏、蹂躏的痕迹。因此，在入城初步整顿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全面整顿社会秩序和治安秩序，已经成了当务之急。

东北公安总处根据党中央和东北局关于改造旧城市和整顿社会治安的指示，决定以哈尔滨为重点，积极迈开改造旧城市的步伐。要求各地公安保卫机关，通过整顿，把曾被日、伪占领的旧城市改造成为人民的新城市。

哈尔滨是东北有名的“小巴黎”。早在十九世纪末，帝俄就插手经营，使哈尔滨带上了浓厚的西方色彩，变成了帝国主义分子盘踞和国际间谍、特务角逐的城市。日、伪十四年的统治，又使哈尔滨变成了反苏、反共的前哨，变成了反动上层人物盘剥人民，追求享乐的城市。许多盗匪、流氓聚集在这里，犯罪活动十分猖獗。“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就是人们对哈尔滨的一个形象性写照。根据我们当时调查，在哈尔滨这个七十六万人口的城市里，有日伪

军、政、警、宪、官吏和逃亡地主八千五百多户，二十六个不同国籍的侨民十万多人，有外国教堂、寺院五十多座，反动会道门坛址二百五十多所，有半官办大赌场一座，大烟馆一百二十多处，西式高级舞厅十多个，坐窑妓女二千多名。大批日、伪残余和地主恶霸，乘战后动乱潜进哈尔滨，与国民党暗中勾结串连。全市旅馆、客栈有一半兼有公寓性质，不少坏人居住其中，甚至成了建军特务的据点。中间经纪人开设的代理店，名为代客经销，实是投机走私者和特务、土匪聚散的窝穴。全市户口多被日伪烧毁。谁有户口，谁无户口？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一时茫然无数。道外区情况更为复杂。有些人家设暗院、黑屋、天窗、地道、夹壁墙、消息铃；有些大院几十家，各设门户又彼此相通，坏人可以随时隐匿逃走。有些房屋一天数易其主，晚上租给野妓，白天自己居住。许多街巷有门无牌，有牌无号，数号一门，数门同号。这种复杂性，给整顿社会治安和进行对敌斗争增加了许多困难。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定从清查、整顿户口做起，以便从这里突破，再向全面展开。哈尔滨市公安局从一九四六年十月开始，集中公安干部学校学员二百多人，加以短期训练，作为骨干；又从各方面抽调干部、学生、工人、店员等五千多人，组成工作队，分派到每条街道挨门、挨户地清查登记。到一九四七年八月，基本上告一段落。进而建立了户口管理制度，了解了市内阶级关系和社会面貌，扭转了过去那种纷纭杂乱的无政府状态。

开展户口清查整顿，是一个干扰和反干扰，破坏和反

破坏的斗争过程。那时，坏人四处造谣破坏，说这次清查“还登记锅碗瓢盆、衣服、家俱，要实行共产平分了”。有些黑烟馆、妓女住处，贴上“此处民宅”、“产房禁入”等等条子，借以躲避搪塞。有些逃来避罪的分子，用金银、美女贿赂户口工作人员，以求通融隐瞒。有些地痞流氓扬言“国民党来了非杀你们的头不可”，公开抗拒威胁，甚至动手打人。有些特务、奸细，避居于外侨的别墅、旅馆，或躲进医院“卧病”，谋取掩护。至于编造历史，谎报姓名，假冒顶替，私刻证明，迁出不走等现象，那就更多了。然而参加户口工作的同志们，坚持党的原则和政策，依靠广大群众，反复调查研究，终于冲破重重阻力，识破种种花招，把这一团积久的乱麻梳开了。

清查中，发现和登记了属于本市的有反动身份的特殊户口四千七百多户，逃往敌区分子九千八百多名，外县逃来的地主七千三百多名，没有户口的外地其它黑人十一万多名。同时提供了大批侦察线索，配合破获了十几起特务、建军土匪和惯盗集团等大案。经群众检举揭发，仅西付家一个区，九月间就捕获惯匪、惯盗七十多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坏人无人收留，狼狈万状，只得在破房子、高粱地、垃圾箱里偷宿，最后还是被群众揪了出来。由于编好了门牌，弄清了户数、人口，不仅给社会治安管理，也给邮电、房产、水道、电业、税收等市政管理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户口清查的基础上，成立了教养院，将有犯罪可能的流氓、乞丐、游民收容起来，组织他们进行生产，给予

就业改造的机会。据当时统计，前后收容这类人员四千多名，经过教育改造，绝大多数学会了生产技术，取得了正当职业。同时，取缔从事经济犯罪的黑代理店，打击为首分子，关闭舞厅，取缔赌场，建立对旅店、饭店、电料行、刻字铺、照像馆、影剧院等复杂行业的管理制度。总之，各方面都加强整顿，堵塞了可资敌人利用的漏洞。

娼妓问题，是哈尔滨社会的一大痼疾。什么大观园、艳春里、桃花巷等等，都是娼妓聚居的区域。二千多名妓女就在这个悲惨世界的最底层过着被侮辱、被损害的生活。这是危害社会治安、败坏社会风气和传染性的一大祸患。我们结合户口整顿，取缔了妓院，打击了窑霸。同时把妓女集中起来，对她们进行思想教育，指明前途出路，唤起她们从事正当职业的自觉性，然后把她们分别送到鹤岗、鸡西、八面通等地区去，帮助她们嫁给当地单身群众，组织起家庭。据我们后来了解，在群众的教育帮助下，绝大多数妓女都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了。这个旧社会遗留的问题，就这样迅速彻底地解决了。群众称道这是一个“奇迹”。

在户口清查中，发现制毒、储毒、贩毒的在哈尔滨构成了一面可怖的黑网。伪满市公署所设的烟务处，名曰“禁烟”，实则是这面黑网的总后台和总指挥。在它下面，有制膏厂一个、阿片仓库四座、烟馆一百多处。据当时统计，吸毒成瘾的群众有五万多人，许多人被害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沿街乞讨，流为贼盗。伪满后期日、伪政府为了补救秘密军事工地的劳力不足，又借“禁烟”之名，成立什么

“康生报国队”，把大批烟民、瘾者抓去“勤劳奉仕”，以致病疫横流、死亡累累。有些力不胜任劳动的，则被送去香坊细菌工厂，当了细菌战研究的试验品。

根据东北公安总处的指示，哈尔滨市公安局立即关闭制膏厂，查封烟库，取缔烟馆，摧毁全部毒化机构，捕获了一批惯犯、大犯。被称为“四大王、八大家”的贩毒集团全被破获。仅从这几个大集团初步缴获的各种毒品，价值就有四百一十五万之巨，可买高粱米七千多万斤，足够全市人口两个月食用。同时，普遍登记烟民，开展群众性的禁烟戒烟运动。许多瘾者从毒雾的包围中解放出来，身心逐日康复，陆续走上正道，大大减少了社会上的不安全因素。他们高兴地感激人民政府说：“过去百戒不见效，自认一生就此了事；谁知共产党一来，我们这些废品也有成材的希望了。”

对于反动会道门，也结合户口清查和破案审讯，大体上掌握了它的脉络和眉目。当时，哈尔滨的反动会道门有六个大系，分属于天津、济南两大流派。他们在市内设坛二百五十多处，有坛主以上道首一千五百多人，发展道徒五万多人。其中盛考斌系力量最大。他以交献、开荒、寄名、功德、渡仙、奠仪等各种名目，从道徒身上剥削去的钱财，多达七亿之巨。以此为资本，他又搞起倒卖猪鬃、鹿茸、白金、宝石等生意，获利折合白银二亿两以上。不仅如此，他们还和国民党特务相勾结，大造政治谣言，惑乱人心，破坏土改、参军和城市改革。军统大特务于大光、崔刚潜进哈尔滨，就隐藏在万缘总佛堂内。军统特务

李明信勾结李耀宗系，欺骗道徒，组成为姜鹏飞地下军中一股，参加了反革命暴乱活动。而军统特务少将袁晓轩在长春成立的“新事业建设协会”，也很快地把这些道首网罗进去了。

哈尔滨市公安局加强侦察破案工作，逮捕了盛考斌、李耀宗、徐汝文等大道首，破获了于大光、崔刚等特务大案；同时号召道徒声明脱道，从反动道首的欺骗下解放出来。在户口整顿中，仅太平一个区声明脱道的道徒就有四百五十多名，其中大部分交出了“海底”。

哈尔滨经过这次从户口清查开始的一系列整顿，社会秩序和治安秩序显著好转，城市管理走上了正规发展的轨道。有人比喻说，哈尔滨好象洗了一次澡，消了一次毒，秽除痼落，神清气爽，面目焕然一新了。

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北安等城市以及农村地区的城镇，也在城市改造中，进行了社会治安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这个基础上，各地进一步加强侦缉工作，开展了经常性的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到辽沈战役前夕，共逮捕和处理了各种刑事犯罪分子二万八千多名，使刑事犯罪率大为降低，城乡治安秩序普遍好转。

主动出击敌人 积极配合辽沈战役

一九四八年春，东北战局起了决定性变化，国民党军被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首尾难于相顾的孤立地区。辽沈战役即将开始，东北地区已处于全部解放的

前夜。

随着东北战局的胜利发展，公安保卫战线上的敌情也发生了变化。美蒋特务机关为了挽救败局，不断向解放区和边缘区派遣特务刺探军事情报，并妄图对铁路、车站、桥梁、涵洞、动力、兵工企业和军用仓库等要害部位，进行纵火、爆炸等破坏活动。情报和反情报，破坏和反破坏，成了当时的主要斗争形式。

从这种斗争形势出发，一九四八年二月，东北局社会部召开了第二次东北全区除奸保卫会议。会议本着“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指导思想，要求全面调动公开力量和秘密力量，在大力加强以铁路沿线城市为重点的公安保卫工作的同时，把派遣工作进一步伸向敌区去。并强调在过去派遣的基础上，加强向长春、锦州，特别是沈阳的情报派遣，以便及时掌握敌人的军事行动，配合辽沈战役的胜利进行。根据会议精神，老解放区省、市公安保卫机关都调整力量，严密部署，积极行动起来，在新解放城市，公安保卫机关立即把主要力量投到挖掘潜伏特务的斗争中去。

一九四八年三月，四平市被我军解放，这里潜伏着一个叫做“兴安站”的庞大特务组织。它是军统甲等站。少将站长冯贤年被国民党国防部派到四平以后，就在热察绥边区，在嫩江、索伦、满洲里、王爷庙、通辽、辽源、海龙和四平市内，建立了一套特务组织，广泛搜集我军事、政治等情报，猖狂进行造谣、骚扰、爆炸、暗杀等破坏活动。辽北省公安处和四平市公安局，入城后经过周密的侦察和积极的追讯，在一九四八年四、五月间，将四平市两

个潜伏特务组织全部破获，逮捕了少将副站长袁士举以下特务一百多名，缴获电台十一部；并为东满、西满、内蒙等有关城镇公安局破获“兴安站”下属各特务组织，提供了破案依据。接着又连续破获了新派来的四个军统特务小组。

四平是北满通向沈阳、锦州方向的重要交通枢纽。这一系列破案的胜利，有力地震慑和打击了蒋特派遣活动的气焰。不久又有几个特务被派来专门搜集军事情报，但在我严密搜捕下，不敢在四平藏身，吓得丢下电台就逃回沈阳去了。这就基本上挖除了这个交通枢纽地区的隐患，为我军事运输的安全畅通，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

各地铁路公安机关，普遍加强了铁路沿线的安全保卫。在刚刚解放的西阜新地区铁路沿线，普遍开展了敌情调查，彻底摧毁了反动党团、特务组织以及“铁友会”、“同仁会”、“防谍保密组”等反动外围组织，拔掉了敌人楔下的钉子。齐齐哈尔铁路公安处和郑家屯铁路公安分局又分别派出执法大队，在郑家屯、彰武、西阜新一线，负责军事物资的押运和车站、桥梁的警卫。他们不失时机地完成了任务，保障了前线的军事需要。

为了保卫主力部队向锦州前线开进，东北公安总处又派出一个得力的工作组，到郑家屯、彰武、阜新这条铁路上，专门去作了部署。他们依靠当地党、政组织，协同军队保卫部门和铁路公安机关，发动沿线铁路职工和地方群众，掌握敌情动态，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监视铁路沿线敌人，控制铁路电话专线，严密封锁了我军行动的消息。

在敌占区，我内线人员也按着新的部署要求，打入敌

人心脏部门，勇敢机智地展开了战斗，将情报一份接一份地送了出来。

锦州地区作战开始之前，我内线人员就从锦州市政府军事科复绘出锦州市城防工事图，送到锦州前线指挥部。隐蔽在东北剿总司令部、空军司令部和东北军运指挥所等首脑部门的内线人员，相继送出国民党军关于辽沈陆空作战的计划、命令、城防要图、兵力配置以及密码、口令、军事运输、粮食供应等重要情报。当时国民党军密码不断变换，但每次变换都为我获知，他们的通讯联络和一举一动，基本上在我掌握之中。

蒋介石为救锦州之危，急令华北国民党军从葫芦岛登陆驰援。然而，他们刚刚登陆，我内线人员就将其部队番号、兵力编制、到达地点等情报送出。十月上旬，廖耀湘兵团出沈阳西进之前，兵团的出动日期、行动路线和作战意图，就被我内线人员获知。这份情报立即送到开原情报站，通过驻在开原的我军第十纵队司令部的电台，报给前线指挥部，为我军部署全歼这个兵团提供了情报依据。

锦州解放后，长期被围已陷于兵饥马困绝境的长春守敌，更加将无战心，士无斗志了。长春情报组这时通过内线人员，利用为守敌加工军用大豆，然后再用油款为之购买军粮的机会，将军用大豆售给民间，缓和了群众吃粮的困难；而对军粮则委辞迟迟拖而不购，更加剧了军粮恐慌，加剧了长春守敌的动摇。在饥饿和败困的威胁下，长春守敌几次策划突围逃跑，情报都为我及时获知。因而他们刚一露头，就被我军猛烈的炮火堵击回去。十月十七

日，云南系将领曾泽生率所辖六十军宣布起义。守城主将郑洞国战无力，退无路，只得在翌日命令守军放下武器，长春宣告解放。

沈阳守敌，从此前无屏障，后无依靠，完全陷入了孤立无援，走投无路的境地。敌军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动摇，为我情报派遣人员的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为了调动敌区内线力量，配合我军进攻沈阳，为了保护这座工业集中又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不受或少受破坏，我们向沈阳地下组织下达了三项紧急指示：

一、积极策动敌军起义或放下武器，相机配合我军解放沈阳。

二、组织地下关系和可靠群众，保护工厂、仓库、铁路、机关和所有档案、物资，防止破坏。

三、打入敌人内部人员，继续埋伏，不得暴露，以待我军入城后，配合进行除奸肃特工作。

地工人员按照这个指示，乘前线胜利的东风，积极开展工作，为沈阳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沈阳解放后，东北进入了支援全国解放和全面建设东北的新时期。在新形势下，东北公安保卫机关为了完成党和人民给予的更加光荣艰巨的斗争任务，在政治、业务、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满怀信心地踏上了新的征程。

江淮春晓

谭希林

武汉、广州失守之后，华中、华南的几千里江山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鉴于华中地处江淮之间，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迅速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了加强这个地区的工作，从延安派了一批干部去到鄂豫皖地区。我就是在这时来到了鄂豫皖地区的。

但是，鄂豫皖区党委对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指出的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并未认真贯彻执行，反而错误地提出了“协助五路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行动口号，帮助国民党桂系军队扩军、建政、训练基层政工人员，而不注意发展自己。国民党五路军依靠共产党人的扶持，迅速壮大起来，在他们多年进攻而得不到手的大别山区站住了脚。当一九三九年全国局势逆转时，他们羽翼已成，立即背信弃义向我们猖狂进攻。由于鄂豫皖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早已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开赴抗日前线，后方留守机关兵力单薄。在五路军蠢动的时候，我方先是据理交涉，继则坚决自卫，但已无法挽回败局，最后不得不撤出大别山区。一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起来并且一直保留下来的红色根据地，就这样痛心地转移到

顽固派之手。

部队离开大别山，游击到皖中和皖东一带，没有根据地依托，供应极为困难。国民党当局不发给一枪一弹和粮草、被服，其地方政府则多方刁难、限制。我们没有税收，每到一地，就打“资敌”和借粮、募捐。即使这样多方设法，仍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寒风呼啸，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吃着杂粮稀饭。

正当我党、我军在江北敌后的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却从皖南新四军军部拍来电报，要四、五支队开赴江南。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初就曾专电给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即应分兵东进，直到海边，再分兵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新四军主要负责人要江北部队南下，显然是违背中央关于新四军东进，向北发展的方针的。但是，那时部队中也有一部分同志对这一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四支队党委会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军部执行的是国民党当局的命令，应该服从。如果我们不行动，会影响或破坏统一战线，国民党当局要批评的。但更多的同志认为，南下就意味着放弃华中，这正中敌、伪和顽固派将我八路军、新四军分割于华北与江南，以便各个击破的诡计，因而坚决反对南下。四支队曾在延安学习或工作过的一些同志，有的亲自听过毛泽东同志在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有的听过传达，他在报告中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在我们离开延安南下时，又告诫我们：你们到敌后去打游击，搞游击队，要自己搞，国

国民党靠不住，延安离你们远，够不上，一切都要自己动手。毛泽东同志的话给我们的教育很深刻，我们把他的报告和指示的精神，向支持南下的同志作了反复说明。即使这样，也没有完全说通。支队党委会后，我们到指挥部向张云逸汇报了会议的情形。张云逸说：“你们讨论是对的，这事很重大，中央必有指示。你们应照常工作，不宜冲动，应以团结为重。”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了：中央派胡服来到了淮南，领导华中全盘工作。

胡服就是党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他在九月间离开延安，沿途视察了各解放区，十一月才由淮北到达新成立不久的张云逸为首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皖东的定远县。少奇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立即召开各种会议，了解情况，到处传达与解释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欢迎会上讲，在党委会上讲，在干部大会和个别谈话中也讲。少奇肯定了华中的同志过去做了不少工作，但也指出在大别山区给人家“抬轿子”，不努力扩充自己的力量是不对的，其结果是被人家赶出来了。他意味深长地引用湖南的一句谚语说：这是“木匠打枷枷自家”，这个教训要很好地记取，不能再重复了。谈到今后的行动，他说：不南下是对的。部队要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大力发展华中游击战争，向东发展，一刻钟也不停留，直到海边，硬是要在这复杂的地区建立根据地，以此作为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同时，他分析了淮南平原、华中地区与华北平原的共同特点，并且指出，淮南除了国民党顽固派势力比

我们雄厚和他们控制了大部分地区的政权之外，其他主要方面都和华北相似，符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条件。那些不利条件，经过我们努力是可以改变的。当务之急，就是迅速建立一个“家”，建立抗日政权。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先抓枪杆子。

少奇反复强调掌握武装对于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他说：大家不要小看四、五支队，什么地方有我们的队伍，我们就在什么地方占优势。一个团住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就归我们管，就可以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如果顽固派派兵来干涉，我们就实行自卫，把他们打垮。这样，根据地就可以建立和发展。

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指示，得到迅速的发展。五支队挺进路（津浦铁路）东，在来安、嘉山、盱眙、六合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一度攻克来安县城，驱逐敌伪，大大鼓舞了路东人民抗日的情绪。仅仅三个月，四、五支队在淮南津浦路东西两侧，就由七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十二月下旬，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指挥淮南军民，胜利地粉碎了日军对淮南地区的“扫荡”，攻克了全椒县周家岗、古河等要地，缴获大量枪炮及其他军用物资。于是，民心大振，处境开始好转。

到了一九四〇年初，国民党发动了反共高潮，国民党桂系军阀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及蒋介石嫡系的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等，调动其所属部队，准备向我四、五支队及其所在地皖东地区进攻，一片乌云笼罩着淮南大地。

这时，刘少奇向我们指出，现在时局逆转，国民党“反

共是投降的准备步骤”。因此，不仅要打日军，还要准备反磨擦。他说：现在是非反磨擦不可，否则就犯了原则错误。而且，如果不在反磨擦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敌后就没有我们的地位，就没有我们的根据地，抗日统一战线也就统不起来了。

有一天，我和十四团政委李世焱去指挥部请示工作。少奇在谈完工作后，又特别叮嘱要反对“挨打观点”。他尖锐地指出：“军队嘛，就要打仗，人家来打你，你就要自卫。有些人不是这样想，等人家打上门来了，就把部队拉出去打游击，这是被动的‘挨打观点’。能够搞几个根据地，脚踏实地发展，不比打游击好吗？一旦国民党要投降，磨擦起来，我们没有根据地，力量比他们小，就谈不上抗日了，那还有什么游击可打？”他说了这番道理之后，微笑地注视着我们，眼睛里充满爱护和希望的光辉。我们也都看着领导，心里暗暗地说：“党的指示，我们一定牢牢记住。”

春节前后，十四团正在红心铺整训队伍，做群众工作。一天，接到江北指挥部从大桥拍来的“万分火急”的电报，原来李品仙的部队开始进攻我们了。皖东专员李本一指挥一三八师的二千余人为一路，阴谋以“护送点验官员”为借口，由古河向北经广兴集进犯我界牌集。皖北行署主任颜仁毅率其第八纵队及桂军主力一个营共三千余人，从定远方面直奔我大桥指挥部。由于他们行动诡秘，沿途封锁消息，当我们侦察到确切情况时，颜部的尖兵已迫进池河西岸，与我大桥指挥部仅一水之隔了。这种情况使我大吃一惊，我心里明白：七团在周家岗，八团在路东，九团在王

子城，特务团在大马厂，指挥部只有一个特务营警卫，如何能抗击数千之众呢？于是立即命令部队出发，增援大桥，我和政委骑马先向大桥飞驰，接受任务。

到了大桥，天快亮了。我走进指挥部，看见少奇和张云逸等领导正围着火盆，在计议对策。他们的举止还是那么自然，谈吐还是那么从容不迫。但地上却丢下许多烟头，想来几位领导已进行了一整夜的商谈。经过研究决定：大桥方面，特务营迅速抢占池河东岸的有利地形，准备坚守待援；同时派干部连夜动员群众，过河欢迎五路军抗日，以此重申大义，使其猛醒，避免磨擦。其余主力部队则作好准备，在必要时进行反击。

天一亮，河西已锣鼓喧天，彩旗飘扬，成百上千的群众，拥道高呼口号，声震四野。顽固派军队愕然相顾，一时不知所措。我们争取了时间，集结了兵力。当顽固派军队悍然不顾人民愿望，向我发动攻击时，我军便按原定作战方案分兵前进：北路攻打定远，把颜仁毅主力调出张桥据点，在运动中将其歼灭；南路则给予李本一主力以杀伤，将其击退，使其与颜仁毅会师大桥的企图落空。

少奇送我们出征时，又特别叮嘱道：“你们去打仗，我们去讲理，你们打赢了，我们好说话；打输了，我们就是有理也讲不通了。”接着又说：“把他们进攻我们的有生力量消灭掉，使他们感到痛、认输了，就可以了，还要给他们留一条抗日的道路。”

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三月七日，我军以七团为主，奋力击溃了南路桂军一三八师的进攻，将他们逐回古河；由

路东增援的五支队主力，及苏皖支队打开了滁县等城；我北路十四团攻入定远城，赶跑了国民党顽固派县长吴子常。

颜仁毅得报，倾巢北上，增援定远，在高塘铺与我军接触，我们作了最后的争取工作，叫他们速退原防，准备抗日，不要寻衅，滋生事端。颜仁毅不听忠告，进攻我军。我十四团与九团坚决反击，将其有生力量消灭。以后，我们按照少奇的指示，停止了对项家围子领导机关的反击，放颜部逃往寿县去了。

后来，我部队又奉命发展到凤阳地区。一天，忽然接到通知：指挥部派县长来了。这个消息引起了前线的欢腾，我立即策马前去迎接华中第一位抗日民主县长的来临。一路上，我回想起决定打定远时少奇和我们的一段谈话。

我问：“把吴子常打跑了，国民党会有好县长派来吗？”

“自己派嘛！”少奇说，“省长我们也能派出来。我们有一县，派县长，有几个县，就派专员。”

“人家承认吗？”有的同志插问。

“要谁承认？党承认你，人民承认你！”他斩钉截铁地说，“在这样革命高潮的时刻里，我们一定要大刀阔斧地工作，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我们的政权，如果不把政权掌握到手，建立根据地是不可能的。”

现在，少奇果然委派县长来了。

当我们迎上前去时，远远就认出了那位新来的县长不是别人，正是江北指挥部的统战科长魏文伯。他有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委派他作县长，可见领导上的决心之大

了。

我们为魏文伯一行解决了一些经费和给养，还帮助他做了一套制服，他就带着一批干部上任去了。

起初，我们部队都派有工作组在农村工作，这时，工作组就当区长。他们和一批士绅，几千群众，打着彩旗，开了个盛大的欢迎会。会上，宣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接着，贴出安民布告，公布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政策。几天之内，部队又打开了滁县、凤阳的一些地区。地区扩大了，随即成立了定远、凤阳、滁县联防办事处，魏文伯任主任。我们通过政权，建立了税收工作，更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成立抗日自卫队等地方武装。以后又进一步改造政权，推行民主制度，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实行改善人民生活等种种措施。由于有了政权，党的政策得以更加迅速贯彻到群众中去，使抗日根据地迅速巩固起来。定远县的政权，恰如新芽初绽，预示着江淮平原的春晓。

在路东主力由罗炳辉领导来到路西配合作战的时候，国民党的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乘机率十个团兵力进攻我路东心脏半塔集。路东军民奋战七昼夜，韩部寸步不前。最后少奇率路西主力回师路东，又命苏中挺进纵队与苏皖支队驰援，打跑了韩德勤，直迫淮河右岸，开辟了路东大片土地，成立了八个县政权和路东联防办事处。至此，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雏型，在淮南津浦铁路的东西两侧形成。因为有了自己的政权作依靠，有了根据地人民的支持，部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扭转了数月前的不利形势。

四、五月间，我江北游击纵队在无为地区遭受国民党

顽固派的进攻，退至皖东，我奉命带着十四团到该部去工作。沿途，环顾千里平原，完全沐浴在一片艳丽的阳光之中。这时，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乡乡有了抗日组织。儿童站岗，妇女支前，青壮年练操习武。远远传来雄壮整齐的口令声：“一、二、三 一 四！”我不觉挺直了腰杆，畅快地吐了口气。此情此景，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右倾错误把我党的事业导向失败，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则是唯一的能够领导我们走向胜利的路线。少奇来到华中，创造性地领导了华中的工作，就象春天降临江淮平原，立即出现了万紫千红大发展的景象。

秦蜀日记(节录)

武志平

编者按：一九三二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地区。蒋介石在调动大军“追剿”的同时，命令西北军杨虎城部协同川军田颂尧部合围红四方面军于西乡县西南巴山多山地区。一九三三年，十七路军主动派武志平去川北联络，不久与红四方面军达成了互不侵犯协议。陕南东起镇巴，西至宁强，沿大巴山数百里之线均为十七路军杨虎城部队防线。互不侵犯协议的达成，对红军集中兵力以对付主要的敌人无疑是有利的。在此期间，由西安至川陕苏区建立了地下交通线，用以传递我白区党组织与川陕苏区之间的情报，护送来往人员和运送各种物资等。武志平同志当时公开的身份是十七路军三十八军的参谋，是我党的地下党员，他自始至终参与了上述活动。他在这一时期的日记共十万余字，纪录了当时许多重要的史实，是研究党的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摘要发表的仅是十七路军同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和建立秘密交通线过程中的主要部份。

这册日记始于红四方面军进军川陕地区，终于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苏区之际，主要是纪录了杨虎城十七路军和我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的经过。在近五十年的岁月中，我在白区两次被捕坐牢，长期过着极不安定的生活。有一部分日记（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至一九三五年二月

一日)遗失了。现在这一部分日记能够保留下来很不容易；原来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以后才整理、抄录在现在的本子上。限于个人的水平，其中难免欠妥之处。我对于这一时期的工作是留恋的，因而也十分珍惜这一时期的日记。

武志平

一九三二年

十一月二十日

红四方面军之一部进抵商州、洛南地区，西安为之震动，富豪纷纷移往上海和潼关以东地区避难。

十一月二十一日

红军一部进抵蓝田附近，声势益壮。

十一月二十六日

红军一部到达鄠县，西安益恐。

王一山参谋长终夜不敢眠，进退失据，焉能指挥大军耶？红军一部进抵西安南郊子午镇、引驾回附近，西安震动。杨虎城部队一部被击溃，官兵伤亡、被俘数百人。

十二月十一日

孙蔚如^①部奉蒋介石电令，自平凉移驻天水，作阻截红四方面军西进之准备。我奉命筹划行军计划。

十二月十五日

红四方面军一部进抵佛坪。得香冀^②密报：近日由陇

① 国民党十七路军第三十八军军长。

② 香冀系十七路军四十二师武士敏旅派驻潼关之稽查站负责人。

海铁路输送进入潼关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有胡宗南、萧之楚、刘茂恩、范石生、黄杰等师。王耀武旅正在输送途中。如此则杨虎城部的势力即将反主为客，更将加深其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一九三三年

一月二十四日

何成濬自汉口电孙蔚如，讯问陇南布防情况。孙着我批复，都有些慌张了。

二月六日

昨夜九时，由杨虎城总部转来蒋介石电令云：着杨虎城部协同川军田颂尧部，合围红四方面军于西乡县西南巴山多山地区。真痴人说梦也。杨虎城来电：所有十七路军驻汉中之部队统一归孙蔚如指挥；在孙来汉中以前，暂由杨渠统代孙指挥。

蒋介石嫡系部队入陕后，多按兵不进，杨虎城颇以为虑。午后接杨虎城电：十七路军驻天水部队与胡宗南驻陕南部队互换防地，俾得统一指挥。据报胡宗南之第一师部队，其人数装备均超过一个师的编制一倍以上，且辎重甚多，武器较蒋其他部队为精良。胡为蒋之黄埔系统嫡系分子，此次调驻西北，是蒋阴谋利用红军西征的情势，调他的嫡系到陕、甘攫取西北地盘的具体行动。行将利用陕、甘饥荒之后的农民以扩充军队。

孙蔚如部如调陕南，则将与红四方面军形成实际接触。

前此分别与梦周^①、斌丞^②等所谈的计划^③如能实现，则将在西北出现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是需要实践活动来争取。应乘此时机好自为之。

二月十日 微阴 在天水

得西安电：杜斌丞先生将来天水，为之欣悦不已。

晚与梦周谈颇久，对近日有关红四方面军西征之消息作了一番分析。杜斌丞先生之来陇南，必杨虎城主任有要事传达和征询孙之意见，其内容必系为谋对红军与蒋之嫡系部队进入陕、甘之对策也。

二月二十一日 天晴 在天水

午前十一时，偕王芝瑞^④乘马向马跑泉进发，午后一时到达。稍候杜君亦到，相见畅谈颇懽。略事休息，请杜换乘我的马继续向天水进行。联镳并辔且行且谈，兴致极佳。距天水十数里处，杜顾左近无人，乃告我：前在兰州所谈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情况，以及对红军的态度果如所料，但第二步应如何利用这一矛盾，其中的困难尚难于想象，须多费一番思索。盖自红四方面军西征后，蒋介石大调兵马入陕、甘，且驱杂牌部队与红军直接作战。杨久欲独揽陕、甘两省军政大权，屡为蒋介石所阻扼，且密令刘

① 梦周，即徐梦周，地下党员，当时公开的职务是国民党十七路军三十八军秘书主任。

② 斌丞即杜斌丞，陕西米脂人，爱国民主人士，我们党忠实的朋友，当时任国民党十七路军杨虎城部高级参议。

③ 指武志平和徐梦周在平凉，和杜斌丞在西安都曾谈到促使十七路军与红四方面军联合的问题。

④ 武志平的勤务员。

峙、顾祝同扣留了杨所购买的制造枪械机器。杨对蒋衔恨甚深，杨既憾于过去与蒋之矛盾，亦深知蒋之以“毒攻毒”的阴谋；今复受其嫡系部队之威胁，更迫切考虑到自身之利害关系。欲图自保则须靠近革命的力量，此外别无他途。而蒋系部队之将领的气焰复咄咄逼人，这样就更会引起杨虎城的反感。杨如果是聪明的，应利用蒋顾此失彼时机有所作为，这样对于革命是有利的。

二月二十三日 阴霾 在天水

早晨，孙告我布置由天水至南郑沿途设兵站事。即派步兵一营出发，准备部队移防时补给粮秣及宿营等事项。兵站人员即随同前往。我对这些日常事务毫无兴趣。

午后，孙告我准备明天和他一起去西安。他系到西安开军事会议去。

三月八日 天阴 在西安

闻报：蒋介石今天到石家庄，将去保定。宋绮云^①兄来约，午后到小小食堂去会谈。

我和他谈到西北革命的形势，以及瓦解蒋势力的计划^②。他大感兴趣，并谓即介绍一个同志和我会面。

三月十八日 天晴转暖 在西安

访绮云于报社内，谈甚久。语及西北革命形势时，我们各抒所见，予以分析。绮云谓王右民^③君即日与我晤

① 中国共产党驻西安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当时公开的职务是国民党十七路军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社长。

② 指促使十七路军与红四方面军联合以削弱蒋介石力量的问题。

③ 王右民当时是中国共产党驻西安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

谈，予甚喜。

三月二十二日 天阴 在西安

早到东大街安林药铺去候绮云。约候两小时渠始偕右民同志来。我们一同到西来堂饭馆择静处谈话。时天色尚早，很少人来，畅谈颇便。右民对革命理论有修养，予甚钦佩。渠谓绮云曾将我之历史情况和我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告诉了他，已经考验是共产党的好朋友。我表示了对参加党的渴望。右民看了一下四外情况，和我握手说：经党组织研究，决定接收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你始终不渝为党工作。我以简短的言语表示了我的决心。我们很愉快的吃了一顿饭，饭罢并约明日再谈。

三月二十三日 夜间大雨今晨始止

在屋里秘密写情况材料。早饭后斌丞到来，谈很短时间即去，约以后再细谈。

到西大街长安县前小小食堂会右民，……我们选一幽静座位谈话颇方便。右民谓，除将西北方面各军队情况用书面写出之外，尤宜着重各小首领彼此之间的关系。我引《孙子》十三篇中《用间》一篇的原理，向他谈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渠同意我之见解。我提出初步工作计划。约后天再详谈。

三月二十五日 在西安

上午到东大街安林药铺候右民，到后同去碑林。渠谓，我现在的公开职务和社会关系颇可贵，尤其是当十七路军孙蔚如部以及十七路军其他各部在陕南与红四方面军直接接触时，此一作用尤大。为了迅速及时将情报送出，可设

法与红军建立联络关系，将情报直接送至红四方面军总部，并尽可能供给红军以必需的军需物资。其次是利用白军内部矛盾，争取白军，哪怕是最小的一部分对红军守中立，消极不作战，或乘机暴动拖枪投红军。当我汇报了杨虎城和蒋介石之间的深刻矛盾，应通过关系说杨虎城对红军建立友好的联系时，即决定首先应大力进行这一工作。因为这一工作如顺利进行，其他问题均可迎刃而解。我详细报告了和杜斌丞几次交谈，向杨虎城策动与红军建立联系的经过。我们一致认为有很大可能。右民指出进行这一工作的方法。当天就这样决定了。

赵寿山^①自陕南来电致杨虎城和孙尉如，系绝密亲译电。内容系说张汉民^②团长有通红军情事，请示如何处理。我获悉后即密函告知梦周，请其转告汉民严防有变。

三月二十七日 天晴 在西安

几日来，或者是由于精神有些兴奋，饮食、睡眠都觉得不正常。上午十一时，右民约我到南门外麦田畔细谈。我们谈的内容很广阔，规定了通信方法。为了保证工作的秘密，规定了我只能和他个人发生正式的组织关系，对任何人不能暴露自己的政治面目，不能发展党员，只能利用各种方式发展工作关系。如果个人在孙部发生特殊情况不能继续工作时，可自动离开，再继续和组织联系。他说：“组织亦会通过关系去找你。正因为你的工作的特殊性，

① 赵寿山，当时是三十八军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兼陕南绥靖司令。

② 张汉民当时是十七路军警卫团长，后扩编警备第三旅，张为旅长，系我地下党员。

其他同志所不能采取的方式你可以适用，不如此就不能完成任务。”且规定了联络口号以及其他。我交给右民二百元作党费。

三月三十日 天晴 在西安

几天来，费了一些功夫将四川省军用地图获得了，这又是一件既平常又复杂的事。我连同过去在潼关行营工作时^①所获得的陕西、甘肃两省的军用地图一起，整理好包扎起来，准备带汉中应用。

三月三十一日 天晴 在西安

王宗山^②对我说，他暂时不到南郑去，须赴南京一趟。此辈反动分子本不足齿。此去当然是与蒋左右拉关系。他不离孙的左右，对于孙的思想和行动都有很大影响。对某些热衷名利之徒，谈得自能合拍。

午后见斌丞先生，谈向杨虎城建议与红军秘密合作事。杜谓杨与蒋介石有深刻矛盾是不可讳言的。我谈，杨对蒋实衔恨入骨，蒋责杨以“剿”共之任，是企图两败俱伤，杨何尝不明这一阴谋。杨欲图保存实力，只有向红军打通关系。如果杨能下此决心，我愿意负责到红四方面军总部表达杨的意见。但请提到我去川北事宜时注意措词的艺术性，免启杨虎城之疑。杜说：以我和虎城之关系，无论谈什么都不会有何危险性。但你不能出面去谈，即对孙蔚

① 一九三一年春，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接替顾祝同陆海空军总司令潼关行营主任后，将行营机构迁至西安办公，武志平当时任行营少校参谋，分管地图业务。

② 王宗山，协助孙蔚如工作的参议。

如亦不能谈。如杨已决心要那样做，孙亦只有听命。此事关系重大，不能等闲视之，千万小心。你可先随孙蔚如出发，此间全交给我负责，一有好消息，即当秘密函告。别时复再三叮咛，并互道珍重。

四月一日 天阴 午后降雨 在西安

孙蔚如告我，明天即出发先到宝鸡。

午间到小小食堂去晤右民，同去游革命公园，此间亦一谈话之好所在也。他说：如果能通过杜斌丞先向杨陈说利害，第一步先使之持中立的态度亦是一个收获，然后再在此基础上逐渐深化下去是有很大的可能的……午后二时始归。临行，我二人紧紧地握了手，互道珍重，并约常常通信。

四月二日 天晴

早七时，汽车在西门外集合后，随从队伍即登车向咸阳出发。

四月九日 天阴 在宝鸡

孙蔚如军长到此后不即前进，对外即宣传已亲往前线督师矣。因杨已派王宗山以及其他人物赴南京为孙蔚如活动当甘肃主席，如果成为事实即不去陕南。我以为蒋介石既已派兵进入陕、甘，绝不肯以陕西、甘肃两省军事、行政大权付之杨虎城系统。以上所图，徒梦想耳。以如此幼稚之思想而与蒋介石作斗争，可卜其徒劳耳。

西安来电：杨虎城已去南京，复会同刘镇华、刘峙等辈赴南昌见蒋介石去了。蒋正在南昌布置多数兵力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对西北殊有顾此失彼之势。对杨施展拉拢手段实属必然，只看杨是否受他的欺骗。

四月十一日 天阴燥热 在宝鸡

得报：江西中央苏区获得伟大的胜利。毙、伤、俘将军师长两名，旅长三名，团长十九名，士兵及下级军官被击毙、伤、俘者甚众，南昌、抚州（临川县）告急，蒋已仓惶跑上庐山，狂喊重新部署军事。闻之大喜，真快事也！

四月十三日 细雨如丝 在宝鸡

午后孙蔚如告我：明天如不下雨，即由我下命令出发。我准备好了命令及出发应注意事项，着王芝瑞把行军事项准备好。

四月二十一日 天晴 在凤县

我很焦急不能很快的到汉中，而孙蔚如军长每到较大城市就下令休息。三十八军骑兵营今天由北星开到凤县，午后二时即到达，进城后索粮要草，骚扰不休。官佐以及眷属都要每人坐一乘小轿或滑杆、县吏、衙役反藉此供应之际向农民派差抓夫要钱。如此现状除用革命手段将黑暗的社会制度予以彻底摧毁外，任何办法都不足以改变。

五月十日 天晴 很热

到此^①已十日矣。终日在盼望杜的来信中过生活，梦周屡告我稍安勿躁。王宗山今天由西安到达南郑，捎来一封杨虎城主任给我的信^②，在信里虽草草数语，我觉得是一个好的预兆。急往告梦周，他说：不出三日必有好消息。晚间辗转不得入睡。

五月十二日 天晴 在南郑

① 指南郑县城。

② 见附件。

早饭后孙蔚如找我到他的办公室里。我感到他特别客气，就意识到他要谈什么问题了。我坐下以后，他叫其他人都出去，首先是对我作了一番少有的称赞，然后转入正题。他先说到蒋介石排除异己以毒攻毒的阴谋，继而说到十七路军是有着光荣历史的军队，接着又谈到红军在川北地区已经扎下了根基，三十八军本身已形成与红军直接接触的形势；蒋介石的命令左一个电报要十七路军配合川军向红军“进剿”，右一个电报要十七路军立即与川军向红军采取合围的部署，按目前这样情况，你看应当怎么办？

我说，《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千古不磨之论。据此，有两个方面是需要事先考虑到的：首先是我们自己的部队装备和兵员、弹药的补给问题，如果我们的兵员、弹药受到消耗，是不是可以立刻得到补充？如果正式和红军接触，以后是不是我们可以主动的要打就打，要不打就不打？如果不能那样，我们的人员武器一定会有消耗，可能是消耗很大。兵员伤亡多了，弹药消耗尽了应当怎样办？假定蒋介石答应给我们以补充，新兵的来源在哪里？弹药补充的问题，由西安到宝鸡可以勉强用汽车运输，由宝鸡到汉中用驮骡最少要七天才能运到。一万人的弹药需要多少汽车和驮骡？弹药是不是可以源源而来？如果不能按时运到，我们赤手空拳是守还是走？如果走了，蒋介石会对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况且，红军作战对于后方是不注意的，他可以远离根据地去寻求敌人的主力作战，因之在战略方面是主动的。我们则是处处设防，把兵力大部分配置到第一线上去了，每一个城池，每一个关口

都要把守。发生了情况，很难把部队收拢在一起，那时会陷于处处被动。所以我们应当知己知彼，才能制定方略。

其次，蒋介石对我们的补充和关心比之对于他的嫡系部队（如近在比邻的胡宗南部队）的补充有什么差别没有？蒋的嫡系部队在江西和红军作战整军整师的被消灭，从鄂豫皖边区尾随红四方面军的所谓中央军，也是采取了送行的方式，不敢和红军接触。我们直接和红军打起来是不是有把握必胜？如果我们弹尽援绝了会得到一个什么结果？这仅是就十七路军团体本身的利害来讲。再进一步从民族生存方面来讲，蒋介石的“攘外安内”的政策，许多人都认为是卖国政策。共产党和红军已提出了在三个条件^①之下愿意与国民党的任何军队订立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协定，这个口号是会得到全国人民和进步团体、爱国人士的支持和同情的。我们十七路军有着光荣历史，有着革命军队的称号，我们应当把十七路军这一部分力量用到对国家民族有利的方面去。现在蒋介石挥舞着中央的大旗，睥睨一切。我们不能为蒋介石打天下付出很大的牺牲。

孙军长很沉静地说，你的意见是好的。不过有些地方是按最不利的方面来估计的，情况不会都是那么恶劣。打起仗来有胜有败，并且不论胜败都会有伤亡，有消耗，那样对我们是一种无谓的牺牲，我觉得很不值得，所以我才找你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指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宣言中提出同任何国民党部队订立抗日协定时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停止进攻红军、给民众以自由和武装民众。

我再引申了一下我的意见，我说，两军对垒绝不能超出战、守、走这三个范围，如果以上这三个方面都有矛盾得不到解决，那就需要在策略上考虑到“和”的问题。

我说到这里，孙军长说：共产党和红军是不是能讲和呢？

我接着说，这在共产党的今年一月宣言里已表示得很清楚。作为一个革命政党，他的一切宣言和声明应该看作是真实的。我们可以在西北为之首倡，这也是千载一时之机。何况这不仅是于我们本身有利，对于民族的存亡大计尤关重要。能博得人民的拥护。

孙问我：你是不是和共产党方面有关系，可以把我们的意见传达给对方？我们的决心，就是可靠的保证。

我表示：虽然过去没有关系，我也愿意作这个和平使者。

谈到这里，孙很兴奋的说：容我再考虑考虑，你也回去好好想想，晚间我们再谈。又说：这一次谈话的情况与任何人都不能讲，如果泄露了机密，对十七路军的前途关系很大。

我找到梦周，同到他寓所，谈了一下今天的情况，最后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认为，王宗山的匆匆来南郑系代杨虎城向孙传达与红军“和”的问题。这是事实所迫，不得不如此，我们不能认为这就是他们的进步。因为有王宗山这样的反动分子参与这项机密，显然是企图保全十七路军实力的一种策略。王宗山既然在蒋介石左右不得意，就企图在杨虎城这方面造成于自己有利的局面，如果要是

诚心诚意的和共产党合作，首先就触犯到他们本身的利益，所以我们只能作为他们的一种策略看待，对他们要提高警惕。但是我们也要积极争取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日趋好转，利用种种机会和方式多做工作，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揭露蒋介石的阴谋诡计。杨、孙对蒋积憾很深。他们之间的这些矛盾是我们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

晚七时到孙蔚如处，王宗山已先在。我们彼此重复了上午的意见，王不断用他那一双狡猾的近视眼望着我。最后，他们同意我进入苏区去作使者，并研究了进行的方式。确定由孙写一封亲笔信，提出他们的意见。为了使信便于携带，信是用白绫子写成的。孙先拟好了一个稿子，我们共同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不过是在形式上表明态度，主要还须看实际行动是否真诚。信的开头的称呼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钧鉴……”最后由孙蔚如军长署了名。并确定我明天一早就出发。我说，如果没有什么事，我就不再来见你们了。

回到寓处准备了一下在途中应用的东西。打听了一下在川北白区通用的货币：第一是鸦片，其次是银元，但是这两者带多了都足以致祸，且亦携带不便。

把情报、文件和地图都仔细的包扎好，并用油纸包裹，黄蜡封固，准备好了携带的东西后才就寝。

五月十三日 天气晴朗

我起床比往日都早……今天一共走了八十里。

五月二十一日

过了浮桥就是两河口。这里是赤北县革命政府所在地。

见有伤员自空山坝前线回来，知空山坝正在与川军激烈战斗中。我在县府西侧一家铺房里见到了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同志。经自我介绍后，即承殷殷招待。他招呼一位青年同志给我打水洗脸取衣服，给我换下泥污的衣服去洗。一方面给我准备菜饭。我感到真是到了家了。傅钟同志的态度诚恳，温和的象一位学者，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他对我谈到前方的战斗，谈到目前的革命形势，使我耳目一新。我即将所带文件^①和地图等物交给他。

五月二十二日 天晴

早晨傅告我：地图等物已着人送往总部。让我在这里休息一天再去苦草坝总部和负责同志见面。从街里经过的运输行列正在往前方输送食粮和盐。据说：前方战事颇占优势，川军已呈动摇模样。傅和我谈到革命的主要敌人和革命后备军的问题、土地革命在当前的重要意义。我过去对于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在思想上极为模糊，经此次谈话之后，殊有胜读十年书之感。午后见到从前方运回许多战利品，主要为军械，男女老幼都踊跃参加了运输。由此可以证明前方已取得辉煌的胜利。这对后方群众起着很大的鼓舞作用。我连日所接触到的同志——无论是红军战士或政工人员、地方干部，多诚挚可亲，都在勤勤恳恳的做自己的工作，毫无浮夸之气。在旧社会里的狡猾、欺诈，在这里不复存在……从前方运送回来的伤员，许多用旧纱布和普通土布裹伤，医药缺乏的程度可以想见。我向傅钟

^① 文件是指当时国民党军队中使用的信号、口令、地对空联络信号、识别旗、密电码等。

建议解决这一方面困难的办法，即在根据地边缘建立一些小型的“自由市场”。商人有利可图，敌人封锁再严密也能找空隙钻过来。但须制定出一套保护、控制这类市场的办法。这是在和陕南西乡县黑风洞的土匪袁刚谈话时就有了这样启示。因为袁曾说：他们如果断绝了小行商的往来，就等于自己封锁了自己。我认为这是一个实际问题。是正确的意见，不论是出自什么人，都不能减掉它的正确性。我报告了在松坪子被袁刚匪部劫掠的经过。傅给予我很大的安慰和鼓励，他说：冷静、沉着、机智缺一不可都逃不出来匪窟。傅对袁匪的情况掌握的相当清楚。根据袁匪的特点，着我以个人名义给袁写一封信。我在信里给袁刚指出三条道路：一个是将所有人枪归红军改编，听候调遣。指出只有革命的政权和军队才能够原谅他的过去。现在整个社会情况已经改变了，不是过去可以横行绿林的时候了。另一条道路是表面守中立，实际要保护、鼓励从陕南方面来的商贩运进根据地里所需要的商品，到根据地边缘自由买卖。严格禁止打劫商旅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限制，但可以由他抽取适当的过境保护费。红军以及政工人员路过他的驻地时，要妥为保护。最后说，他要是不顾大义与红军采取对立的态度，必定要使他自已首先灭亡。并说明这三条道路的最后一条是绝对走不通的。这封信由地方通过关系给袁送去。傅给我一册油印的列宁名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我当晚即读了十数页。

五月二十三日

今天夜里由前方运回大批缴获品，枪械弹药堆积如山，

至早仍源源不绝。早饭以后、傅告我苦草坝总部来电话叫我速去。至午，由小裴送我起身……我和小裴在路上闲谈，知道了许多红军英勇奋斗的经过。在路上见到红军部队一部迎面走来。战士多为青年，队列很长，都是勇往奋进，活活泼泼的，一边走一边唱，指挥员和战斗员的服装很难区别。我一边走一边想了几句诗来形容红军：

初到川陕根据地有感

夜渡关河险，浑忘蜀道长。
貔貅多整肃，瘦狗尽消亡。
羽檄传荆豫，壶浆遍雍梁。
红旗招展处，映日有辉光。

将晚到达长坪，小裴同志引我去见张琴秋同志。在我没有来到根据地之前，见到国民党的报纸，尤其是四川的报纸登载了许多关于张琴秋同志的传说。又听到徐耀明^①和袁刚等匪部的离奇的传说，简直把张形容得好象《封神演义》中的人物。今天见到了，我感到她是一位很有修养的革命家。她蓄着短发，穿着很整洁的哗叽制服。她一边招待我们，一边询问白区的情况。晚间我已躺在铺上，张复来告我：苦草坝方面负责同志打来电话，希望你很快的见见面，并指示我们好好招待你。我答应明天一早就起身。

五月二十四日

早晨仍由小裴同志伴我出发……当我们走到一个小村

^① 徐耀明原为川北地方民团头目，其部队常驻在川北边缘地带，鱼肉百姓，实乃土匪。

落时，见迎面有几个乘马的战士，到了面前问我姓名。原来他们是总部派来迎接我们的……行数里即到苦草坝。这里有很长的一道街，两旁房屋驻满了机关，门口都挂着鲜明的红旗。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川陕省财经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员会……许多党、政、军事机关都设在这里。我被介绍去见总参谋长曾中生同志。他虽然正患着相当重的病，还很兴奋地和我谈话。在屋子里布置了许多标语：“无情打击右倾机会主义”、“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托陈取消派”、“严防立三路线复活”、“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还有其他。

曾中生同志着人为我煮白木耳吃。我将入苏区以前的一些经过谈了一下，复谈到杨虎城、孙蔚如对目前革命形势的看法、蒋介石嫡系与非嫡系部队的矛盾等等。我提出争取杨虎城部队与红军建立友好关系，或最低限度争取他们守中立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有利方面。曾对每一个情况都作了分析，指出每一个有利和不利方面。

晚间，张国焘来此，曾中生同志先作介绍。我开始谈我来此的经过和意见。关于敌区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尽我所知者作了比较详细的报告。对于陕、甘两省的军事情况谈得较多。我以为，川陕苏区北线在军事上目前并非重点。因为在陕南，东起镇巴西至宁羌^①，沿巴山数百里之线均为杨虎城的部队。从杨虎城对红军的态度上以及其军队的实力上讲，都不必过虑。如红军主力集中在敌人的主要方面，陕南之线仅配备少数部队即可保无虞。另外，

^① 宁羌：即今之宁强。

在蒋之系统中，不满于蒋之鸱张拔扈者颇多。他们认为我红军不同于以往的任何军队，无人敢于用连横、合纵的策略施之于共产党。蒋之反动宣传使党和红军的政策受到蒙蔽，使得某些杂牌势力陷于游离观望，不敢倡议联合。实际就形成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使革命在军事方面的形势长期陷于四面包围内线作战的状态。我川、陕苏区的红军当前发展的大部地区还仅限于田颂尧的防区范围，其他军阀尚存观望态度。目前，我们的阵地收缩的愈紧愈容易控制主力在适中的地点，如乘机突破敌人的一点逐渐扩张战果，首先消灭直接作战的敌人，则能取得各个击破的效果。其他军阀企图各自保存实力，就会越加考虑到他们自身的利害关系。根据目前情况判断，四川军阀在实际上绝难统一步调向红军进攻。已经编入战斗序列的部队亦是各怀猜忌，不肯认真作战，且军队的素质都比较差。陕南方面，我们可以获得可靠的情报，并且以陕军目前的情况来看，绝不肯对红军有真正的军事行动；如果能作到友好的联合这一点，则问题更易于解决。否则在苏区与白区之间适宜地点设置一个交通站，情报朝发夕至，可以从容应付。把后方暂时依托在巴山、川陕交界的地区，这样就可以节省下来许多兵力，用之于主攻方面去。关于陕南军事情报方面现在已有了基础，还可以继续巩固扩大而求得更准确迅速的传递。这样就可以作到料敌制胜。做到知己知彼。

有些话，我是很大胆的说出的，有的地方真是鲁班门前弄大斧。我最后补充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月宣言，虽然是用布告的形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

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的，国民党统治地区也会见到。但他们仍不敢贸然派一介之使来和红军谈判。今杨虎城、孙蔚如等既然敢于这样做，在西北地区来说还是大胆的尝试。我本来计划着见到川陕地区负责人首先应谈些什么，报告一些什么，但到了这时完全打乱了，激动得不知从何说起。尤其对于曾中生同志，他的斗争经验那样丰富，理论那样的渊博，使我这初生的犊儿十分佩服。曾对我的所谈，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仅对杨、孙诸人的态度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今天的感觉可以耳目全新形容之。

夜深张国焘走后，中生和我床铺相接，继续又谈了一些问题。他对我说：你现在已经不是仅仅憧憬着革命，不仅仅是共产党的朋友，而是你已经和我们站在一起来革命。不过你的岗位是在白军内部。这一个岗位非常重要，它的作用是不能以言语估量的。我以他有病不多谈，他还是很兴奋的和我谈了许多实际问题。为了工作忘了自己，这种精神表现出他是一位有高度革命修养者，是一位好领导者。夜间，中生咳嗽不已，我亦辗转睡不着。我想到在汉中为他买些特效药，即向他说了，他表示同意。等待苏井观医生来时开出药名。苏是天津一个医学专科学校毕业的。人极诚恳。

五月二十五日 在苦草坝

午前郑义斋^①等数同志来谈。苏井观同志来为中生看

^① 郑义斋，红四方面军后勤部长。

病。谓中生宜多服补药。我说下次来时可以带几瓶“帕拉脱”给他服用。电台负责人为宋侃夫同志。他曾谈到我所带来的军用地图是最宝贵的东西，且谓全军只此一份。我觉得这样毫无隐饰的态度是对我的相信，我为此感到兴奋。曾中生谓徐向前等同志均在前方指挥作战，现在不能抽身和你见面，以后机会很多，但他们都从前方来电话问候你。并告我，最近空山坝一役，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

午饭准备了好多菜，且有玉蜀黍酒，张国焘、曾中生、郑义斋还有其他几位同志和我在一起吃饭。最后每人一大碗银耳汤。他们告诉我说，明天可由徐以新同志和我一起去汉中进行工作^①。郑义斋同志和我谈所需要的物资问题，苏井观同志开了一张所需的药品单。中生给我几本油印的刊物和理论书籍，印的很精美，使我耽读不倦。中生几次对我说，可以随便到街里街外去走走，但我很少外出。

五月二十六日 大雨 在苦草坝

因大雨未起程。以新同志来谈很久。

五月二十七日 天晴

早晨，窗外啼鸟催着我起了床。天色已晴，即收拾行装准备出发。中生病益加剧，今天拟送往医院，临别颇有怅惘之意。以新来到，我们即与中生握别，并愿他安心静养，

^① 红四方面军军委决定由徐以新作为四方面军的代表，到汉中与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进行谈判，并对谈判方针规定了三点：一、了解对方意图；二、了解杨虎城十七路军内部的情况；三、尽可能在杨虎城、孙蔚如内部找到可以争取的人。（徐以新：《回忆川陕根据地时期与杨虎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十辑161—162页）。

不久当将药品买回。起身时，几位负责同志都殷殷嘱咐凡事多加警惕。我们一行数人带马两匹起身，十里到小坝。

五月二十八日

清晨，都先后起来收拾行装。大家同意取捷路去平溪坝，可比走大路近十几里……十数里后上一陡坡。由许多征候看出，数日前曾在此地激烈战斗过，道路两侧足迹很多，树木有被伐倒者。登山顶后，见所掘之掩体仍保持原样，大树砍倒作鹿砦。战士们所遗的擦枪布片、布条很多，阵地向左右延伸蜿蜒曲折，一望无际。同来的一位战士告我，数日前，川军田颂尧部主力即开始向我进攻，我军在此线上屡次打退了敌人的猛扑。最后田颂尧部复全线向我采取攻势。我们在此地集中火力歼敌，并通过人迹罕见的森林向敌人的侧翼包围，将敌人全线击溃，打死、打伤、俘虏敌人的官兵尚未清查。我们经过的地方血迹凝结石上和地面尚可辨认。

午后到柳林溪，问农民，据说离平溪坝尚有三十里。

在路上见稻田早已分配给农民，在田埂上都有木制名牌注明亩数。有一小部分标为红军公田。地方初经收复，秩序尚待调整。路上，在一家店子里遇一个受了伤的川军，因为伤在臂上，由他自己走着到红军医院就医。他见到我们很有礼貌，对我们侃侃而谈他被俘的经过，丝毫没有畏惧的样子。我认为正确的俘虏政策对川军将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

五月三十日

到南马山，这里已是红军北线最前边的一个哨所。过

此即为游击区，警卫人员到此不能再送。我和以新将准备好的化装衣服换好。以新穿着一件短皮衣，包上青色头帕子，他自己看了一下衣服就笑起来了。他说，这样男不男，女不女的样子能成吗？他又看了看我说：你也不象一个老百姓。虽然牵上小猴，也不象一个耍猴的。我说：至少对敌人有些麻痹作用，利用敌人迟疑的时候随机应变。这里的指导员很严肃的向我们介绍了前方的情况。他说：今天上午，我们由十几名战士组成的游击小队，由于麻痹轻敌，在通西河口一个险弯的地方遭到敌人的伏击，伤亡三、四人。大部队赶往时，匪已远逃，所以前去须要小心。因系化装到敌区去，亦不能派武装相送。我们以为正宜乘此紧张情况刚才过去的时机通过西河口。一到天池寺附近，我有公开的证明，就可以安全过去。我和以新一前一后，我肩上扛着小猴，一路上作出安闲的样子，侦察着情况前进。走到一个道路大转弯的地方，地上有血迹，即今天我游击队遇匪处……。约两个多小时走了二十五里路即到西河口。离西河口不远的地方，见高处小庙旁边有两个老百姓模样的人在那里张望，形迹有些诡秘。我和以新商量，有事由我应付，以新看我眼色行事。以新对我说：“我们都是由炮火中成长起来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足怕，请你不要照顾我。”在西河口街头关帝庙前过了河，一个穿短衣服的人手里握着一把杀猪用的“青条子”刀，奔着我们来了。我急忙走前面，从路边拿起一根烧火用的大木棒，迎着那个家伙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也反问：“你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指着天池寺方向说：“我们是上头的。你不准接近我

们，免得发生误会。”说罢我们就走了。我学唱着四川的山歌子向羊圈关方向走。那个家伙有点莫明其妙的站在那里看着我们。我再一次回头时，他们又增加了两个人。我和以新加快速度，过了大湾，进了羊圈关的口子，就觉得情况和缓了……过了卡门（天池寺的关隘）即到岭顶上。天池寺有陕军哨兵，我和他们的营长白少周相识。正值白草屋里出来，我们见面说了几句寒暄话，就顺利的通过了哨所向回军坝前进。到回军坝没有停，前进到青石关，天色已晚，即住在陈家店内。今天一共走了一百六十里。

五月三十一日

早从青石关出发，下了坡就到小南海……过祖师殿后，我们商议到南郑后在工作上如何分工配合的问题。并研究了一下可能发生的情况。这几天来和以新食、住、行都在一起。当我们通过四十五里长的由南马山到天池寺的危险地带时，我的心情是十分紧张的。那时候，我总是盘算着如何才不致发生危险，发生了危险情况应当怎样应付。我对于以新这样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那样沉着有见识是相当钦佩的。现在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我们又把如何进行工作作为我们的首要问题了。祖师殿过河十里到芦家沟，五里到边家山，十里是大河坎，已到汉水边。渡过汉水到达南郑城。

王宗山见到我很喜欢，向我问长问短，说我很辛苦。我和他敷衍了几句，领他去见以新。他本是一个流氓式的政客，我恐以新不耐与之应付。然竟出我意外，他把王二^①应

① 即王宗山。

付得很好，每句话都谈得很中肯。王二则大吹其牛，有的是当面扯谎，矛盾百出。他说，他过去曾在黄埔学校当过秘书，和共产党人很接近，他举出恩来、太雷诸同志的名字。但是他又说对共产主义有怀疑。最后他说：“他（指我）曾将中共中央一月关于在三个条件下愿意与国民党任何军队订立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协定的文件（在川陕苏区是于五月间用布告形式发表的）抄给我们。看了之后，就更促成了我们下决心与红军首先建立互不侵犯的协定。因为杨虎城、孙蔚如诸先生是有这样一个动机的，加以某些同志的屡次提议，这样就更加强了我们的决心。虽然我们的来往至少在目前是不能公开的，因为蒋介石的力量是不可轻视的。如果这一行动被发觉了，对红军、对十七路军都是不利的。”随后他又说了一些无意味的谎话，约定明天上午到他住处和孙蔚如会面，顺便招待我们吃午饭。以新同志对王表示：红军所以愿意和十七路军来谈判，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是代表全中国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所以不同于过去任何派系的谈判。这里边不存在丝毫少数人利益的成分，是大公无私的、真诚坦白的。至于蒋介石的力量，共产党和红军是领教过了的。问题在于蒋介石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他的力量是有限的，不足畏的。谁要看不清这一点，就一定被蒋介石所吓倒，使得自己走到错路上去。必须知道，新生的力量是不可侮的。

我们回来之后，分析了王二的谈话内容。我们认为，王二所谈的，无疑代表着孙蔚如的意见。他们一方面怕红

军，怕自己和红军打起来受到损失，一方面又表示他们仍不愿意离开蒋介石，反而夸张蒋介石的力量引以自重，想在红军和蒋帮之间买空卖空，投机找空隙，以图幸存。但是从杨虎城和蒋介石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他们对蒋时常用假情况报捷这一情况来看，还不至于在蒋同意之下搞缓兵之计，以欺骗红军。孙本身在思想上是保守的，他的气魄识见是大大逊于杨虎城的。再加上一个反动分子王宗山为之策划一切，这就会冲淡了某些进步的因素。当然情况是会不断变化的，我们要争取局面向好的方面转化。

六月一日 在南郑

早晨，我和以新到原建设局地址（现作王二住宅）去赴孙之约。我们到达时，孙蔚如已先在。王宗山作了一番介绍之后又谈了几句不必要的客套。谈到正题时，孙所说与王二昨天所说无什么新的内容。孙总是反反复复的说：红军在川北不如西去甘肃或者到更远的一些地区去开辟苏区为有利。如果红军与蒋之嫡系胡宗南接触之后，十七路军绝不乘朋友之危，依然是暗守中立云云。其目的显而易见。这样就使得谈判难有更积极的成就。但是，尽管谈判本身进展不大，也要努力使谈判继续下去，因为在双方谈判的情况下，有利于我们秘密的进行党的工作。我在西安接受任务之际，上级组织就指示要我这样作的。

以新同志曾对孙、王谈：我们中间不能存在有任何自私自利的企图，因为那样就会损害了整个民族的利益，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来说是绝对不会出此一着的，那样会影

响到广大人民对革命的信仰。如果那样做了，也是非常拙劣的策略。以新从“九一八”一直讲到现在共产党和红军所提出的各项声明和实际行动，反复的解释党和红军对待中国当前时局的主张。但孙对于这些似无兴趣。他们所注意的是个人利害关系。

这一次的会谈，进行了有两个多小时，所得的结果则是首先建立一种君子协定。我当时感到王宗山他们缺乏远见。他们频频以红军速离川北、陕南边界为念，对于国家民族利益、在抗日救亡方面则没有正式谈过一句。仅是用一种恳求式的词句，希望红军速离自己的防区而与其他部队直接发生战争，使自己军队力量获得保全。这无非是想藉此争得一片地盘，在蒋介石鼻息下求得一点个人享受。这乃是资产阶级的本性，尽管他们内部有矛盾，对革命力量总是惧怕的……如果说杨虎城还有比较积极的因素，而竟把这—个重要的问题委之于王宗山等辈未免所托非人了。

至于互不侵犯一层，孙蔚如随时都有背弃的可能。但是我们应该利用这一个开端，使党和红军的一月宣言在政治上扩大影响，在实际中发挥作用。任何野心家企图对党和红军予以利用以达到个人的目的，都是可笑而愚蠢的！

我们在王二家里和孙、王共同吃了午餐，饭罢就告辞回到我的寓处。

上午王芝瑞同以新到街上去游览。我找来缝衣工人为以新制衣服。以新既然到外边来工作，就要在这些方面适

应社会情况。

买到两种补剂给中生同志，并给其他同志买到一些应用物品。让人到西药房里按单购买药品和自动武器用的擦枪油和它的代用品。这个小小的城市忽然有了这样一个大主顾，顿然觉得有些活跃起来。我们还说要他们继续备货，并提出品名和大概数量。

六月三日 天晴 在南郑

午后，准备好回苏区的物品和扁担箩筐等物。买了几块油布，防中途遇雨。给徐一百块银币，由他到街里去购苏区所需要的零星细小的物品，以备回去给其他同志。晚间找电台主任封宗召，要到几样电台零件如火花塞、活塞圈等物，这完全是个人的关系，否则有钱亦无处买也。我另访了几个朋友汇集了一些情况和文件。

六月四日 天晴 在南郑

确定明天起程回苏区，将所有的东西作了一番包装和检查。雇妥了脚力。我找到几份空白护照，准备在路上使用。

午饭后我同以新去找王宗山告给明天起程。王虚伪的客套使我很感到难耐。

六月五日

在城里住了四天，觉得初步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使命。这里边包括着开辟川陕苏区北线的交通路线和经常的情报递送问题。尤其是利用这一关系运回一部分急需的物资，使我精神感到愉快。

早晨，先着人持着护照将物资运出城，并嘱在路上应

付检查的具体办法。我同以新乘马起程，过了汉水又踏上
来时路。

六月六日

到凉水井……晚间支板作床，与以新同住一张床上。
晚间躺下谈了约一小时，就入梦乡。

到达之后，即将挑夫等给以厚酬，着其回南郑去。并
约以后还要请他们帮忙，他们很高兴的称谢之后便走了。

六月七日 天晴

以新化装持通行证一早去南马山。我在凉水井看守物
资，不时出外瞭望。午后一时许，先来便衣战士数人持以
新函找我接头。继之大队人马到来了。朱老汉、张老婆婆
及一任姓妇女不知底细，均仓皇北去密林中隐匿。朱老汉
吓得不知所措。这实在是我事先没有布置好。将物资分装
于战士们的背篓内运走，我送至羊圈关口才回。

这种情况再保密也是瞒不过人们的眼睛的，浩浩荡荡
的这么多人到这儿来，谁能认不出来呢。当地民团老百姓
都认识，来踪去影也可说人人皆知。稍顷，房主三人都回
来了，我告以无事。我向他们说明，我在这里还要住下去，
住在这里对他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谈得很好。我们
既已确定从这里作转运站^①，就必须做好群众工作，和他
们打成一片。他们的消息是灵通的，如果不搞好与群众的
关系，就会使自己耳目闭塞，无法存在于这里。晚间听说

^① 以凉水井为转运站，建立了一条由陕西通往川陕苏区的秘密交通
线，以传递情报、护送来往人员和将各种物资运往苏区。凉水井、羊圈关
相隔很近，所以有些地方把转运站叫羊圈关。

天池寺白军全部撤走了，不知何故？反而使我感到无所仗恃，有白军在，民团土匪则不敢来。他们也吃不透我是怎么一回事。

六月八日

张老婆婆告我：昨天我们来到不久，即有徐耀明部匪徒来到东山头上向我们住处窥伺。并说，羊圈关附近有几个人在那里张望，当见我们部队到达时就慌张的逃走了。根据这样情况看，这个地方的住户里必定有通匪的人，否则匪徒不会这样消息灵通，也说明了这一地区土匪势力相当强。我考虑怎样争取群众和预防土匪肆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求助于人，我只能自己想办法。午前大雨一阵，屋后小河里水声如雷。闻天池寺岭上又有陕军到达。

午后，林匪（林刚）带武装匪兵到我处来，据说是代表徐耀明前来向我联络。我首先请他向徐匪致谢其前次帮助我去黑风洞，并说明在那里见到了袁刚并受到款待。然后又谈到我在这里有特殊任务，请徐以朋友关系不要在西河口这条路上骚扰，彼此之间都需要帮助。并告给他：过几天我还要去见他。我款待了林刚，他很满意的回去了。

午后，一战士穿便衣到此，送到以新函一件，背篓一只，里边装着一些蔬菜。另有张广才同志^①函一件，希望我直接和他多联系。我即写信交来人带回，告以有事即和他联系解决。

我因为处在这种情况下，既不便公开携带武器，又不

^① 红三十八军政治委员。

便多数人在一起，手枪一支，仅以自卫。这里的环境是在白军、民团、土匪活动范围之内，真是危机四伏。我的行动又为群众所怀疑。但我所以能够在这里存在下去，亦正因为他们难于了解我的底细，如果我的真实情况被他们知道了，那就会产生许多困难。这正是“戏法”人人会变，手法各自不同。

六月十日 天晴

张广才同志由碑坝派人送来表四只，银币十三元，嘱为修理和买裹腿。我即派交通送往汉中，交王芝瑞找匠人速为修理。西河口今天逢场，有附近农民赶场。我派人到场上去购置物品并了解情况。

六月十二日 在凉水井

清晨，派人到碑坝去送信。被告知：陕军王志远部受胡宗南挑拨离间，已脱离孙蔚如部逃往川北广元，受胡宗南直接指挥。杨虎城、孙蔚如对胡此举衔恨之极！胡宗南佯为不知，派人向孙假意调和。嗣以既成事实，即允将王部归胡指挥。六月七日，孙蔚如迅速调天池寺部队回牟家坝即系对此事件的紧急措施。缘以天池寺、回军坝、牟家坝一带之驻军均为王志远部之陈际春团驻扎，陈虽与王不睦，该团早已归孙直接指挥，但该团中官兵与王志远之其余两团关系较多，恐其乘机生变。敌人内部的矛盾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这是明显暴露出来的一件。

六月二十二日

午后，以新同志着人送来一封信。通知我到西河口去接他。我即动身，到西河口时，天气很热。不久，即见以

新自南马山方向只身走来。我迎上前去，相见亲切逾恒。我们且行且谈回到凉水井。亲自动手煮饭烧菜，共吃晚饭。晚间与以新研究此次去陕南如何与杨、孙方面谈判进一步巩固互不侵犯协定的有关技术方面的问题。

六月二十四日 天阴

我借马两匹与以新分乘。

我们过了祖师殿，在平坦的道路上且行且谈。我们谈到许多革命事迹。谈到南昌起义时以新即为亲身参加之一人，彼时年甫十数岁……过汉水入城先到寓处休息。新居在县街建设局巷对面，租自孙姓西房三间。

六月二十五日 天晴 很热 在南郑

今天购得一些目前苏区急需的物品，还买了一些补品供患者用。将药品均用油纸包装，藉防潮湿。将不便公开携带的东西另置妥处。

晚间甫自外面回来，孙蔚如即派人邀以新和我到王宗山寓所会谈。关于互不侵犯协定问题谈得最多。以目前情况分析，杨、孙也只能作到与红四方面军在口头上达成互不侵犯的协定……今天所谈的结果，是双方都进一步肯定了上次达成的互不侵犯协定。

六月二十九日 在南郑

上午我去见孙蔚如，谈约一小时。回来将交谈内容和以新复述一遍并加以研究。孙谈，红军如能西进实为上策。我说，从革命形势上分析，中国共产党是有一定政策的，并不是见仁见智之不同。其他人只能有所建议，但不能强其必行，孙默然。

六月三十日 在南郑

午后，孙蔚如约我去谈。谈到红军有向宁羌前进之模样。我答：在两方面未公开宣布合作以前，小的接触势所难免。只能就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互相协商，避免发生，或少发生使双方感到不愉快的事情。尽量使局部事件不致恶化下去。谈后孙颇有不悦之色，我即辞出。

午后，和以新商定明天起程回川北。晚间复往告知孙蔚如。孙没有再表示什么新的意见。

七月一日

早晨和以新趁凉出城。委托妥实人押运物资前进。我们乘马到牟家坝后步行前进。

七月九日

凌晨由板桥口起身。这一段道路较为平坦，我们走得很快。到青峪口，有总部派来人马迎接我们，遂乘马前进。午后二时即到达总部所在地辛场坝。到后即到郑义斋同志处休息，交割物资。他将上好的东西慰劳我们。由于天气暑热，在村头山麓下觅一巨屋安置我们住下。吴永康同志^①正因病休养，我们即居住在一起。他曾在上海作地下工作时间较久，主办过革命刊物，知识颇渊博，青年时曾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学工。谈到革命理论和他多年的实际斗争生活，使人忘倦，和他在一起觉得那样亲切。他诚恳的态度使我和他谈话毫无顾忌。

七月十日

^① 广西人，后为红四方面军供给部长。

我来之前在这里曾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墙壁等处标语尚完整如新，充满战斗气氛。

在此之前，红军曾主动撤出通江、南江、巴州等城市，收紧阵地于巴山一隅。现在，不但恢复了原来的苏区，并且比原来苏区扩大了很多倍。田頌尧部已溃不成军，其他军阀亦惊魂丧胆，逡巡不前。现已提出了“消灭刘湘、赤化全川”的口号。

七月十一日

天气很热……我开始写陕、甘两省的综合情况，对河西走廊写得更详细。我受了一般人的宣传，认为红军很有可能企图打通国际路线，但又无从证明这一点是否属实。由于我有了这样的考虑，又以过去曾受宋绮云同志之托，调查河西走廊的情况至今记忆犹新。我认为，如果红军真要靠近西北，便利对国际上的联系，河西走廊和几百里的沙漠是一段艰苦的途程。河西三州南阻祁连，北连朔漠，地荒人稀，民无积粟。大军到时粮秣都感困难，又不允许分散行军，且一年中只能于秋季行军。在沙漠中更缺粮水，敌人空军对沙漠中行军的大兵团威胁性很大。且马家军多骑兵，步兵与骑兵作战（尤其是野战）一般是处于劣势，尤不可不预先估计在内。故于此再三致意。

七月十六日 在辛场坝

将陕、甘两省情况写完了。晚间张国焘，还有几位同志未通姓名（我亦不问为谁），来谈甚久……张对于工作指示颇详。

七月十八日 早天晴 很热

清晨，与吴永康同志等握别。

七月二十一日 在凉水井

身体觉得不快，未出发，派人侦察新路线^①。

七月二十九日

给曾中生同志写信一件，告知陕南方面军事调动的情况。派人将情报、地图和一部重要物资送到碑坝。

八月二日 在凉水井

由南郑转来寄到的报纸、刊物等一大捆，即派人送往碑坝交通站转总部。

八月七日 在凉水井

碑坝来信，知郑义斋同志已到碑坝，邀我去碑坝谈工作。

八月八日

早由凉水井起身，过西河口时，街上静悄悄的，未停即过河南走……过南马山十里左右迎面来一通信员，交给我信一件，系陈昌浩总政委着我去通江面谈工作。到碑坝与义斋同志会面后谈很久。他对我颇鼓励。我告义斋将此间工作安置一下，并由我去南郑汇集一部分资料再去通江。

九月九日

终日小雨不断……晚间，义斋派人来引导我去城里（即通江城里）见陈昌浩总政委。到达后义斋、传六两同志已先在。少停陈昌浩来，对我备极安慰和鼓励。我首先将

^① 即准备建立的新的地下交通线。

在陕南和杨、孙之间的联络情况汇报给他。他提出了一些问题，我即分别回答。最后他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的广大的土地，所以党提出了愿意与任何国民党的军队在三个条件之下，订立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协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卖国政策。蒋对日寇侵略东北和淞沪，进兵长城各口漠不关心，而亟亟以“剿共”为要务，应在广大群众中揭发他们这一阴谋。

十月二十四日 阴

吃罢早饭即起程……晚住麻桑坝。

十月二十五日 晴

午刻越过天池寺到凉水井住处。少刻，张广才同志来函说，有一批物资输出白区者，现在西河口。即去迎接，归来已昏黑……送交张国焘主席函一件。

十月二十六日

白军将天池寺通西河口之桥梁全部破坏，群众颇不满意。谓此数桥，皆为西河口乡绅地主毛、赖两家倡议修建者，虽然取之于群众者居多，但群众称便。即从纯军事观点来看亦系愚蠢之举。作战岂有从隘路仰攻敌人者乎。山深林密，到处可以用兵。我估计此乃奉其上级之命，阻我向苏区运输物资者，但是我又何尝比他们更愚蠢，放着隐蔽小路不走，而在大路上浩浩荡荡运输秘密物资。无疑是有入向孙军长说了闲话，乃密令防我。

十一月五日

群众来报告，有徐耀明匪残部百余人由原匪排长王杰带领在大西河抢掠。晚间，匪窜扰西河口，被红军击溃，

打伤数名。吴永华派人来送信，报告广家店及袁匪情况。

十一月六日

苏区交通员来送信，附有以新个人信一件，即复信由原人带回。我反复看了徐信，不似亲笔，深致猜疑，为之不快。

十二月七日

为了物品被检查事^①我想了许久……想到运普通物资被黄团检查事，颇费深思。

十二月十日

凌晨起身……回城市^②即觉得烦躁，但是为了工作又非来不可，事物充满了矛盾。

十二月十一日

到民团考察所见王二，应付了一下。又去见孙军长，亦是应付。我感到他们不相信我，双方都怀着不满，但要忍耐。

十二月十八日 晴 于凉水井

获得一项情报，即着急足送往张广才同志转总部。孙蔚如与胡宗南信使往来频繁，互赠相片和诗词颂扬，使人见之肉麻。旧官场虚伪应酬可恶。胡对孙可谓投其所好，这就是官场现形记。

十二月二十九日

午间友盛来一信，转来陈昌浩政委函一件，系叫我到

① 指孙蔚如密令驻牟家坝团长黄亚藩派人于途中拦截武志平所携带的数担物品至黄团部进行检查的事情。

② 即南郑城。

通江去。这时我正考虑到一个严重的问题要到总部去汇报一下，并提出我的意见。

一 九 三 四 年

一月七日 在通江城

晚间见张国焘，说到我正要到这里来汇报的情况。因为杨虎城、孙蔚如看到国内一些形势的变化，态度上发生了动摇。他们看到察北抗日同盟的失败，又看到最近“闽变”的迅速失败，认为蒋介石的军事力量仍然是不可轻视的。另外，由于蒋介石已隐隐约约的知道了杨虎城和红军有了联系，曾用种种手段给杨施加精神上的压力。这样就使得他产生了疑惧。就是现在的互不侵犯诺言在某种情况下也会被背弃。目前的首要工作，是争取杨、孙等人实践他们的诺言，使东起镇巴，西至宁羌孙蔚如部队担任防务的这一线上不发生战争，以集中兵力打击以刘湘为首的主要敌人。张同意这样看法，并分析了四川军阀部队同陕西杨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关系和杨目前可能采取的行动。这样，就决定再派黄超和我一路去陕南见孙蔚如，巩固过去已有的关系。

一月八日

早，同黄超起身。天气很好。我们在路上交换了一些到陕南如何和孙进行商谈，利用他本身所存在的矛盾作说服他们的意见。

一月十四日

一早乘马出发……进城直奔寓中休息。

梦周告给我一条消息：胡宗南派的特务头目胡抱一住在南郑，表面上是和孙部联络双方事务，实际是蒋介石已侦知杨部和红军有了秘密联系，特派他到南郑来作破坏工作，要我严加注意。

从梦周处出来，顺便去一个熟人处了解了一下胡抱一的历史。他是江北睢宁人，很早就在上海当流氓，是洪帮流氓头安徽人王亚樵的助手。他们包办暗杀事件，王亚樵有杀人公司老板之称。当胡宗南流落沪上时，曾拜在王亚樵门下作小流氓。后来王派胡抱一送胡宗南赴粤入黄埔军官学校，胡大得蒋介石的赏识，成为黄埔系最得意的将领。胡抱一现在就依靠胡宗南，仍为他做特务工作。胡公开职务是胡宗南部的军法处长，是一个极为反动的颇有社会经验的老牌特务。胡到了南郑之后就合王宗山等辈终日狂嫖滥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还由王二给胡找了一个很年轻的小老婆。

一月十五日 在南郑

我早晨告知孙蔚如说，黄超到此。孙带些勉强的表示欢迎。晚间先着王宗山到我寓中接谈。他们仍是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希望红军快一些离开川北去甘肃直接和胡宗南作战。

一月十六日 在南郑

午前和黄到市里走了一趟，买了一些所需的东西，并没有人钉我们的梢。我们刚回到寓中，王宗山又来闲谈一阵。所谈空泛应付。王即约黄超同志和我于晚间到他家里和孙会谈。

我同黄按时到达王寓处……孙少顷即来到，经我介绍黄与之接谈。照例是寒暄一番之后渐渐转入正题。黄首先申述了党和红军对时局的态度，次谈到对杨、孙的期望。孙、王对此并不感什么兴趣，乃频频以红军不宜久居川北为言，毫无新的进展。中间有时涉及一些闲事，尤以王二伪君子的态度使人作呕。在那里吃了晚饭后就回到我的家里。我们研究了一下孙的意向所在，我感到他们的态度比从前更坏，目前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加以巩固，再相机了解其内部情况，因势利导。

一月十八日 在南郑

我们和王二又作了一次比较长时间的谈话，情况无何进展。我为了将物资、文件弄齐，亦不妨和他多谈两次，拖延时间。现在东西已准备好了，我便口头通知孙蔚如，明天黄将起程回川北，孙并没有表示什么。

一月二十日

起床很早……午抵凉水井。

午后，物资全部运到。据说绕道很远，颇不易走。因经天池寺运东西已感不妙了，只好绕道走。适碑坝派人来送信，即写信由来人带回，告知我们于明天去碑坝，并望派人来接物资。

一月二十三日

雪花飘飘，气候较冷。碑坝送来信一件。

张老大娘告给我说：前几天我们都不在这里住，突然有十几个形迹可疑的人，都是商贩打扮。有三四个人背着“背斗”，到我们住的地方说是借火吃烟，进屋即到处乱看。

门外还站着两三个人没到屋里来，亦在屋的四周好象寻觅什么东西。一个人坐在火边的时候衣襟下面露有枪筒。询问他们由那里来，都含糊其词的不作答复。附近群众都不认识他们。停了一时又都往南去了，大家对于这些人从南来，又往南去都觉得可疑。我们对此引起了警惕。

黄超同志回去时，我们已商议妥开辟一条经镇巴至苏区的新交通路线。我致信郑义斋同志，请派负责联络的同志到镇巴以南鱼腹坝会面，并约定了到达的日期。

午后……只身去南郑。

一月二十五日

住南郑……已证实前几天去凉水井的形迹可疑的人果是匪徒勾结川军企图前来刺杀我们。幸我等未在，未遭毒手。

一 九 三 五 年

二月四日

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一。

梦周来告：宁羌于昨夜由红军占领，守军一个团全部被歼灭，团长杨竹荪下落不明，县长白诚斋亦不知去向。

二月五日

梦周来告我：孙军长面色苍白，可见其内心焦急之状。且已分电蒋介石和杨虎城告急，实际是为红军夸张声势，显示自己部队如何勇敢奋斗，均系自欺欺人之谈。

据报：守宁羌的团长杨竹荪已被红军生俘。其于除夕尚脱衣大睡，情况紧急时始仓皇而出，旋即被俘。县长白

诚斋已被击毙。独立团下级军官和士兵有一小部逃回。红军进抵青铺湾，王毅武旅被击溃。孙部自称王为“老虎”，今则真为丧家狗。又谓：王在沔县以东地区曾企图反攻，自带骑兵百余骑向红军冲锋，但很快的就被迎头痛击，狼狈逃回，到城里见孙时面色如土。所有三十八军部队分别集结于南郑、城固、褒城三个城池，企图固守待援，并连电告急。城固由赵寿山任指挥。褒城由耿志介任指挥。南郑城防则由段象武任指挥。

二月六日

红军一部进抵城郊，城内时闻枪声。城里人心惶惶，一夕数惊。

二月十日

王宗山派他的护兵到我寓处问我是否在家。家人给他开门时，他用枪口对着讲话。显然是王宗山告给他说，到我这里来须严防有人藏在我家。他愚蠢的样子使人如见其肺肝。

我坦然出去告诉他：“我在家里，有什么事说吧。”他将枪垂下对我说：“王参议叫我看你是否在家，他要来看你。”

入夜枪声大作。

二月十六日 天阴

上午，王宗山只身来我寓处。见面先说一些客气话，又说曾有人报告我的情况给孙蔚如，说我住处是否要派人监视，孙说你是我们团体中人，虽然没有职务，还应朋友看待，不必顾虑云云。我对他的话没有表示什么态度。他继续又说：“现在红军竟大举进攻陕南，杨、孙为红军的朋

中共
友，虽然多日不通信使，但未改变初衷。如两军相抗，两败俱伤，殊为不智。你能不能把这个意见转给对方，请他们谅解？”我说：“这样事情没有把握，尽我自己的力量则没什么问题，事之成败则不敢必。”当我说话的时候，他急切的期待着我能应允。我说完上述一席话，他眉飞色舞的高兴起来。他答应去为我办通行证。又闲扯一些次要的话，他匆匆忙忙地走了。

过去我曾屡次向孙说宜和红军真诚相见，共同抗日乃是千秋伟业。如果不遇到这样的时机，虽欲立功人民亦属不易。大丈夫应乘机勇断，为人民、为民族立殊功。孙乃认为，察北抗日同盟、福建事变及孙殿英入宁夏之举，均为蒋介石顾此失彼的时机，而红军竟未乘此有大发展，可见力量薄弱……其目光短浅，对面前情况的出现事前亦未能料及。今其称为劲旅之王劲哉^①部亦一触即溃，苦果已亲尝之矣。不知己焉能知彼。殊不知四川军阀已大部焦头烂额，况其军队的质量和数量不如刘湘者乎？

晚间王宗山派人送来出城通行证一张。我自己也弄到空白护照、重要文件和其他东西。最不易携带者却为大型干电池，体积既大且重。

二月十七日 天阴小雨

我出了北门，站在土岗子上望见城墙，我觉得出了那座牢笼似的城，我的生命才真正的属于自己了。自红军进抵城郊后，我每天都准备牺牲，因为坏分子们一句话就

^① 即王毅武。

可以夺去我的生命。我倒不是恋惜生命，而是我认为，我活着就能做一些工作，于革命事业是有利的。我并不害怕，我在家庭里依然谈笑如常。

二月十八日 降雨

到沔县城。

城里遍是部队和其他工作人员，街道贴满了标语，四乡穷苦人民到此来分粮的络绎不绝。先到总政治部询知黄超住处，适吴永康同志亦在此。晚与王树声、周纯全同志等均见面，我将所得的情况谈了一下。

将带来的东西都交给了吴永康同志。我虽然没有问，我猜到副总指挥王树声，总政治主任周纯全以及后勤财经负责人吴永康同志等都在这里，当然这一线的指挥中心就在沔县。

三月五日 天晴

至旺苍坝，住街北一大院落内。此地现为川陕苏区的中心，领导机关多在此。

三月二十二日 天晴（农历二月十八）

几天来军队调动频繁，大部均往西移，陕南方面部队已撤退。宁羌方面胡宗南部队正与红军对战中。

午后移住于街头一座房子里。晚间陈昌浩政委、李特参谋长来，对当前敌人军事方面活动的情况作了一番分析。主要谈到蒋军派王耀武之补充旅、四十九师伍诚仁、六十师陈沛、六十一师杨步飞等部到达后之动向及陕军之态度，并在一起吃晚饭。

三月二十三日

陈昌浩、李特两同志来，预备了比较丰盛的菜饭招待我。已决定我仍回陕南，在敌区活动，并尽可能和桃园寺一带红军部队取得联系。

饭后和陈、李握别即起程。

四月六日 天晴 在南郑

近日来南郑的情况对我日见不利。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之后，我的工作已失掉了对红军联系的意义。其他方面的工作亦难开展。孙蔚如部有即调渭北之消息。我的社会关系在军队里较多，全仗部队里边的关系掩护。

和梦周几次交换意见，他力主我速离南郑。我觉得情况的确不允许我再留下去了。

四月八日 天晴

临行走告梦周、文玉夫妇。他们坚持要不动声色的给我送行。杨法震兄亦赶来相送……他在相送的途中曾谈到，军阀毕竟是军阀，对于用人没有什么道义可言；他用到你，则好言相待，用不到时，则转眼若不相识。既然参与机要，应即以要人相待，今乃如此冷落而去。我则殊不谓然。我认为，我们是为了革命工作，浮名浮利，不过过眼云烟。我所恋恋者乃同志间之情谊。临别不无怅惘之感！

当晚宿褒城。

四月九日

早从褒城河东店起程，登笄头关后，伫望巴山烟树迷离，回忆两年来的工作，颇多留恋，内心里有难于形容的怅惘。晚宿马道驿，即相传萧何月下追韩信处。

四月十日

天色将晓，鸡声高唱，即整行装起程。回想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一次经过此地，忽忽已经两年了。这两年的经历是变化多端的，这在我半生中是值得回味的。我第一次夜宿马道驿时，曾吟过一首诗：

马道驿闻鸡

寒柝报三更，苍茫动客情。
万民犹涕泪，群盗尚纵横。
灯闪烽烟色，鸡鸣鼓角声。
中宵遵党令，缚袴事南征。

对日记的补充和说明

自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农历正月初四日）起，整整的一年日记都遗失了。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我生平好记日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曾间断过。尤其在这一段时间里是我认为最有意义的生活，所以更值得记载下来。遗失了日记我认为比遗失其他任何珍贵的东西都可惜。

在一九三四年春我两次到镇巴察看地形，最后确定了在镇巴西南方向的黎坝和正南的渔渡坝作交通基点。镇巴这一条交通线是迂远的。所以要在这里开辟另一条路线是

为了避开南郑方面的特务侦察。也可以说是一条准备路线。另一个情况是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动用了它们全部的力量，企图组织一次对红军大包围进攻。他们企图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压迫在万源一带地区。川军已部署了一部分军队在嘉陵江沿岸，胡宗南的一部分部队已分布在昭化、广元一线。这仅是我个人的估计，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交换过意见。我认为红四方面军如果将敌人主力吸引到万源、城口一带地区来，敌人的后方补给线就会很困难。由于山深林密，敌人处于外线作战的形势，他们的各个系统平常都是貌合神离，这样就可以利用他们互相观望的情况使红军收得各个击破之效。所以万源这一地区是粉碎敌人进攻的理想地带。在这里能把敌人的阵线拉得很长，还可以摆脱开较强的敌人胡宗南以及蒋军的其他增援部队加入这一战斗序列，使敌人内部产生矛盾。在镇巴开辟一条交通线就是要准备这一情况到来之际，立即可以使用。镇巴和万源地区接壤，交通比较近便。由于镇巴比南郑到碑坝仅在白区就相差六天的路程，有些缓不济急。所以仍然利用旧的基础，采取更秘密的方式，以天池寺以西作主要交通线。自然，在孙蔚如的态度呈现观望，胡宗南已派胡抱一到汉中对孙进行监视之后是有许多困难的，但最后终于使计划部分实现了。在羊圈关以西坚持到六月底，工作又发生了挫折。

一九三四年的六月，由于蒋介石从各方面给予杨虎城施加压力，孙蔚如和其他高级人物以为，这是红军有意识的把十七路军和红军发生联系这一秘密宣扬出去所造成

的，是企图把杨逼上梁山。杨的旅长杨子恒到西安见杨虎城时，曾当面提出这一件事。杨虎城被弄得很窘，当时装作没有听懂杨子恒的话。在主要将领中企图自食和红军互不侵犯的诺言。蒋介石自南昌行营给杨虎城一件电报，这个电报转给了孙蔚如时，我亲自看见了。内容大意是：据密报：有武志平者，自称是三十八军军部参谋，住在羊圈关附近，经常给“共匪”输送军火、汽油等物，仰就近查拿，解南昌行营惩办……这是蒋介石发出的警告。我在孙蔚如处作了许多努力，结果仍没有能够改变他们的畏怯的心理。

陕军十七路军和红四方面军建立统战关系，孙蔚如自开始即怀对红军采取利用之意。在和红军代表徐以新谈判时他即公开说，红军不宜在川北、陕南久停，应该到甘肃去打胡宗南，并说愿给以弹药上的帮助。杨虎城本想给红军帮助一些物资，孙也对我表示过。但当我向之谈到给红军赠送一部分药品时，费了许多周折，才允许开支购药费一千七百余元。并说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徐以新第一次到汉中谈判时，临行之前，我已得到孙的允许，给红军一份四川十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地图，届时又变为只给一部分甘肃南部胡宗南驻军地区的地图。孙不只是口头上说红军应该西进去打胡宗南，还指使他的亲信王宗山（又名王登云）给我写信（附件之三）建议红军西进打通国际路线。孙蔚如口头上对我相信不疑，在暗地里又命令他驻牟家坝的团长黄亚藩在中途将我的行李担拦截到他的团部去检查。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对我进行检查，他又向我道歉说，是下边不认识我，是误会。一九三三年七月下旬，十七路军和红四

方面军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协定一个多月，我从孙蔚如军部外出时，军部大门口守卫的卫兵要检查我的提包。我不允许，卫兵用步枪横阻我不放，双方发生了冲突。事后，我在前方给王宗山写了两封信，说明事情发生的经过。孙蔚如亲笔写信(附件之二)劝慰我，措词乃是虚伪的。待到一九三四年秋，由于蒋介石有电报给杨虎城，要逮捕我。电报转给孙蔚如，孙将原电报给我看了，我即被迫“礼送出境”了。我到达西安，才知道十七路军总部还将原电报通令全军对我进行通缉。从一九三四年秋起，孙蔚如即和红四方面军断绝了来往，并且在镇巴的黎坝十七师张骏京团防区内杀害了红军采购人员陈友盛和一位战士，掠去了一批金钱。待我于同年十月间重回到汉中，孙蔚如对我很不满意，限制我只能在家里闲住，不准作任何活动。由于孙蔚如单方面和红军断了联系，所以他对红军发动的陕南战役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当然，张国焘杀害俘虏孙部团长杨竹荪，也是违反红军优待俘虏政策的。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许多党内同志和社会上民主人士都公开谈到以往从白区给红四方面军送进川、陕、甘等省军用地图和医药器材等军用物资的情况，孙蔚如说全是他送的。孙部下旅长赵寿山也说是他让我送进川陕苏区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当时赵寿山没有让我往川陕苏区送过东西。孙蔚如在当时一方面和川陕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定，另一方面又派他的部下九十七团团长晁广顺带兵进“剿”红军游击队三大队，并俘杀了几位青年革命干部。彼时，三大队活动的地区在汉中北山、秦岭南麓的森林地带。初经建立，力量不大，经不起

一个团的白军武装进攻，又有当地的豪绅地主反动分子为白军作眼线，因之遭受失败。

不久前，七月二十八日《陕西日报》发表余洪远同志（原红四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一篇文章《永恒的怀念》，其中说，孙蔚如除承担红军后方安全的责任外，还给红军送来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如电台、电话机、电线、电池，以及川陕甘三省军用地图），乃系传闻失实。

孙蔚如的亲信王宗山，有一次和我闲谈中很慨叹的说：“共产党是不会受人利用的啊。”这正是透露出他们内心的秘密。

当时使我不解的一件事，是在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协定不久，徐以新不再来了。更可疑的，是从苏区给我送来由徐以新署名的一封信，但不是徐的亲笔。信前说了几句寒暄话，说他调到江口工作，希望我努力做好工作。我不禁发生一种疑惧之感。我意识到徐以新是出了问题。结合我过去听到的有关张国焘独裁滥杀的传说，使我在工作中、在苏区与人的接触中小心翼翼，心怀恐惧。

在我初次进入川陕苏区时，我遇到的同志如傅钟、张琴秋、曾中生、徐以新、苏井观等几位在不同岗位上的负责人，都觉得谈话入情入理，使我受到教育，解除了不少疑虑。我到苦草坝的第二天，张国焘来接见我。首先，曾中生向我介绍，称之为张主席。张微笑着和我握手，然后又和曾握手，以关切的样子问曾中生病情可好转了。我觉得共产党人之间是诚恳亲切的平等的。张和我第一次谈话，首先感谢我带来的军用地图。我向他说明：因为不了

解苏区的情况，所以写信时只知道红四方面军最高领导人是总指挥和政治委员，不知道有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一级，所以没写张主席。张连说“没有关系。”他向我问十七路军的情况，我尽所知一一回答。他似乎很满意，并陪我一起吃饭，谈到白区许多问题。他同意派代表和我一起到汉中和孙蔚如举行谈判。张当时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副主席，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我对他很尊敬。他要我向杨虎城转达他的意见，建议杨在西北造成一股势力，可举宋庆龄、于右任等有社会地位的人士作领袖，以与蒋介石抗衡。这显然是不了解时势的书生之见。我第二次去总部所在地通江以北之辛场坝和张国焘会面时，张对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区的情况很感兴趣。凡是问到他的问题，都尽我所知一一作答。他叫我写出书面材料，我在留住的几天内写了两三万字的书面报告。在报告中，关于几股土著军阀，主要是马步芳、鲁大昌等几股实力较大的军队，以及胡宗南部队的情况说得比较详细。我又将亲自调查过的河西走廊地带的情况，作为甘肃地图的附件交给了曾中生转给军委。我在辛场坝和曾中生、吴永康分别谈话最多最广泛，他们诚挚坦率的态度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使我增加了不少知识。他们在张国焘在场时则保持沉默。在和张国焘谈到青海和河西走廊的情况时，我建议红四方面军应与驻在酒泉的马仲英部新三十六师取得联系。因为他是回族部队的反叛，与马步芳、马步青兄弟都有嫌隙。我向张反复说明这种联系的重要性。

我从红四方面军的军歌中得知被张国焘诬杀许继慎、邝继勋的罪名为“改组派”。歌词中有：“先有许继慎，后有邝继勋，二五减租……”许被冤杀的另一个原因，是敌人伪造了一封诬陷许继慎同志的信，张国焘竟无知的中了敌人的反间计，屈杀了自己的好同志。在鄂豫皖苏区时，有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舒玉璋（当时任军委前方参谋部主任，东北人，留日士官生），为人直爽坦率，坚持原则，颇有才干。曾与张国焘对党内问题有不同意见，进行过辩论，张国焘竟将舒借故杀害。曾中生同志在党内、军内，在苏区群众中都有较高的威信。亦因与张国焘坚持党内原则与之争论，遭张压抑，不予重用，即有名义，亦无实权。在川陕苏区任军委参谋长时，实际等于闲住，我在当时对此毫无所知。红四方面军过嘉陵江西进，将与中央和一方面军会师时，据说，曾中生曾说：“中央到来之后，我可死不了啦”。有人密报给张国焘，曾在卓克基附近被张国焘派人勒死。张国焘还出布告说曾逃跑投敌。这与徐以新同志被关禁保卫局后，造一封假信，用徐以新名义，告我他调往江口工作，是同一阴谋手段。徐到汉中和孙蔚如会谈两次，成绩很好。一九三三年六月下旬和十七路军达成互不侵犯协定，但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在辛场坝即被关押。与此同一天，曾中生同志亦被关押。前此，张琴秋同志从总政治部副主任调后方总医院任政治部主任。罪名都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余天云，原为三十军军长，本为张国焘所重视的干部，不知为了什么原因，被张国焘关进保卫局。余在卓克基地区过一铁索桥时，愤而投水自杀了。白区地下党

象游子盼爹娘一样的投向苏区，向红军汇报工作，请示方针的同志，被张国焘杀害关押者不知凡几。众所周知的廖承志、罗世文、朱光、徐以新等，总算万幸，没被杀掉。杨森部队中地下党负责人段远谋，派其内弟去川陕苏区递送情报，也被张国焘杀害了，这就为段招致许多麻烦。基于以上原因，当一九三三年冬初，中共陕西地下省委派张光远同志去川陕苏区取得联系时，特由常黎夫同志通过杜斌丞先生向孙蔚如说明，由我亲送张光远进入川陕苏区，并在西河口等候迎接张光远回来。所以要向孙蔚如说明，是为了减轻我的责任；由我送去，是为了免被张国焘杀害（张光远同志现在陕西省政协工作）。中央派潘自力同志去川陕苏区，亦是指定由我负责护送，免致“失踪”。张国焘的滥杀恐怖政策，使红军内部也惶惶不安。我亲眼看到红七十三师驻碑坝一个团的团长竟弃职潜逃了。

在辛场坝，张国焘对我说，汉中回军坝一个姓刘的贩香油小商贩，常到苏区碑坝卖油。有人指为白军的探子，驻军曾向张请示，他下令杀掉了。我立即表示赞同。待我路经回军坝时，了解到那个姓刘的小商贩并不是间谍，只是白军问过他碑坝红军的情况，刘含糊其词的随口作答，应付白军。当时苏区缺少油盐，允许小商贩往来，如善于利用还是有益的。张还说，在鄂豫皖苏区俘虏陕西军阀岳维峻时，岳的部下曾几次进入苏区，愿以重金和物资赎回岳维峻。红军曾得到了一些物资。嗣以岳勾结一个理发员向外通消息，被发觉后才将岳杀掉了。张说，有一次敌军于夜间突袭红军驻地，岳维峻大声呼叫：“在这里，在这里。”

因之被杀云云。

在川东领导地下党、游击军多年的王维舟同志，编入红四方面军为三十三军军长之后，张国焘将原属川东游击队的建制过于零散的予以分割。将王维舟调往西北军委当局长，等于投置闲散。这种封建军阀的伎俩，很明显的减消了军队的战斗力。这会使老同志伤心。大吞小，强压弱，在《资治通鉴》里是到处可见的。但马克思主义是绝对不允许的。我在苦草坝，第一次和张国焘谈话，曾表示对共产党人的无限钦敬，对于旧社会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之鄙弃。我说，共产党员都是为了全世界无产者的美好的未来而献身的，决没有个人权利之争，这与旧社会浑然是两个世界。张听了以后，手摸着下颏连连称是。待以后我了解到张的一些独裁、嗜杀情况，我再也不敢提这方面的问题了。

四川军阀各占一片地盘，时常发生掠夺战争。人民饱受痛苦，已被预征钱粮十至二十年不等。拉兵派款，民不聊生。红军入川后，穷苦农民对红军如大旱之望云霓。各个军阀亦想与红军通款。国民党杨森部下旅长兼渠县县长任伟璋，由于他部队内共产党员的推动投向红军，被任为独立师长。许多股匪、民团都投向任伟璋，川北通江北区民团团总徐耀明归附任部，被编为独立团长，另一股匪袁刚编为徐耀明之第二营营长。如果善于利用这些关系，徐图改造，可以减少树立许多敌人，可以利用这股人在白区贩进商品，将苏区土产在边缘地带以物易物，活跃市场贸易，解决红军供应问题。张国焘将任伟璋杀掉了，所属人

员亦多星散，成了红军的敌人。这些地头蛇的危害性还甚于白区的正规军。

国民党十七路军杨虎城、孙蔚如与工农红军建立统一战线关系，能维持达两年之久，在当时形势下，也是不易得的。

国民党十七路军主动向红军建立统战关系之后，杨森也派代表和红军谈判，但这个代表被张国焘杀掉了。刘存厚也派他的参谋长陈钧向红军通款。陈钧将刘存厚部驻防情况大致说了，商议和红军共同攻打另一个军阀的防区（可能是杨森），然后和红军共同分享地盘。当刘存厚的代表满意而去的时候，张国焘便下令向刘存厚防地奇袭，一举攻下刘的全部防地，刘存厚彻底垮台了。他多年搜刮的物资，后方辎重全成了红军的战利品。因为蒋介石阴谋利用“围剿”红军，将嫡系部队开进四川，插手川局，刘湘等探知杨虎城能和红军取得联系，也试图派人通款，由于以上种种情况而畏葸不前了。

军阀相互之间，以及他们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极为深刻，如果能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革命的形势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我第一次在苦草坝和曾中生谈到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对敌人作暂时妥协的政策，签订布勒斯特和约这一问题时，曾很谦虚的对我作了比较详细的讲解。在我和张国焘谈到这一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时，张立即提出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家凯木耳，如何利用苏联的社会主义力量以取得政权，反过来又反对工农土地革命的事实向我作答复。我

和黄超一起去汉中时，黄曾说到张国焘屡次犯错误，尤其在南昌起义（当时称暴动）时所犯错误更大。我听到黄说这些话，引起我的注意。那时，我听说黄是张国焘很接近的人（对郑义斋的评论，也是如此）。尽管他那样说，我则不加可否。

我在通江见到当时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时，感到他很年轻，很精干，我颇钦佩。但感到他骄傲凌人，锋芒外露。有才干，无器识，缺政治素养。他向我问到白区许多情况。我以请教的态度问他革命是否可以搞外交？他说，现在对陕军就是搞外交嘛。我又问是不是把范围扩大一些，他说那要看具体条件……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我在延安学习时，和陈昌浩经常见面，谈话也比较随便。有一次我问他红四方面军和中央及一方面军会师时的情况时，他沉默了一阵之后，对我说，红四方面军曾给中央送去几驮黄金。在谈到河西走廊红军失利的情况时，陈精神很沉重，他也只说了一句，“那是第三国际的建议”。

抗战开始半年以后，我随十七师部队在山西碛口整顿。我听说张国焘被批判后依然代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我特意请假赴延安见他。他首先介绍了他的老婆和孩子和我相见。我和他谈了一些其他问题之后，我问他，我在川陕苏区向他介绍了河西走廊的情况，他是否研究过？另外我于陕南战役之际去前方总指挥部报告敌情时，不知为什么竟被监视？张国焘满不在乎的回答我：“旧账不算……旧账不算。”张于第二天摆了一桌菜饭，邀原红四方面

军老干部数人作陪，招待了我一顿。作陪的人中有陈昌浩、徐以新、张琴秋，其余的我记不起来了。

武志平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五日

附 件：

(一)杨虎城
给武志平的信*

志平参谋弟：

别来日久，殊深驰念。余于上月廿五日平安抵省，祈勿念。值兹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我同志务须深自警惕，力图奋发。吾弟才华卓著，尚希佐理孙军长努力工作，是为至要。此询近佳

杨虎城手启（印）

五、四

* 信是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由王宗山带交给武志平的。隔了两天，我即起程赴川北。信中标点为编者所加。

近誌

努力工作是為重要出詢

楊亮成



志平在諒中 亦外是味味馳念
余于廿五日午抵省祈勿忘宜
亦日感德愛國勢估是凡我同志
務須深自警惕，尚屬披吾中
才華卓著尚希注意孫年長

(二) 孙蔚如给武志平的信*

志平弟鉴：报告及致宗山两函均悉。军部卫兵与弟冲突事，兄始终不知；弟亦太客气，从未一言。此种举动，不惟施之本部官长，应予究办，即施之平人，亦应从严议处，以儆效尤。此等处认为士兵无知，下级官庇兵混蛋则可，至谓有其他意义则不可。弟之所为^①，是兄使之。肝胆相照，当能共谅，他人何能悬揣！即有所推测，亦绝不能认为弟之私举不告兄而遽加凌辱。人生处世，遇有横逆，认为有关大局或私愤难平，则澈予究办，以正不轨；认为无大关系，则以无识而优容之，皆无不可。万不可逐节类推，入於微奥，则因小而失大矣。弟来我部，时近三载。兄已经多次查察，认为慷慨义烈，是团体中后起之秀而尚居於散职者，是团体之习惯。即以兄及寿山、象惠、宗山诸人论，何非数年闲散经过而后渐负责。然此次能任弟负该项重责^②，则已非常比矣。关该兵等，即令查究，以罚其蛮横。望弟无以小故萦念而误大谋。且此等处为人生级〔？〕段中任何人不能幸免者。即兄日前尚受杜荫棠之当面抢白，亦只以笑对之耳。吾弟正在英年，涵养方面，尤当注意。且盛怒之后，总须平心静气，方可处不失宜也。至嘱。顺颂劳祺！

蔚如手启

七. 卅一.

* 这是一九三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孙蔚如就武志平被十七路军军部门口卫兵检查的事情向武志平进行解释的一封信。原信设有标点。

①② 系指孙蔚如派武志平为十七路军代表去和红四方面军进行谈判及负责双方之间联络的问题。

(三) 王宗山给武志平的信*

志平参谋、仁弟英鉴：

来函敬悉，兹答如下：

自闽变发生后，蒋氏壁〔壁〕垒日形动摇。我们刻已联络孙殿英西进，先解决陇南某部。西光兄此刻既不得意于东，可否能与我们协同一致向西北方面进展，作打开国际路线之工作。倘有此决心，吾弟不妨前往谒西光兄一谈究竟，不然互不侵犯〔协定〕两方业已订立，惟宁羌、镇巴方面，彼方常欲窥视，兵戎相见，各有损伤，殊无味也。专此奉复。

敬颂

近康

小兄知名不具

王登云印 十二、廿日

* 这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孙蔚如的参议王宗山（即王登云）根据孙蔚如的指示写给武志平的信。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要武志平去见张国焘，代表十七路军建议红四方面军西进打通国际路线，使红四方面军早日离开陕西。西光是张国焘的代号。原信没有标点，标点是后加的。（）中的字疑为错字、漏字，系编者所加。“王登云印”原来是铅笔写的。

淮南抗日根据地概述

《淮南抗日根据地》编辑委员会

淮南抗日根据地^①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位于安徽省东部和江苏省西部，东起运河，西至淮南铁路、瓦埠湖，北临淮河，南濒长江，津浦铁路贯穿其间，曾是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中枢地区。它南与日本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及汪精卫伪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隔江对峙，北部的蚌埠是伪安徽省省会，东部的扬州、西部的合肥是日军战略据点，皖西的立煌（金寨）县则是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一、抗日战争爆发后淮南地区的形势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江北坚持鄂豫皖大别山区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政治委员高敬亭，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向国民党鄂豫皖督办公署主任卫立煌发出停止内

^① 一九四二年以前称皖东根据地。

战、合作抗日的倡议。双方代表经过谈判，于七月二十八日在安徽省岳西县达成停战协议，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鄂豫皖初步形成。十月二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南京同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将在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坚持革命斗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一九三八年二月，红二十八军和桐柏山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后由戴季英接任)，下辖第七、八、九团和手枪团，共三千一百余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第四支队在高敬亭率领下，于三月初分别从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和河南省信阳县邢集誓师东进。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随即渡江北犯，至一九三八年五月，滁县、蚌埠、合肥、巢县、江浦、和县、含山、全椒、凤阳、定远、嘉山、盱眙、来安、天长、扬州、六合、仪征等县相继沦陷，国民党地方党政机关逃散，土匪蜂起。日军铁蹄所至，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仅在滁县、凤阳、合肥等地即杀害了我数万同胞，在淮南煤矿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万人坑”。不愿做亡国奴的淮南人民同仇敌忾，纷纷揭竿而起，拾起国民党溃军丢弃的成千上万件武器，展开了英勇的抗日斗争。凤阳、定远县的红枪会破坏道路，迎击进犯嘉山县明光镇之敌；抗日将领冯玉祥的亲属冯文华，在中共地方组织负责人张恺帆等帮助下，组织巢县人民抗日自卫军，打击日军，保卫家乡；驻扬州、高邮、天长、仪征一带的陈

文^①部队，积极抗击日军；全椒县组织了抗日自卫军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各地爱国青年纷纷起来抗日。然而淮南人民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活动，多系自发的分散的。为了动员和领导千百万人民进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最后战胜侵略者，早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团决定成立了中共皖中工委，李世农任书记，负责开展无为、舒城、巢县、合肥一带的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派曹云露等人回安徽，在寿县杨家庙组建中共安徽省工委，曹云露任书记（四月改为寿县中心县委）。四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建立中共安徽省工委，彭康任书记，统一领导安徽江北地区党的工作，并组织一大批共产党员参加安徽省抗日动员委员会，组成若干工作团，分赴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动员工作。中共安徽省党的领导机构的建立和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为发动和领导淮南人民抗战，配合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淮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① 陈文，爱国人士，曾接受国民党第五战区苏鲁皖游击指挥部总指挥李明扬委任为第三路军第二团团长。1939年8月遭到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部袭击，被俘杀害。

二、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淮南敌后， 与中共地方党组织互相配合，广 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四月，正当日军侵占淮南广大地区，国民党军队全线向西撤退，江北战局危急之际，新四军第四支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到达淮南铁路两侧及蚌、滁、合地区抗战。五月十六日，第四支队第九团一部于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一部，毙、伤日军近二十名，新四军挺进江北敌后首战告捷。六月，日本侵略军集结合肥，沿安(庆)合(肥)、六(安)合(肥)公路，西攻武汉，连陷十余城，直逼立煌(金寨)。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部退入大别山腹地。新四军第四支队不畏强敌，深入敌后展开抗日游击战争，袭击西犯武汉之敌，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经过数十次战斗，毙、伤、俘日军八百余名，毁日军汽车百余辆。在淮南铁路以东，五月四日，由中共地方党领导的凤阳抗日游击大队，攻入凤阳县城，歼灭伪军守备队，活捉了伪维持会长。五月中旬，新四军第四支队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和皖东地方抗日武装冯文华、张恺帆部合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东北抗日挺进纵队，夜袭全椒之敌，收复了县城。九月，第四支队第八团挺进淮南铁路以东，以全椒县大马厂为中心进行抗日活动。同年冬，第四支队手枪团一部和寿县、合肥地区抗日武装合编为第四支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同第四支队第七团在合肥、寿县、定远一带，开展抗

日游击战争。

新四军第四支队在中共安徽省工委所属组织和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在淮南铁路两侧地区展开，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与江南新四军部队隔江策应，造成深入淮南敌后抗日的有利形势。

一九三八年八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成立中共皖东工委，刘顺元任书记，担负深入敌后开辟皖东工作。一九三九年初，中共皖东工委将党的组织由巢县发展到含山、和县、全椒、定远、凤阳、滁县、合肥等县以至津浦铁路以东。半年之内，发展中共党员八百余名，建立了皖东各县抗日动员委员会工作团，协同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部战地服务团，开展民运工作；在巢县、含山、和县、全椒、合肥、寿县建立了工、农、青、妇等抗敌协会，有会员一万五千人以上。这为开辟皖东工作打下了基础。

为了加强领导，进一步发展江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率军部特务营抵江北第四支队，并往国民党安徽省政府谈判新四军江北部队作战区域和军需给养问题。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华中是我党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区，战略上华中为连接华北、华南的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指出目前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四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原局决

定将皖东工委改为苏皖省委，刘顺元仍任书记。为开辟津浦路东地区，中共苏皖省委决定成立中共津浦路东工委，李世农任书记。五月，又决定组建津浦路东临时前委，由苏皖省委委员方毅任书记，并率朱绍清指挥的由第四支队第八团一部扩编的挺进纵队和第四支队战地服务团挺进津浦铁路以东，在来安、嘉山、盱眙、天长、六合一带进行战略侦察，开展统战工作和发动群众。随后，第八团全部进入津浦路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协助各县建立党的组织。

五月三日，新四军军长叶挺从皖南到达江北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五月五日，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兼任指挥，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兼任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任参谋长，统一指挥江北新四军部队。同时将军部特务营和一九三八年九月编入第四支队的第二游击纵队改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直属江北指挥部指挥。

一九三九年春，国民党安徽省主席、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企图占据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日军手中收复的淮南铁路以西大片地区，令新四军第四支队全部向淮南铁路以东及津浦铁路南段敌后地区活动。为了团结抗战，第四支队遵照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将留驻淮南铁路以西的部队于五月下旬全部移往皖东。

一九三九年六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对第四支队和江北部队进行整编：由徐海东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戴季英任政治委员，林维先任副司令员，下辖第七、第九、第十四团；以原第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组建新四军第五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

治委员，周骏鸣任副司令员，下辖第八、第十、第十五团。部队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和发动群众，初步打开了皖东抗战局面。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县东南藕塘镇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县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苏皖支队奉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的指示，由司令员陶勇、政委卢胜率领渡江北上，在仪征、扬州、天长、六合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中共苏北特委派周爱民等随军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十二月十八日，扬州、六合等地日军二百余人、伪军六百余人合击苏皖支队驻地仪征县月塘集，经激战，毙、伤日、伪军百余人，缴获各种枪支四十余件，获得月塘集战斗的胜利。

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开始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对华作战的策略，将对国民党政府由过去的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并将其主要军事力量由正面战场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因此，华中日军对我皖东地区实行更频繁更残酷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亦加紧反共，实行以军事“剿灭”为主的反动方针，在华中断绝我新四军一切军需给养，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加上在前一阶段由于王明新的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没有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作为依托，我皖东军民在敌、伪、顽的夹击中，处境极为困难。

三、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中原局进入 皖东敌后，在反“扫荡”、反磨 擦斗争中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党的正确路线，批判并基本克服了王明的新投降主义错误，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战区和敌后，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这次会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任书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刘少奇偕同徐海东率中共中央中原局进入皖东敌后，到达定远县藕塘镇附近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直接领导皖东地区的抗日斗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和一九四〇年一月、二月，刘少奇在定远、滁县边界地区召开了三次中共中央中原局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总方针，并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进行大规模军事磨擦的情况，提出了敢于反磨擦的方针，以克服王明新投降主义错误对华中工作的影响，战胜面临的困难。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一九四〇年一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撤销中共苏皖省委，成立皖东津浦路东省委和津浦路西省委，张劲夫（后为方毅）任路东省委书记，刘顺元任路西省委书记。为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和地方武装建设，中共皖东津浦路东和路西两省委将从大别山和皖中国民党统治区撤到皖东的千

余名干部、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分往各县工作，他们在建立和巩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事业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领导下，皖东工作有了新的转变，获得迅速发展。仅三个月时间，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由七千余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由六个团发展到九个团，还组织有五千余人的抗日游击队，津浦铁路两侧的民众抗日组织亦蓬勃发展起来。

从一九三九年冬开始，皖东新四军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在敌、伪、顽的夹击之中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日军出动两千余人“扫荡”皖东津浦路西我抗日游击根据地，国民党安徽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兼第十游击纵队司令李本一丢弃了专员公署所在地全椒县古河镇，率部不战而逃。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徐海东指挥下，积极迎战，粉碎了日军“扫荡”，毙、伤、俘日军一百六十余人，收复全椒县周家岗、古河镇等要地。我为团结友军抗战，遂将古河镇交给了李本一。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一月，罗炳辉率第五支队一部与苏皖支队协同作战，粉碎了日军两千余人对皖东津浦路东天长、仪征、六合地区的“扫荡”，歼敌三百余人。路西、路东反“扫荡”的胜利，进一步打开了皖东地区的抗战局面，给南京日军及准备粉墨登场的汪精卫^①汉奸集团以迎头痛击。

一九三九年冬到一九四〇年春，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华中以皖东为重点，企图强占新四军第四、

^① 国民党副总裁，叛国后于一九四〇年三月在南京组织伪国民政府，任代理主席。

五两支队开辟的皖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截断华北八路军与江南新四军的战略联系。为此，蒋介石迫令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南调江南，阴谋配合日军聚歼之。一九四〇年三月，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制定了围歼皖东新四军及限制“异党”活动的反共方案，并密令李品仙^①、韩德勤调集二十余团的反共大军从东西两面向皖东进攻。在津浦路西，李品仙部于三月初进攻新四军第四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并分三路袭击驻定远县大桥地区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津浦路东，韩德勤乘罗炳辉率第五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西援之机，调集十团之众，于三月二十一日开始猛犯新四军第五支队后方半塔集等地。在皖东危急之际，中共中央指示刘少奇，发动新四军全体官兵和皖东十五个县数百万民众的积极性，坚决击退反共军的进攻，巩固皖东这个战略上极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并急调八路军黄克诚部增援华中。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指挥第四、五支队、苏皖支队、江北游击纵队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派来增援皖东的挺进纵队协同作战，经一个月的苦战，终于将李品仙、韩德勤部击退。七月，我军镇压了国民党顽固派策动的路东屯仓等地反动地主分子的暴乱。七、八月间，皖东抗日根据地向北发展至怀远、凤台一带和洪泽湖以东的江苏省淮阴、宝应地区。八月，华北八路军黄克诚部和皖东新四军张云逸、罗炳辉部会师于淮宝地区，打通了皖东、淮海、苏北地区的联系。

^① 安徽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出《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决定：“刘少奇直接指挥皖东斗争，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化为巩固的根据地，建立政权”。在击退国民党军对皖东我军的进攻后，刘少奇不失时机地指示江北指挥部和中共皖东党组织委任皖东各县县长，建立各级人民抗日民主政权。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七日，在刘少奇亲自指导下，成立了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选派魏文伯任县长。三月到八月，凤阳、滁县、全椒、合肥、和（县）含（山）巢（县）、来安、嘉山、盱眙、天长、高邮、宝应、六合、仪征、淮（阴）宝（应）等县先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四月十八日，成立了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委员会办事处，贺希明、邓子恢先后任主任；八月一日，成立了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委员会办事处，黄岩、魏文伯任正、副主任。路东、路西根据地政令所及人口共二百余万。

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来安县半塔集大田郢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九周年大会，刘少奇作了《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八月十四日，刘少奇在半塔接见华中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又作了重要讲话。这些讲话，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九月五日至十七日，刘少奇、邓子恢、赖传珠指挥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和路东联防部队，在各级党组织、政府和群众的配合下，粉碎了从南京、扬州、蚌埠等地出动的日、伪军一万余人对皖东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的七路大

“扫荡”，毙、伤日、伪军六百余人。这次反“扫荡”的重大胜利，有力地促进了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陈毅曾经指出：刘少奇直接领导皖东军民在反“扫荡”、反磨擦斗争中创建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华中起了先导作用”。

四、坚持路西，巩固路东， 建设淮南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〇年秋，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矛头主要指向新四军。九月，李品仙乘日、伪军大举“扫荡”皖东津浦路东根据地之机，调集第一三八师、第一七二师和第十游击纵队向皖东津浦路西抗日民主根据地进犯。十月十二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命令皖东新四军部队，应速部署向西防御，坚持皖东根据地，并向桂军^①呼吁，反对内战，团结抗日。张云逸一再致电国民党中央政府和李品仙，呼吁停止进攻，团结抗日，结果无效。张云逸、罗炳辉、郑位三指挥新四军第四支队、江北游击纵队^②和第五支队第八团在津浦路西组织防御。江北游击纵队第一团在定远县界牌集英勇自卫反击，取得重大胜利，保卫了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的门户。同年十月，新四军苏

^① 指李品仙率领的广西军。

^② 由于李品仙部进攻，江北游击纵队于一九四〇年四月退出无为，转移到皖东津浦路西。

北部队在陈毅、粟裕指挥下，取得了黄桥反磨擦战役的胜利，狠狠打击了顽固派的反共气焰，对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起到重大作用。

一九四一年一月，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江苏省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军长。全军改编为七个师，江北指挥部所属皖东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张云逸兼任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罗炳辉任副师长，周骏鸣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张劲夫任副主任。下辖第四、第五、第六旅及地方武装。

一九四一年三月，第二师在津浦路西取得又一次反“扫荡”的胜利，并击退了反共军的再次进攻，恢复了津浦路西根据地的基本区。四月，我军在津浦路东发起天长、仪征、扬州地区反点线作战，经金牛山等战斗，歼灭日、伪军八百余人。五月下旬，皖东军民粉碎了日、伪军五千余人对津浦路东的“扫荡”。六月，第二师第五旅在完成坚持淮宝（淮安、宝应），发展淮泗（淮阴、泗县）的任务之后进入皖东北地区，配合新四军第四师作战。

一九四一年五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中共皖东津浦路东和路西两个省委，改为中共皖东津浦路东区党委和中共皖东津浦路西区党委，路东区党委书记刘顺元，路西区党委书记黄岩，两个区党委均由郑位三任书记的皖东党政军委员会领导，从组织上进一步保证党对建设巩固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领导。

从一九四一年起，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进入了新的建设阶段：

军队建设：一九四一年三月，新四军第二师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提出把第二师建成正规化的党军，加强军政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同年在淮南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后改为教导团），在以后的四年间共培养了二千五百多名军政干部，加强了部队建设。一九四二年实行主力地方化，第二师三个旅由九个团缩编为六个团，后又缩编成两个旅四个团，在全区机动执行任务，把主力部队一部分划归地方，成为地方部队的骨干。到年底，全区地方武装发展到八千余人，枪五千九百余支，成为能独立作战的地方兵团。主力地方化以后，形成了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三结合的人民抗日武装体系，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刘少奇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报告中指出：由于二师建立了“各部统一的指挥，重新训练了干部，并使二师各部成为正规的党军；因此，在多次反‘扫荡’和反磨擦的战争中，获得很大的胜利，并使部队有发展，初步建立了地方军；主力军则已经过初步的整训，在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均获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这是值得其他各师学习的。”

政权建设：建立了“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政权领导成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三日至十八日，津浦路东召开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到会议员一百三十名，内有士绅五十名。会上，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主任邓子恢作了

《抗日民主政府一年来施政工作总报告》，通过了法令，选举邓子恢为参议长，朱雨江、赵坚为副参议长，并选举邓子恢为联防办事处主任。二月，颁布了《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九月十八日，津浦路西召开第一届临时参议会，选举魏文伯为参议长，刘子谷为副参议长，童汉璋为津浦路西联防办事处主任，魏文伯为副主任。县、区、乡的政权，也通过层层发动群众民主选举产生，特别是经过改造基层政权，废除了旧的保甲制度，建立了新的乡、村政权。通过“三三制”政权建设，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政权的领导和工农基本群众在政权中优势，又团结了开明士绅和各界人士，对于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经济建设：（一）废除了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生产力。抗日民主政府颁布了“三七分租、二五减租”、“退还押板”，“分半给息”、“老债停息还本”、“借粮还粮、借钱还钱”等政策法规，既要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同时农民也必须交租交息，既调动农民抗日的积极性，也争取了大部分地主共同抗日，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保护与发展工商业，发行货币。打破敌伪经济侵略是抗日民主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于一九四二年六月宣布禁用法币，以法币冲击根据地市场，并企图以伪币侵入根据地，造成通货膨胀。淮南行政公署决定及时成立了淮南银行，发行淮南币，抵制伪币、法币，保护了根据地的经济。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领导群众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发展

贸易，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涌现了华中根据地有名的来安县半塔杨言德合作社和大余郢村骆腾云互助组，形成路西藕塘市、路东铜城市和竹镇市等几个繁荣的经济中心，为坚持敌后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文教建设：文化教育事业按照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方针进行。在干部教育方面，开办了淮南行政学院和津浦路东、路西两所联合中学，以及各种专业训练班。这些学校、训练班，培养了大批抗战建设人才，对淮南根据地的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小学教育也有大的发展，路东地区办了六百余所小学，路西地区办了一百四十余所小学，并在各地开展群众性的冬学运动，举办民众夜校、识字班。文化工作方面，建设了一支十分活跃的有战斗力的文化工作队伍，部队的师、旅和地方各县都建立有文艺工作团(队)。著名的有“抗敌剧团”和“大众剧团”，他们面向工农兵，深受群众的欢迎。淮南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报刊有《新民主报》、《新路东报》(后改名《淮南日报》)、《抗敌报》(江北版)、《淮南大众》、《淮南党刊》等。

群众工作建设：津浦路东、路西各级党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民众抗日运动，建立了工、农、青、妇、文各抗敌协会和儿童团组织。至一九四一年底，津浦路东地区有组织的群众达十七万余人，津浦路西地区有组织的群众达十二万余人。到一九四五年，根据地内的人民群众绝大多数都参加了各抗敌协会组织，在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可靠基础。

一九四二年二月，刘少奇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

总结报告中指出，皖东根据地的工作与华中其他各根据地的工作比较，是最好的，最正规的，已经相当深入发动和教育了群众，大大改善了基本群众的生活，根据地的建设较为巩固，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一九四二年，淮南抗日根据地处于艰苦时期。由于日军频繁残酷的“扫荡”和“蚕食”，以及国民党军李品仙部的进攻，加上严重的旱灾，给淮南军民造成严重的困难，年底，根据地面积缩小到七千二百平方公里。淮南军民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十大政策”^①，坚持对敌斗争，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以克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

一九四二年一月底至二月，新四军第二师击退日军两千余人对淮南津浦路西地区的“扫荡”。同年冬，日、伪军一万余人举“扫荡”淮海、淮北和淮南抗日根据地。其中由明光、滁县、定远等据点出动的日、伪军三千余人向定远地区“扫荡”，被淮南津浦路西军民粉碎。一九四三年，淮南根据地东南边区反日、伪“蚕食”、反伪化斗争取得重要胜利。六月，路东军分区东南县支队在第五旅的第十三团配合下攻克仪征县谢家集据点，解放仪征、江都县二十余乡，新成立了甘泉县，打通了第二师淮南根据地与第一师苏中根据地的联系。八月，第二师第五旅和津浦路东军分区武装协同作战，击退日、伪军一千余人向

^① 十大政策是：第一，对敌斗争；第二，精兵简政；第三，统一领导；第四，拥政爱民；第五，发展生产；第六，整顿三风；第七，审查干部；第八，时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减租减息。

六合县解放区的进攻，在桂子山战斗中，毙、伤日、伪军三百余人。

一九四二年底到一九四三年初，饶漱石、陈毅率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由苏北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盱眙县黄花塘，指挥华中抗日斗争，直接指导和帮助淮南各方面的工作。刘晓、刘长胜、潘汉年率领中共江苏省委机关亦由上海转移来淮南，训练干部，继续领导南京、上海一带城市工作。

为了战胜严重困难，淮南抗日根据地厉行精兵简政，精简机关人员，充实基层。第二师主力部队进行缩编，实行主力地方化，加强地方武装。津浦路东八县合并为盱（眙）嘉（山）、来（安）六（合）、天（长）高（邮）、东南等四个办事处（县）。一九四三年二月，根据华中局指示，淮南抗日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撤销路东、路西区委，统一成立淮南区党委，谭震林任书记，刘顺元任副书记，下辖津浦路东、路西两地委，赵启民、谭希林分别任书记。新四军第二师兼管淮南军区的工作，师长罗炳辉兼任淮南军区司令，谭震林任政委。第五旅、第六旅分别兼管津浦路东、路西两军分区，旅长成钧、谭希林分别兼任分区司令。统一成立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方毅任主任，下辖路东、路西两专员公署，汪道涵、郑抱真分别任专员。区党委和两地委不另设机关，分别与二师师部及两军分区领导机关合署办公。

一九四三年九月，谭希林奉命率第六旅第十六团去第七师工作，撤销第六旅建制。第四旅兼管路东军分区的工作。

作，旅长梁从学兼司令，路东地委书记陈光兼军分区政委；第五旅兼管路西军分区的工作，旅长成钧兼司令，政委赵启民兼路西地委书记。

为了战胜严重困难，淮南军民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热潮，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还开办了织布厂、榨油厂、烟厂、纸厂等。新四军军工部副部长吴师孟带领军工模范吴运铎等二十余人在一九四一年秋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白手起家克服困难，建起了兵工厂，对改善部队装备，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一定作用。第二师一九四二年全年生产收入达两千万元，收获粮食一万三千余石。仅路西的党政机关、联防部队和驻路西的第四旅在一九四二年即开荒七千余亩。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大生产运动，对于克服自然灾害，反对敌人经济封锁，改善军民生活，为反攻做好物质准备起了重大作用。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淮南抗日根据地从一九四二年秋季起，开展整风学习运动。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淮南区党委向全区干部作进一步整风动员，分期分批组织干部到党校、党训班进行整风学习。在整风运动中，领导机关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改进作风，克服主观主义。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在华中局指示和具体帮助下，淮南区党委负责同志刘顺元、方毅、张劲夫、李世农等，分别带领工作组开展农村调查，刘顺元、冯定、方毅、张劲夫等同志还认真写出了调查报告，使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通过整风运动提高了广大干部和共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为克服困难，争取抗

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淮南军民正确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终于渡过难关，获得新的发展。

五、淮南军民为争取抗日战争 最后胜利而斗争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淮南区党委从一九四三年起，加强敌占区工作和城市工作，组建铁路工委和第二师铁路便衣大队，开展津浦铁路南段及两侧地区的工作。同年春，成立淮南交通总站，开辟了通往新四军各师及上海的交通线。一九四四年，淮南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部。

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转向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发动对日军的局部反攻。淮南军民从一九四四年秋季开始，先后攻入盱眙、定远两县城，解放了南京对岸六合县的瓜埠镇，至年底计毙、伤、俘日、伪军一千余人。同年十一月，第二师第五旅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粉碎了日、伪军七千余人对津浦路西地区的“扫荡”，并在定远西南之占鸡岗沉重打击了李品仙部第一七一师的进犯。一九四五年二月，第二师和地方武装在新四军苏中、淮北部队配合下，击退了日军山本旅团等部向高邮湖西部地区的进犯，歼灭日、伪军八百余人，粉碎敌人企图打通淮河交通线的阴谋。四月，我新四军第二师和第三师、第七师一部相配合，在黄瞳庙自卫反击战中，将进犯皖江、淮南津浦路西地区的李品仙部击退，打击了反共军的嚣张气焰。

一九四四年冬，为壮大主力，迎接战略反攻，淮南抗

日根据地掀起大规模的参军运动。第二师重建第六旅和第四旅第十二团。至一九四五年夏，新四军第二师主力发展到三万三千人，组织地方武装一万一千人。一九四五年春，淮南我军发动攻势作战，摧毁日、伪据点，基本上把敌人逼到津浦、淮南两条铁路沿线和一些主要公路沿线及长江、淮河边上的孤立据点以内，扩大了解放区。至七月，淮南抗日根据地基本区面积达两万一千余平方公里，政令所及人口达二百八十万。

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作战。淮南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坚决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向津浦、淮南两条铁路敌、伪据点进击。从八月十一日到二十日，先后收复来安、定远、盱眙、嘉山、天长、六合等县城及广大乡村。八月十三日，争取了伪警卫第三师钟健魂部三千人反正。淮南区党委组织南京工作部，新四军第二师组织南京支队渡江南下，攻克龙潭、栖霞山等地，兵临南京城下，配合新四军第一师准备接收南京。第二师第四旅向滁县进击，第五旅向蚌埠进击，第六旅攻克水家湖，逼近淮南煤矿，独立旅进击长江沿岸，各县独立团（县总队）向本县境内敌伪军据点出击。后因蒋、日、伪合流，我军接收南京、蚌埠、滁县的计划未能实现。九月二日，日本投降。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百年来中国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伟大的胜利，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淮南军民为中华民

族的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在抗日战争中，淮南军民共歼敌两万余人；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淮南解放区已建立了十七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拥有三百三十余万人口，新四军第二师（淮南军区）所属武装力量发展成为近五万人的大军；这是淮南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取得的伟大胜利。

浙东抗日根据地概述

浙江省委党史办公室

浙东抗日根据地，包括四明、会稽、三北（指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姚江以北地区）和浦东四个地区，位于杭州湾两岸，沪、杭、甬之间，东濒东海，南迄东阳至宁波的公路，西跨浙赣路金（华）萧（山）线两侧，北达黄浦江两岸地区，是个战略要地，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十九块解放区之一。

一九三七年冬，上海、浦东各县和浙西杭、嘉、湖地区先后沦陷。日寇对沦陷区大肆烧杀淫掠，人民遭到空前的浩劫。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对抗战采取比较开明态度的有利条件下，浙江地方党抽调干部分赴各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党组织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抗日救亡运动也在全省各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一九四一年四月，日寇发动了宁绍战役，连陷绍兴、镇海、宁波、慈溪、余姚等城。日寇仅用半个多月时间，即占领了杭甬线两侧、杭州湾以南整个地区。当时驻守在宁绍一线的国民党军队不下十几万人，在日寇入侵面前一触即溃。

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我浙江地下党领导人民开展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早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定海沦陷后，中共定海县工委负责人王起等即在东区农村组织了吴谢乡自卫队、东区警察队，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定海东区游击区。镇海沦陷后，县工委在江南组织了王博平、林勃为领导的王贺乡抗日自卫队（后改称江南独立中队）。余姚沦陷后，中共余姚县特派员张光，指派原余姚中心县委委员王益生（赵树屏）到国民党三十四师残部孙彦龙连去工作，并把孙部与缉私营合编为“宁绍游击大队”。朱之光、赵继尧等也积极组织和发展武装，建立了四明游击指挥部独立大队。抗日救亡运动的掀起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作了必要的准备。

“皖南事变”发生后，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在华中作战的战略部署作了新的安排，明确指出：华中指挥中心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地区，即鄂豫陕边地区、江南根据地（包括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苏鲁战区。并且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这是党中央一个新的战略决策。华中局为了贯彻这一指示，决定将开辟浙东、浙西两地工作的任务，暂归苏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负责。同时，又派谭启龙在上海组织闽浙皖赣四省联络站，负责打通同这四个省委的联系。浙江地方党在浙东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后，中共中央根据浙、闽沿海的新形势，

又指示华中局增派干部开展浙、闽沿海的游击战争，准备成立一个战略单位。苏南区党委随即指示中共路南特委要浦东工作委员会组织力量向浙东敌后挺进。

当时，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领导的有两支武装：一支是坚持浦东抗日斗争的“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以下简称淞沪五支队），一支是在伪军十三师二十五旅五十团中由我党控制的一部分力量。根据党的决定，从一九四一年五月开始，浦东武装在蔡群帆、林有璋、朱人俊、方晓、姜文光等率领下，分批南渡杭州湾到浙东。九月十八日，我党控制的伪五十团的近四百人，南渡到浙东后，并取得国民党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简称“暂三纵”）的番号。浦东部队到三北地区共约九百余人。这支部队，成为后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建制的基础。

浦东武装南渡到浙东后，先后与余姚特派员张光、绍（兴）属特派员杨思一和宁（波）属特派员王文祥等建立了横的联系，并立即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六月十八日、二十五日于相公殿伏击日寇，打死打伤日寇十六名，两战两捷。接着游击队各部转战三北，互相配合，互相呼应，又在长溪岭、施公山等战斗中连歼日寇。十月十日、二十二日和十一月，又多次挫败日军。我军的英勇抗战，极大地鼓舞了浙东人民的抗日斗志。

一九四一年十月，由吕炳奎、王仲良（即王耀中）、蔡群帆组成浙东军分会，以吕炳奎为书记，统一领导三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并在“暂三纵”和淞沪五支队第四大队分别组织党的工作委员会。同时，与在三北的国民党薛天白、

顾小汀等部队和地方开明士绅，建立了统战关系。随着敌后人民武装的建立和军事上的不断取得胜利，淞沪五支队第四大队在地方党的支持下，设立了总办事处，并在慈北、镇北先后建立了古窑浦、海甸戎家、龙头场、蟹浦觉渡寺、沈师桥等办事处。“暂三纵”也在姚北先后设立了道路头、长河市、临山等办事处。办事处和武装部队一起，宣传抗日，组织与武装群众，发展抗日力量，征收抗日捐税，解决部队给养。办事处开始部分地执行政权机关的任务，成为后来抗日民主政权的雏型。这时，我军已在三北地区初步站住了脚跟，开辟了三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并由蔡群帆、黄明分别率领部队进入慈（溪）南山区和（余）姚南山区活动。

一九四二年二月，浙江省委机关在温州被国民党顽固派破坏，省委书记刘英等被捕，不久刘英在永康方岩牺牲。四月，华中局即派谭启龙到上海。五月，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历次指示和浙赣战役爆发后浙东地区的形势，确定了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地区的方针：争取有利时机，扩大与发展武装，大刀阔斧地进行工作，创造敌后根据地，广泛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采用多种形式与工作方法达到发展的目的。五月三十一日，陈毅、曾山电令谭启龙“立即去浦东转浙东主持”工作。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旬，日寇发动浙赣战役。当时敌人以十二万余兵力，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连陷诸暨、义乌、金华、衢县、江山，直趋上饶，又一度占领永康、丽水、温州等地，先后侵占二十多个县城。驻守在浙赣路沿

线的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领和士兵，作了英勇抗击。后在国民政府为确保大后方安全，不惜放弃浙赣路沿线的指令下，三十多万军队纷纷撤出防地。不甘做亡国奴的浙江人民，在我党领导下纷纷在当地建立游击队，实行武装自卫。为了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牵制日寇南进，我军二百余人，组成南进支队，在蔡群帆等率领下，于六月六日从余姚游源出发，挺进会稽。中旬，与中共绍属特派员杨思一会合。下旬，在杨思一、蔡群帆主持下，在诸暨枫桥江下村召开了会议，决定以枫桥为中心建立会稽山游击根据地。会后，在枫桥设立了会稽地区的第一个办事处。南进支队转战诸暨、义乌、东阳、浦江、嵊县等地，英勇抗击敌人。

一九四二年六月，谭启龙到三北后，成立了中共浙东行动委员会，谭为书记，统一领导浙东部队的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同时，在三北地区成立中共三北工委，王仲良任书记。七月八日，华中局决定成立浙东区党委，谭启龙为书记。七月十八日，区党委在慈（溪）北宓家埭召开了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扩大会议。会上，谭启龙作了《目前国内形势与我党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报告，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还传达了华中局对浙江敌后游击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发展浙江敌后工作的各项具体政策。接着，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及一师师部所派的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罗白桦、张季伦、张浪、余旭、戈扬等一批干部到达浙东。十二月二日，经

中央批准，区党委改组，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三人为委员，谭启龙仍任书记。一九四三年九月三十日，华中局又同意增补杨思一为区党委委员。浙东区党委的成立，使浙东人民的抗日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并取得抗战最后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

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和浙东的实际情况，浙东区党委确定了“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打击日寇，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总方针，并规定了实行总方针的各项基本政策。这就是：第一，要广泛地团结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人民，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要大力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加强和扩大现有的武装力量。培养有战斗力的坚强部队，广泛组织地方人民武装，这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前提。第三，要执行中央关于党在抗日时期的土地政策的决定：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另一方面要交租交息。第四，要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团结。此外，还规定了财政经济、文化教育、锄奸等政策。浙东区党委关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总方针和各项基本政策的规定，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坚持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九日，经华中局批准，成立了浙东军政委员会。由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连柏生组成，何克希任书记，对浙东部队实行统一领导。同月，在慈北鸣鹤场成立了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由何克希（更名何静）为司令，连柏生为副司令，谭启龙（化名胡志萍）

为政委，刘亨云（更名刘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司令部成立后，统一整编浙东的主力部队为三、四、五支队（简称三五支队）、南进支队、特务大队、新国民兵团、海防中队、教导大队和特务连。共计一千五百一十人（包括各办事处人员）。有轻重机枪三十六挺、长短枪八百七十八支。这支部队是巩固三北和发展四明山、会稽山的基本力量。另外，又派朱亚民等十二人组成一支精干的短枪队，回浦东地区继续坚持斗争，以保持党在上海外围的抗战阵地。

为加强党的领导，区党委对宁波、绍兴地方党作了调整。分别建立了四个地区级的工委，即三北工委、四明工委、三东（包括鄞县、奉化、镇海三县东部地区和定海县）工委和会稽工委。还继续领导浦东特委。不久，各工（特）委改成地委。区党委还组织了敌军工作委员会、海上工作委员会，并将以前各部队的办事处转为地方政权，正式成立“三北总办事处”，王仲良为主任，金如山等为副主任。

当时敌、伪在浙东的主要兵力有：宁波敌警备司令资源平三郎和宪兵司令对田部约千余人，奉化敌警备司令山根和宪兵队长岛营部约千余人，定海敌警备司令河之互之辅部约三百余人，慈溪有三百余敌寇；还有地方杂牌伪军姚华康、霍中柱、关天圩、周侯伯、潘文钧等部。一九四二年八月初，日寇增调谢文达的伪十师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个团，分驻慈、宁、奉一带；丁锡山的伪十三师也调来绍兴一带，向诸暨、嵊县推进，以加强浙东的守备力量，并在宁波、绍兴、三北地区恢复与增设据点。汪精卫

还派要员沈尔乔到宁波建立伪浙东行政专员公署和各级伪政权。同时，日寇对国民党加紧诱降，对三、五支队发动“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乘机加紧找我磨擦。九月五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对浙东斗争方针问题作了指示，指出：日寇退守金华、兰溪后，浙东游击区仍然存在着发展的可能，但不宜抱奢望。我军应坚持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在沿海、山区打下长期坚持游击战的基础。要利用各种矛盾，多交朋友，一切组织工作要注意保持地方性、群众性，埋头苦干，采用隐蔽方式，力求保存与发展自己，达到在浙东保持战略支点的目的。浙东区党委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指示的精神，作出了《关于长期坚持浙东斗争的决定》。区党委还具体分析了三北和四明地区的情况，制订了“坚持三北，开辟四明，在四明山完全占领后，再争取控制会稽山”的工作方针。华中局批准了这个方针，並强调“应迅速取得四明山、会稽山为主要阵地，这是长期坚持的基点。”随后，由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率司、政机关、四支队及教导队，挺进四明，控制了（余）姚南、慈（溪）南的一部分地区；由刘亨云率五支队坚持三北；由林有璋率特务大队和新国民兵团，开辟慈东、慈西地区。

十月间，日寇动员上千兵力，分三路对三北地区进行“扫荡”，遍设据点，到处骚扰，反复搜索，企图消灭三北抗日武装。国民党顽军也配合日寇行动，趁机袭击三北根据地的我军政机关。我军经过蜀山渡、杨葛殿、竹山岙三战三捷，毙伤敌伪百余名，重挫日寇气焰。十一月中旬，我五支队及新国民兵团、特务大队于慈北的宓家埭，伏击

了由慈城出扰的伪十师一个营，将其全部歼灭，俘伪营长以下二百余人。日寇对三北根据地的“扫荡”被我军彻底粉碎。这时，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一千九百多人，並纠集金山、平湖两县的自卫总队和土匪武装王八妹部等，共计三千左右兵力，由艾庆璋指挥，于十月下旬自金山及平湖、乍浦一带南渡杭州湾，分别在临山、段头湾等地登陆，向我慈（溪）北、镇（海）北进犯，妄图将我军消灭在三北沿海狭小地区，气焰十分嚣张。十一月中旬，我通过统战工作，争取了三北的顾小汀、魏显庭和孙云达等部队保持中立。我党为了自卫，决定集中全部军事力量，给艾顽以歼灭性打击。为此，即命令蔡群帆率领南进支队返回四明，诸北八乡抗日自卫大队亦于同时到姚南与司令部、四支队会合。十一月下旬，我军在游源召开了干部会议，研究了情况，部署了作战计划。我司令部率领第四支队、南进支队、诸北八乡抗日自卫大队等渡姚江后，与五支队、特务大队、新国民兵团，集结于游源和樟树庙一带，并进行了战斗准备和动员。

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自十一月二十八日开始至十二月十五日止，我军在地方党和广大群众支持配合下，经周家路、登州街、黄家埠、谢家塘、小越等大小二十九次战斗，歼灭顽军大部，取得了完全胜利。

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的胜利，保卫了三北根据地，锻炼了部队，发展了武装，鼓舞了浙东广大军民，打开了三北局面，使我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南进四明山已无后顾之忧。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一

师师部又派黄知真、陆慕云、陈洪、王胜、邱相田、钟发宗、魏善成、谢飞、徐放、江岚、丁公量、唐炎、黄源、于岩等一批干部，先后到达浙东，加强了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

反“扫荡”战斗和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胜利结束后，我军主力按原定工作方针，于一九四三年初再度挺进四明。为了配合三北地区的反“清乡”斗争，打开四明局面，三支队和特务大队、教导大队，于四月二十二日夜，从晓岭出发，分三路奔袭梁弄。翌晨拂晓发起进攻，经十七小时激战，拔除了梁弄伪军据点，毙、伤守敌伪十师三十七团一营官兵四十余人，俘伪上尉医官、中尉排长以下四十余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五十余支、驳壳枪九支、军用品三十余担。梁弄战斗的胜利，对于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梁弄是四明山的心脏，是向南发展的重要门户，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攻克了梁弄，就控制了整个四明山区。梁弄的攻克，迅速地推动了姚江两岸和四明山地区的政权建设，成立了四明山总办事处。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也先后进驻梁弄和横坎头。四明山根据地初步建立。梁弄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

一九四三年春，日、伪调集两千余兵力，对三北地区进行大规模“清乡”。我五支队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大力开展了反“清乡”斗争，不断主动出击。先后在黄沙湖、郑巷、天元市、三灶等地连战皆捷，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在会稽地区，自南进支队等部队奉调到三北参加反顽

自卫战争后，马青率领十几个伤病员，发动群众，重建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一九四三年四、五月间，诸北抗日武装，又发展到六七十人。十二月，建立了诸北办事处，初步开辟了会稽山抗日根据地。后来又开辟了寿松涛、张子敬等领导的路西游击根据地。

在金属地区，原来在金华东、义乌西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八大队，在成立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在陈雨笠、江征帆、王平夷、李一群等领导下，发展到五百多人。一九四二年十月建立义西乡镇联防办事处，不久，改为金东义西联防办事处。到一九四三年六月，成立了金（华）义（乌）浦（江）抗日自卫委员会办事处，开辟了以义乌西乡吴店为中心的金义浦游击根据地。后来，发展到兰溪北乡，金义浦办事处改称为金（华）义（乌）浦（江）兰（溪）总办事处，根据地也扩大为金义浦兰游击根据地。一九四四年开辟了以义乌北乡为中心的诸（暨）义（乌）东（阳）游击根据地。

在浦东地区，浦东游击队在反“清乡”斗争中，采取隐蔽、坚持的方针，以灵活的游击战术，机敏地打击日寇，保存和发展了自己。

自浙东区党委成立以来，广大军民经过艰苦奋斗，在和日、伪、顽的三角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不仅坚持了三北游击根据地，保存了浦东原有阵地，还初步建立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引起了日、伪、顽的极端仇恨与恐惧，他们互相勾结，加紧对浙东根据地的进攻。

一九四三年十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调集两万余兵力，勾结日、伪，企图消灭浙东抗日武装。形势十分紧张。

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接连发出三次通电，呼吁制止内战，团结抗日，冀挽危局。可是，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疯狂向我进犯，我军被迫奋起自卫。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的蜻蜓岗战斗，揭开了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的序幕。为了有利于开展敌后对敌斗争，我游击队公开树立起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十二月二十二日，新四军军部命令浙东游击武装正式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任命何克希为司令员，谭启龙为政治委员，刘亨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三支队、五支队、金萧支队、浦东支队（后改为淞沪支队）和直属教导大队、警卫大队、海防大队等。这次反顽自卫战争，经历了大俞、东西岙、章家埠、前方等大小九十一一次战斗，持续八个月之久。这个时期是浙东抗日根据地最艰难困苦的时期。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四年夏，日寇也乘机向我浙东抗日根据地进攻。区党委领导军民开展了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在敌人的正面，组织联防，趁敌人尚未站稳脚时，给以有力的打击。敌人深入根据地内设下据点时，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互相配合，困扰敌人，乘机奇袭。还派出武工队深入敌占区进行活动。在四明方面：日寇先后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初和一九四四年五月底，发动两次千人次以上的冬季和春季大“扫荡”，火烧了夏家岭头

和南黄村，一度侵占梁弄、上虞县城等地。在我军民的英勇奋战下，日、伪军被迫撤退。在三北方面：日、伪增筑据点，对三北平原采取“蚕食”政策。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我三支队一部及警卫大队，在镇北筋竹岙全歼伪中警团二营四连四个班。四月十四日，三支队又在慈北宓家埭重创伪中警团二营。六月七日，三支队一、四中队，奇袭伪“舟山警备司令部第四总队部”，全歼敌伪官兵二十八人和日寇少佐顾问吉永久寿秀及伪舟山警备司令部第四总队上校总队长卫文达。六月二十五日，三支队二、四中队在慈东马家桥歼伪十师三营五十二名。八月二十五日，海防大队一中队，在岱山以西大鱼山岛突遭日、伪军进攻，经七小时激战，毙、伤敌八、九十人，我四十二名勇士壮烈殉国。由于三北军民的英勇抗战，日寇“蚕食”阴谋并未得逞。在金萧方面：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墨城湖附近毙、伤伪官兵一百多人。在浦东方面：浦东支队曾攻克奉贤分水墩日、伪据点，歼敌一个中队。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又歼敌五十余名。八月二十二日，浦东支队在南汇朱家店伏击了出扰的四十七名日寇，当即击毙敌寇二十三名，在追击中，又击毙十一名。

我浙东军民，在区党委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伪、顽的进攻，保存了有生力量，坚持了浙东阵地。

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从一九四三年开始，浙东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开展了整风运动。由于浙东地区斗争环境恶劣，战斗频繁，不可能采用集中整风的方法，因而采用分散学习为主，集中训练为辅的整风学习方法。先

在军队营一级、地方县一级以上干部中进行，然后由上而下地全面开展。通过整风，大大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水平，使浙东地区的各级党组织更坚强了，为领导浙东敌后军民坚持抗战，夺取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个时期，区党委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促进了根据地生产的发展，克服了经济上财政上的困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密切了干部和群众及军民之间的关系。区党委根据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了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团结了地方上的开明士绅，郭静唐、吴山民、何燮侯、张志飞等抗日爱国人士都积极支持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浙东的抗战得到了各阶层人士的热情支持和拥护。当时的浙东抗日根据地人才济济。

区党委按“三三制”原则，先后在根据地建立起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在浙东行动公署下，四个地区设立行政专员公署或特派员办事处。十个县设立民主县政府，并建立了六个县级办事处。县以下分设若干区署。区以下为基层的乡保行政机构。各地实行普选，成立区、乡各界人民代表会，以确保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各地普遍组织了工会、农会和妇女会，还成立了浙东总工会筹备会、浙东妇女联合会筹备会、浙东青年联合会筹备会。在经济方面，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实行二五减租。一九四三年，三北基本区就有一百零五个乡减了租，约占全部一百四十一个乡的百分之七十五。同时还规定交租、交息，既

承认地主的地权，又承认农民的佃权。正确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劳动政策，既保证工人和雇工的生活改善，又使资方有利可图，保护工商业。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发展工业生产，推广合作事业。实行了按财产和收入多少征税的合理税收制度，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规定抗日政府的收入为粮赋、货物税。坚持一物一税的统一税制。后来，在一九四五年四月，还创办了浙东银行，发行“抗币”。各根据地还办了不少榴弹所、修械所、被服厂、印刷所、后方医院。在军事方面，在“抗日保家乡”的口号下，组织了民众抗日自卫队、冬防队等民兵组织。许多县、区普遍建立起游击小组，紧密地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在浙东地区建立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形成了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在文化教育方面，贯彻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实行抗战与民主的普及教育，社会教育重于学校教育，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着重激发民族意识，增强抗战胜利信心，培养干部。在横坎头还开办了浙东区党委党校、浙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鲁迅学院浙东分院和各种训练班。并积极开展冬学运动。提倡以普及为中心的新文艺运动，改造民间艺人，改革“的笃戏”，实行男女合演，演出革命现代戏；建立行署社教队、浙东鲁迅文艺工作团、战斗剧团、政治部政工队，演出革命歌舞戏剧。新闻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自一九四二年七月创办《时事简讯》后，于一九四三年五月，由《时事简讯》社试刊铅印《浙东报》。同时还成立了新华通讯社浙东分社。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三日，还

创办了区党委的机关报《新浙东报》。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创办了《战斗报》。日本反战同盟浙东支部也办了一份日文版的《解放周报》。

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民主政府，实行了党在抗日时期的纲领和政策，团结了广大军民，使浙东抗日根据地在斗争中日益发展壮大，屹立于东海之滨。在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在四明山茭湖村成立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连柏生任主席。制订和颁布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草案）。浙东敌后临时行委会的成立及其施政纲领的颁布，使浙东敌后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得以更有计划的进行，从而也加速了各项工作的进程。

日寇在军事上遭到打击之后，对浙东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并对浙东抗日根据地进行野蛮的经济掠夺，以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为了粉碎敌伪的经济掠夺，区党委决定：以武装保卫秋收，反对敌伪抢粮；减轻人民负担，实行“二五”减租；动员和组织党政军民，有计划地、积极地、主动地开展对敌斗争。军民们在“不让一粒粮食给敌人抢走”的口号下，紧密团结，在军事上积极打击敌人的同时，采取了快割、快收、快运、快藏、坚壁清野，使日伪抢不到粮食。反抢粮斗争取得了胜利。

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迅速发展，德国在欧洲的失败已成定局，日寇在太平洋战争中也处于崩溃之中。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向全党和全军发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抓紧时机和积

极地加紧反攻准备的指示。九月二十七日，党中央重申了发展东南的战略方针，决定以新四军主力一部渡江南下，首先向苏浙皖边和浙江沿海发展，尔后视敌人的进攻情况，争取全面控制苏、浙、皖、闽、赣诸省，使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举行战略反攻时，处于有利地位，占领南京、上海、杭州、芜湖各大城市。

区党委为了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作好反攻和大发展的准备，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在慈北洪魏召开了浙东首届军政会议。大会总结了一九四三年二月区党委扩大会议后一年半以来的军政工作，特别是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的经验教训，并对国内外形势及对敌斗争的方针、任务进行了讨论，作出了相应的决定（会议后来移到四明山袁马继续举行，直到十一月五日结束）。

为了把浙东首届军政会议上提出的新任务深入地贯彻到浙东人民群众中去，广泛动员全区人民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在梁弄召开了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在会上，谭启龙、何克希、连柏生分别作了政治、军事和行政报告。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谭启龙代表区党委提出的施政纲领。大会正式选举了浙东行政委员会，以连柏生、吴山民、何克希、张文碧、郭敬唐、王仲良、罗白桦、朱人俊、黄源为委员；产生了浙东参议会，谭启龙为议长，郭敬唐、何燮侯为副议长。大会最后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等八个通电。会后，浙东行政公署正式成立，以连柏生为主任，吴山民为副主任（九月增选王仲良为副主任），罗白桦为四

明分区行政专员，王仲良为三北地区特派员，杨思一为会稽地区特派员，顾复生为淞沪地区专员。为了健全各级政权机构，浙东行政公署对各县、区的行政组织和干部，进行了新的调整和充实，还分别任命了四明、三北、会稽、浦东四地区的各县县长。一九四四年九月，党中央给华中局关于发展苏浙皖地区总方针和部署的指示中指出：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的工作，应视为发展的主要方向。并指示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地区外，中心工作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深入天目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态势。同时，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一师师部，又增派涂峰、徐端，钱刚、周毅、邱子华、汪志华、周瑞球、朱光等一批干部，到浙东工作。同年十一月，党中央又指示华中局和新四军应以南下发展苏浙皖地区为主要任务。毛泽东也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亲自电示浙东纵队，要发展武装部队，扩大解放区，配合盟军驱逐日寇。十二月，经过我党组织做工作，四明山“著匪”王鼎山、单孝升部三百余人被争取过来，后编入四支队；原国民党新昌行动大队在吴泽英率领下，脱离国民党，后到达四明山，被编为四明自卫总队新昌大队。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粟裕根据新四军军部关于江北部队分批南下的部署，率一师三旅陶勇部南下，于次年一月六日与王必成部会合于长兴槐坎仰峰界地区，形成了与浙东根据地打通联系的战略态势。王必成部系新四军一师十六旅，一九四三年秋，该部在王必成、江渭清率领下，自苏南挺进浙西敌后，开辟

了以长兴、广德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三日，华中局奉中央军委电令，决定成立新四军苏浙军区。二月五日，苏浙军区在长兴仰峰芥召开了成立大会。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未到职，由粟裕兼政委），叶飞为副司令员，刘先胜为参谋长，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纵队：一纵队由十六旅改编，王必成为司令员，江渭清为政委；二纵队由浙东游击纵队改编，何克希为司令员，谭启龙为政委；三纵队由第三旅改编，陶勇为司令员，阮英平为政委。四月上旬，叶飞率教导旅自苏中继续南下苏浙边，该部改编为四纵队，廖政国为司令员，韦一平为政委。苏浙军区的成立，加强了对苏南、浙西、浙东地区抗日战争的统一领导。

为贯彻向东南发展的方针，邱清华、周丕振领导的浙南永嘉、乐清地区的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准备北进，建立以括苍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基地。后因形势变化，这个目标没有实现。一九四五年初，区党委派余龙贵去加强领导，担任总队长。

三月下旬，苏浙军区曾多次派部队至富阳、新登地区侦察，预作南渡富春江的准备。五月十日，为配合浙西新四军主力南下，谭启龙等率三支队一部西进。五月二十日，在富阳中埠，与胜利渡过富春江的苏浙军区四纵队十一支队会师。新派到浙东任纵队副司令员的张翼翔等也同时过江会合。不久，苏浙军区对各纵队的任务作了新的部署。四纵队十一支队返回浙西。谭启龙、张翼翔即率所属部队日夜兼程赶回四明山。

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阴谋抢夺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密令顽军进一步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剿”，限制根据地之扩大。顾祝同阴谋对我根据地再次发动第三次大规模的进攻。

此时，驻浙东的国民党田岫山部第三次公开投敌。田部原是国民党杂牌军暂编第三十师所属八十八团，曾先后两次投敌，两次“反正”。浙东游击纵队决定发起讨田战役。六月七日至二十日，取得攻打田岫山老巢的胜利。六月三十日，浙东纵队乘胜解放了上虞城。在我军攻打田岫山的同时，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陈沛和王云沛调集约十个团的兵力向北推进，妄图与日伪遥相呼应，南北夹击，消灭我抗日武装。浙东游击纵队奋起自卫还击，进占章家埠，西渡曹娥江。六月三十日，追击部队进入会稽地区，在西谢、下岙一带，将顽军全部击溃，取得了第三次反顽自卫战争的胜利。

讨田、反顽战争的胜利和上虞城的解放，使四明、三北、会稽三块根据地基本联成一片。不久，浙东区党委和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自横坎头进驻上虞城。上虞城成了浙东抗日根据地后期的指挥中心。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新四军不断取得巨大胜利的影响下，国民党挺进五纵队由张俊升率领于七月十一日投向我军。七月十三日，新四军军部命令张部改编为浙东游击纵队第二旅，任命张俊升为纵队副司令兼二旅旅长，王仲良为二旅政委，张景南为副旅长，徐学道为参谋长，朱人俊为政治部主任。原三、四、五支队

编为第一旅，纵队副司令员张翼翔兼第一旅旅长，纵队副参谋长谢忠良兼一旅参谋长。

苏浙军区在取得浙西第三次反顽自卫战争胜利后，决定四纵队乘胜南进，再渡富春江与二纵队主力会合。准备扫除浙江中部浙赣线两侧敌伪势力，然后大举跃进，联结浙南、以实现打开东南局面的战略意图。四纵队渡江后主力在金萧支队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积极作战，给敌伪以沉重打击。日寇投降后，四纵队主力始奉命北返。

讨田战役和浙东第三次反顽自卫战争取得胜利的时候，国内外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后大反攻的阶段。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浙东纵队根据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向附近城镇日、伪军及伪政权发出最后通牒。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新四军、苏浙军区连续发出了《对日本驻军通牒》和《对伪军伪警及一切伪组织紧急通告》，命令沪、杭、甬等大城市及江浙地区的一切日、伪军及政权机关立即停止抵抗，缴枪投降，违者则以武力解决之。浙东区党委为了迅速缴下敌人武器，于八月十五日成立了以谭启龙兼主任的“动员委员会”，动员浙东解放区一切军民力量，为坚决消灭顽抗的日伪而斗争。

八月十七日，浙东纵队开始对浙东敌、伪发起大反攻。三五支队分头横扫三北的日、伪据点，接连收复周巷、庵东、观海卫、浒山、胜山、五夫、坎墩、掌起桥等。

浙东纵队一旅一部与二旅向鄞西日伪进攻。十七日，

奉化萧王庙伪保安队一个中队全部反正。接着，我军连克鄞江桥、集士港、黄古林、凤岙市、布政市、蜃蛟弄、东新、栎社、庄市等日伪据点，直逼宁波城郊，攻克距城仅三里的西城桥据点。

淞沪支队于十六日攻占上海市郊之北新泾日伪据点。接着攻占南汇县城、新场、祝家桥、六灶、黄渡等市镇。

金萧支队在诸北、诸义东、金义浦兰和路西等地区也向敌伪展开攻击，攻占孝顺、三江口等伪据点。

在不到半个月的时期内，浙东纵队在广大民兵的配合下，除几个主要城市外，基本上消灭了盘踞在四明、三北、金萧、淞沪地区顽抗的日、伪军，使浙东广大地区的人民获得解放。

正当我浙东纵队在大反攻中对日、伪作战取得一连串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在鄞西、浦江等地向我发起进攻。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陈沛率领八十八军，则从天台日夜兼程赶来浙东内战前线。及至九月下旬，国民党正规军好几个师分别向四明、三北和金萧地区的浙东纵队各部进逼。浙东的内战危机十分严重。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等陪同下，到重庆和国民党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为了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真内战、假和谈的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人士的同情，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作了必要的让步，愿意主动撤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八个解放区。

九月二十日，华中局转发中共中央命令：新四军浙东

纵队及地方党、政干部，除留下少数秘密武装人员外，在七天内全部撤离浙东，开赴苏北。九月二十三日，区党委在上虞城（丰惠镇）召开了扩大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北撤的命令和指示，并对北撤后浙东的工作作了具体布置。根据华中局指示，我军开始进行“精兵简政”和收回抗币的工作，准备北撤。为了照顾伤、病、残废人员的生活，区党委决定由朱洪山、黄明等组成新四军浙东纵队留守处，以公开合法的身份与国民党谈判，处理我军北撤后的善后事宜。同时，决定留下刘清扬、邢子陶（不久去苏北）、马青、王起等一批党员干部，领导坚持原地斗争。

九月三十日，浙东区党委、纵队司令部、政治部、浙东行政公署，在上虞召开了群众大会。浙东纵队和党政机关及地方工作人员约一万五千人，在谭启龙、何克希等率领下，从古窑浦到临山的沿海各港口分路、分批渡杭州湾北撤，并散发了《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北撤部队经历了澈浦、南丰等多次激战，击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阻拦、堵击，在苏中新四军和沿途党组织和军民的接应下，渡过长江，进入苏北解放区，至十一月中旬，胜利完成了北撤任务。

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军民的团结战斗，在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谱写了无数曲胜利凯歌。浙东游击纵队在抗战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根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四一年五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底，大小战斗六百四十三次，克复县城南汇、

上虞两座，攻克大小据点一百一十余个，解放同胞四百万（四明、三北二百万，浦东一百万，金萧一百万），毙、伤敌官兵六百一十名，俘敌顾问、军曹以下二十一名，毙、伤伪旅附、团长以下官兵三千零六十二名，俘伪团长、支队长以下五千五百零四人；并缴获了敌人大量的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浙东军民的抗战，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杨福茂执笔）

中国工农红军 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浙江

《抗日先遣队在浙江》征编组

前 言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东北、华北。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但是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坚持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加紧扩大内战的反革命政策。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万军队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五十万人用于进攻中央苏区，采取“步步为营、节节进剿”的方法，在中央苏区周围修筑了三千多碉堡，企图逐步压缩消耗红军有生力量，达到最后消灭红军的目的是。

在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着党中央，他们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央苏区的党和红军的领导，完全摒弃了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原则，始则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继则转为军事保守主义，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至一九三四年夏，中央苏区由原来纵横近千里缩小到各三百余里，敌军不断向我中心地区进逼，形势十分危急。

为了揭露蒋介石卖国内战政策，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打破反革命“围剿”，中央决定抽调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四省进军。中央制订的行动计划是：抗日先遣队由瑞金出发，经福建连城，在闽清以西渡过闽江，然后经古田、浙江的庆元、遂昌，破坏杭（州）江（山）铁路，向浙西挺进，在浙江和皖南地区，创立广大的游击区和新苏区。

红七军团是中央主力红军中一个较新的军团，在实践中逐渐锻炼成为一支英勇顽强的野战部队。出发前，经过补充，军团由四千多人扩大到六千多人，其中战斗人员四千余人。武器严重不足，许多战士背的是梭镖；部队携带宣传品很多，连同后勤炊事用具等达五百多担，给部队行动造成很大的困难。

抗日先遣队内部保持军团体制，由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组成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以粟裕为军团参谋长，刘英为政治部主任。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自瑞金出发至怀玉山失败，经闽、浙、皖、赣四省四十几个县（市）境，历时二百零六天，行程五千六百多里，进行了三十多次的重要战斗。其中经过浙江的有庆元、龙泉、江山、常山、开化、遂安（今并入淳安）、淳安、分水（今并入桐庐）、昌化（今并入临安）八县，基本是三进三出，共计四十四天，并在浙江境内进行了竹口、清湖、大陈、常山、送驾岭、白马、分水、白果、大龙山、徐家村等十几次重要战斗，一度占领庆元，

袭破常山，威胁了杭州。抗日先遣队的行动，揭露了国民党卖国内战的罪行，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掩护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至八月二十六日

七月七日晚，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经长汀、连城、永安，攻占大田县城，经尤溪到达闽中地区。七月三十日占领樟湖坂，渡过闽江，完全进入国民党统治地区。由谷口向东，八月一日夺取水口镇和黄田。在水口“八一”纪念会上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八月七日抗日先遣队按中央关于攻打福州的指示，至福州近郊发起攻城。福州城墙高大，防御工事比较坚固，红军缺乏攻坚装备，九日撤出战斗，经桃源，转移到闽东游击区。十四日抗日先遣队袭取罗源县城。十六日离开闽东，向闽浙边境前进。二十二日攻克穆阳镇，缴获颇多。二十六日，经寿宁西南的平溪、下党、碑坑，至峡头一带宿营。

抗日先遣队刚过闽江时声势很大，敌人惊恐失措。攻打福州后，暴露我军仅是一支人数不多的牵制力量。从此，敌人一直疯狂地围追堵截我军。

八月二十七日

凌晨，抗日先遣队由峡头出发，翻山进入浙江庆元县境，沿荡口、后洋坑、岙里、照田，到达举溪。

闽浙边境的敌军只有浙江保安纵队一团，以一营守福鼎，一营驻寿宁南阳，余留泰顺，各修筑工事堵防红军。

另外，由第四保安分处抽调集训的基干队、军士队各两队，从丽水增援庆元。

抗日先遣队进入庆元后，连续遭到为数甚多的大刀会“法兵”的拦阻。在岙里，红军被迫开枪自卫，毙伤三名，余众惊窜逃散。

举溪是庆元县区公所所在地，敌区长早已逃跑。红军在举溪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分土豪的粮食财物给群众，在墙上写了大量标语口号，宣传抗日救国。

八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

二十八日晨，抗日先遣队向庆元县城挺进。先头部队在小际头击溃敌军士队一个队和“法兵”阻拦，经杨家庄、温岙背抵蒙于时，又击退敌军士队一个队。

午后，红军占领庆元县城。当年庆元大旱，城内正设祭坛求雨，红军进城后，刚好下雨，满城欢喜。有人叨念：红军得天助，将来的天下一定是红军的。

敌四十九师从八月下旬起就一直跟踪“追剿”，这时到达闽、浙边境。浙江保安纵队一团撤福鼎之防，令一个营向庆元急进。浙江保安处令第一纵队第二支队司令杜志成率浙江保安纵队三团（缺一营），由浦城往小梅方向堵截。

二十九日，抗日先遣队在庆元休整，继续做群众工作。

八月三十日至九月一日

三十日拂晓，抗日先遣队由庆元启程，十时许前部抵竹口，大队驻黄坦、新窑一线。

下午，杜志成部队的前部到达培兰亭，遭到红军阻击。

敌又一部向红军坚守的瓦窑山阵地侧后攻击，经激烈战斗，敌伤亡惨重。傍晚，红军后续部队至竹口，从左右两翼组织反击，迅速占领前后岗制高点，形成对敌三面包围之势，敌全线溃逃。

竹口战斗，歼敌近三百人，击毙敌连长四名击伤一名，毙、伤敌排长十余名，击毙县保卫团副团长一名，缴获（含后来搜索的）迫击炮二门，轻重机枪十一挺，长短枪二百余支，红军入浙后首战告捷，声威大振。

三十一日晨，抗日先遣队由竹口向北，经黄田到曹岭和溪对面的龙泉县属小梅镇。

下午，红军在小梅被称为“行宫”的一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会后演“文明戏”宣传抗日。

九月一日，红军在曹岭、小梅休整。据俘虏提供的线索，红军小分队重返竹口，活捉国民党庆元县长张致远，并搜索到一批武器。

九月二日至四日

二日，抗日先遣队由小梅出发，经查田、溪口折向西北，沿南窖、小窖抵八都。

三日晨，红军由八都向西，决定不取龙泉，准备进入闽北苏区。部队经大坦、上洋、木岱、塘上到溪头、坑口。这里地处闽浙边境，山高林密，村子甚小，许多战士露天宿营。

四日，红军从溪头、坑口出发，翻岭到福建浦城的东坑桥、丁长坪、东坑，至党溪、登镇宿营。

九月五日至十一日

五日，抗日先遣队在闽北苏区独立营的接应下，由党溪向西，穿越江（山）浦（城）公路，在鱼梁附近，截击敌运兵汽车一辆，俘敌多人，缴获轻机枪一挺、长短枪二十余支，破坏一段公路和电线，进入闽北苏区。

尾追的敌四十九师慑于我军声威，不敢进逼，在鱼梁一带驻营。

红军在闽北苏区安顿一批伤病员，休整了部队。九日，按中央指示，继续挥师北上，向浙西挺进。

敌四十九师、浙江保安纵队两个团先后到浦城、鱼梁、仙阳和江山二十八都一线，企图堵截红军，在上饶、玉山地区也布置重兵以防抗日先遣队和闽浙赣苏区红军会合。浙西空虚，给抗日先遣队北上造成了有利条件。

曾洪易在艰苦紧张的斗争中，日益暴露出惊慌和动摇，红军抵闽北后，曾要求离开部队。

九月十二日

抗日先遣队避开二十八都，冒雨绕道五显殿穿过江浦公路向东，从浦城的王村，出敌不意跨入江山县境，经岭头、安民关、长滩、徐罗，当夜在东坑口、周村、黄倚一带宿营。

红军进入江山后，一路张贴、散发《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传单，宣传抗日救亡，当地农民要求参加红军的甚多。

九月十三日

清晨，抗日先遣队由宿营地向北急进，翻过大仙岭，经岭底、新山、昭明、东儒、浚溪口、和睦、小清湖，下

午占领清湖镇。清湖是江山仅次于县城的大镇，水陆交通方便。镇上筑有两个碉堡，并有敌保卫团二十余人驻守，很快被红军前卫部队消灭。

国民党江山县长周心万急电求援，浙江保安第一纵队副指挥蒋志英带浙保三、四、六团各一营，由二十八都赶往江山，并以三团一营为前部，坐汽车沿江(山)浦(城)公路直奔清湖。三团一营的汽车离清湖镇不远，遭到红军射击，敌弃车逃至乌沙坂又与红军战斗，毙、伤敌三十余名，烧毁汽车二辆，余敌向江山城溃逃。

红军在清湖没收土豪的粮食等分给群众，镇压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官员和恶霸。

晚，红军在清湖宿营。

洪家云率领的一营红军，在执行破坏交通和烧碉堡的任务后，十二日没有跟上本队宿营。今天进到周村，红军大部队已远去，洪营追不上主力，留在江山浦城两县交界处。活动数天，返回闽北苏区，后编为闽北军分区第三团，坚持在闽浙边境游击。至一九三五年三月，粟裕、刘英带挺进师到闽北，该营归建编入挺进师。

九月十四日

抗日先遣队以部分兵力驱赶路口东侧敌军，并向江山方向警戒，主力由清湖、路口向西北跨浙赣铁路，经荷塘、里坞至鳌头、上王宿营。同时，红军派部队袭击贺村，与补充一旅二团的二营激战，毙、伤敌十几名，破坏该处铁路桥，烧毁汽车、火车各站。

九月十五日

凌晨，抗日先遣队从鳌头、上王出发，经竹子林、上溪、里坂、际上抵大陈。红军一个营和部分工兵侦察兵，从大陈附近向东去炸浙赣路的航头大桥，守桥敌兵逃散，因炸药不够，只炸坏一个桥墩。

抗日先遣队在大陈派出一个团和侦察兵共五百余人，穿过江山、常山之间的狭谷，进入常山的砚瓦山、木绵岭到达程村，隐蔽侦察。

下午，蒋志英率浙江保安纵队四、六团各一个营和补充一旅二团一部从江山出发，经丰足向大陈推进。红军为掩护炸桥部队执行任务，主动出击。双方在丰足西北激烈战斗。红军攻夺镇武山，缴获机枪一挺。傍晚，炸桥部队撤回，从侧翼向浙江保安纵队阵地进击，对敌成三面包围形势。战斗至半夜，红军撤回大陈宿营。

九月十六日

凌晨，进入程村的抗日先遣队一部，穿着国民党保卫团服装，沿常山港西岸道路，向常山城进发。

常山城内共有敌人七百余人守卫。环城设木栅，周围筑有七个碉堡，组成坚固的城防体系。

晨四时许，抗日先遣队化装前进接近常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军士队猛袭。敌惊慌溃退。红军趁势进入城内，沿大街直扑常山县署，另一部从城南水沟的门洞进城，向马鞍山（又名天马山）攻击。

抗日先遣队突入城内的人数不多，三面高地碉堡内敌人不断射击，红军在城内坚持二、三小时后撤出，返回程村口。

在程村口的另一部红军，控制封锁了常山港，俘获从常山向衢州方向逃跑的一批土豪及其家属乘坐的二十余条船只，缴获上万银元。上午八时左右，红军把船只联成浮桥，从大陈过来的红军主力就在程村口凉亭脚下的长圩渡口经浮桥过港，到外港、丁家坞、詹家山、姜家堡一带。

下午三时许，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常山港。常山战斗，共歼敌六十多名。

九月十七日

抗日先遣队侦察队提前向北行动，拂晓时到常山北乡大镇芳村，俘虏了逃在该地的警察巡官等十八名，捣毁敌镇公所。

红军主力，拂晓启程，经阁山底、松香门、双溪口、黄坞岭抵芳村，前部推进到芳村以北的芙蓉。

抗日先遣队突然挺进浙西，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十四、十五两天，连续召开省府委员和保安处参谋长会议，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一面令各县加强自卫，一面令浙江保安团急驰遂安堵防。敌补充一旅、四十九师加速尾追。

中革军委电令先遣队：在未完成破坏杭江铁路及附近公路之前，禁止继续北进。实际上，此时敌人正在从几个方向加速向红军合围，先遣队只得继续向北行动。

九月十八日至二十日

十八日凌晨，抗日先遣队离开芳村，经毛良坞、西岭岗、界牌岭进入遂安县境，击溃县基干队一个分队的阻拦，毙敌分队长等八名，占领白马及附近地区。小部队直逼遂安城侦察，城内之敌惶惶不可终日。

十八日，中央命令：以袭击方法占领遂安城，并确保于我军手中，以此为中心，在浙皖边境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苏区。白马离县城四十公里，位于千里岗山脉北麓，周围丛山峻岭，早在一九三二年间闽浙赣苏区吴先民同志曾到这里从事革命活动，有一些群众基础。抗日先遣队决定暂时驻军白马，了解情况，再行决策。

十九日，红军一部由白马向遂安城方向前进，至衍昌等地侦察了解情况。

二十日，红军离开白马经乳洞山抵上坊。小分队到达离遂安城十余公里的儒洪等地侦察。

抗日先遣队在白马停留期间，恰值“九·一八”事变三周年纪念日，遂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于墙壁上书写标语。

九月二十一日

下午，抗日先遣队从上坊出发，向西经西源、杨家山、谒路山，连续翻过三座大岭，天黑后到达铜山。铜山、白马、上坊呈三角地形，相互距离十五公里左右，这里山高林密、地形险峻，便于隐蔽。

敌四十九师、补充一旅和浙江保安纵队一部陆续到达遂安、开化、常山地区。《东南日报》声称：大军云集，包围之势已成，今日开始“围剿”。扬言三日内将全部消灭我军于白马地区。

九月二十二日

抗日先遣队决定按中革军委指示，在铜山打击进攻之敌。准备消灭敌较弱一路，以各个击破。等了一天，敌军

未来。面临严重敌情，红军处境危殆。决定不顾中革军委一再指责，跳出敌人包围圈。傍晚，抗日先遣队从铜山出发，经夏村、西岭、程店，次日拂晓前全部到达鲁村。

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

二十三日，抗日先遣队在鲁村、塔底休息。敌机在鲁村上空侦察投弹，各路敌人尾追不舍。

二十四日，抗日先遣队继续向皖赣边境转移，经姚家、送驾岭到鲍家、陈村、连岭脚等地休息，一部在送驾岭和钓金山一线警戒。由于追敌较多，傍晚继续转移。

敌四十九师由开化大溪边经横沿、鲁村尾追，补充一旅由争山脚、陈家门经马石桥、洪家坂向鲍家村截击。入夜，警戒送驾岭的红军在两面受敌情况下，从间道撤出，两股敌军在夜里互相扫射，打了一夜。此战，敌死、伤共一百五六十名。

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二十五日上午，抗日先遣队已翻越六十里的大连岭，在安徽歙县石门休息，一部前出到旃田与敌二十一旅四十团战斗。

抗日先遣队在歙县、休宁的深山丛林中，利用三省边境复杂的地形，回转三天。二十七日，再次进入浙江遂安的木瓜、大水坑，经开化港坑抵左溪。二十八日又折转休宁的岭南。

党在这一带群众中经过较长期的工作，闽浙赣红军也曾在这里活动，在群众中有一定基础，红军把一批伤病员留在这里。

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十七日

九月二十九日，抗日先遣队到达皖赣边的段莘地区，距原定最后的目的地皖南已经不远。获知皖南几个县的暴动早已失败。根据当地党组织的意见，红军继续西进到黎痕地区。

皖南和皖赣边，有党的工作基础，又有有利的地形。红军在这里打退了敌军的堵截和追赶，消灭了一部敌军，缴获不少武器，补充了一批新战士，摆脱了在浙西时的困难局面。军团领导决定暂时在这里停下来，开展游击战争。

十月十五日，中央电令红七军团转移到闽浙赣苏区整顿补充。十月下旬，红七军团向闽浙赣苏区转移，经浮梁、德兴之间，通过封锁线，全军三千余人进入闽浙赣苏区的重溪地区。

十一月四日，根据中央指示，红七军团与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成红十军团，对外仍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七军团改编为十九师，红十军及地方武装，分编为二十、二十一师。以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寻淮洲改为十九师师长，刘英为师政治部主任。同时闽浙赣军区的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兼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粟裕任军区参谋长。军团整编以后，十九师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二十、二十一师留闽浙赣苏区，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苏区。

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日

十八日夜，抗日先遣队第十九师在寻淮洲率领下，由闽浙赣边姜李村经上饶的石人殿、白沙，进抵玉山的叶家桥，顺利突破敌对闽浙赣苏区的封锁线，向浙赣皖边前进，抵玉山贛口地区。二十日夜抵常山的草萍，连夜绕道中坊、白石、十五里，向常山城急进。

抗日先遣队第十九师突然出动，出于敌人意料。敌急调杜志成率浙江保安纵队三团到玉山，蒋志英率部由常山至常玉边境堵防。

十一月二十一日

凌晨，抗日先遣队第十九师在先头的侦察队摸到常山城西门边西峰寺一带，由于敌在常山有戒备，侦察队撤回。红军留小部在五里亭、七里岙一带掩护，主力迅速转移，经毛亭、溪滩、山边、过坑、湖石头，越过常(山)华(埠)公路，在湖口北面的浅水地带涉水渡过常山港，经踞家、煤山、源口至大梗一带宿营。

常山城内守敌不敢出城。赵观涛令在玉山协防的浙江保安纵队三团迅回常山，在七里岙与我掩护部队遭遇，战斗一个多小时，红军主动撤出战斗。

十一月二十二日

抗日先遣队第十九师从大梗出发，经彭川、东鲁、才里、达塘，又一次到达芳村，稍事停留，继续北上至芙蓉宿营，后卫在回龙桥警戒。

十一月二十三日

晨，抗日先遣队第十九师由芙蓉向北，经章金，翻越

东岭、西岭，再到白马地区宿营。

蒋志英以浙江保安纵队四团两个营为前队，追红军至回龙桥，与红军后卫部队遭遇。红军凭借有利地形阻击，激战数小时。中午，红军撤出战斗，赶上主力至白马。

红军二经常山，一路上打击土豪劣绅，宣传抗日救国，行动迅速，纪律严明，在群众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红军在灯盏坑留下的伤病员，在群众掩护下，多次避过敌人的搜查。敌恼羞成怒，惨杀群众十余人，全村房屋大部被烧毁，灯盏坑一度变成无人区。红军与人民血肉相联，群众至今仍在传颂。

十一月二十四日

抗日先遣队第十九师在白马附近部署战斗，准备给蒋志英追赶部队以打击。红军小部前出至凤凰山一带警戒，一部占白马西南隔溪高地，主力在里湖、余村后面山沟和东侧山上。

蒋志英以浙江保安纵队四团二、三两营为前队，三团的两个营居中，七团三营（缺一个连）为后卫，向白马推进。近中午，前敌至凤凰山，与红军警戒分队接触。当敌前队向余村、里湖一带土坡推进时，遭到红军猛烈的袭击。战斗激烈，直至天黑。敌撤往常山。红军经乳洞山到上坊地区宿营。

白马战斗，毙、伤敌一百多人，蒋志英和三名连长被击伤，红军缴获一批武器。蒋志英心怯，以后尾追我军时，保持较大距离。

十一月二十五日

抗日先遣队第十九师在上坊休整，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在山村安置了一批伤员。

十一月二十六日

凌晨，抗日先遣队第十九师由上坊出发，经桃林、彭家庄、茅坪、桐川、陈家店。上午七时许，抵安阳坂击溃敌人遂安常备队的阻拦，转向东北进入淳安县境，过程村石岭下抵港口镇。

敌守卫港口的淳安县基干队闻讯逃窜，红军摧毁敌公安分局，俘警长，警士各一名，缴获步枪九支及警服多套。

港口是淳安大镇，交通方便，商业繁荣，地主土豪甚多。红军进占后，逮捕了一批土豪，分发布匹和食盐给群众，并进行了抗日宣传。

十一月二十七日

拂晓，红军利用民船架设浮桥，抗日先遣队第十九师过新安江，继续向北，穿越杭淳公路，翻过施岭，经泗渡洲、渡市、进贤到达桥西宿营。红军逼近临安城，破坏了淳安至建德的公路及电线。

十一月二十八日

抗日先遣队第十九师从桥西出发，经航头、山河村、奎星桥、富山，下午抵临歧。

红军在临歧河滩上召集群众开会，镇压了一批土豪。

十一月二十九日

抗日先遣队第十九师奉令袭击分水，于凌晨从临歧出发，经梅口、新华、何家门里、高峰、鱼塘、叉口、

长田头进至分水县境，继沿探汉岭、小茆坞至合村，离县城二十公里。师部侦察连化装前导，经百岁坊、褚家、花桥、富家、砖山埠、南堡，沿大路向县城急进。

红军侦察连沿天目溪西岸过南堡至五里亭，俘虏在该亭警戒的警察数名，继续前进到距分水不足二公里的山脚边，遭到敌军阻击。红军见敌已有备，迅速撤回，占领南堡以西诸高地，敌也占领大坞头等高地，双方展开战斗。天黑后，红军后撤，师部驻百岁坊，主力在褚家，占领凤凰山、金紫山一带高地，准备打击补充一旅的进攻。敌也不敢追击，以主力固守县城，构筑工事，防红军夜袭。

十一月三十日

敌补充一旅后续部队赶到。下午三时许，敌以笔架山等高地为掩护，向红军金紫山阵地猛攻，战斗激烈，敌发起三次冲锋均被红军击退。天将黑时，红军分三路发起反击，占领笔架山、大墓山阵地。敌败退到富家，以密集火力封锁通向该村的平坦田坂。双方相持到深夜，红军西撤。

分水之战，共毙、伤敌一百三十多名，打掉了敌人的威风。红军西撤后，补充一旅虽仍尾追不放，但与红军保持距离，不敢进逼。

十二月一日

凌晨，抗日先遣队第十九师全部撤到合村，然后向北经水牛塘、天子岙、桥坑进入昌化县境，到青坑口、高桥头等大山岙休息。下午红军继续向西北，经会头湾、柴家、长门头到下八都(湍口)。

红军抵昌化，逼近临安，杭州震动，敌严令浙江保安团、补充一旅加紧追堵。俞济时要求安徽保安团向浙边推进，该团一部车运昌化，加强城防。

十二月二日

拂晓，抗日先遣队第十九师向皖浙边境进发，经石板桥、岔口、葛家、苦竹坪、秀上、江岭、里仁到杭徽公路的横溪桥。在这里红军截获安徽保安团一部即将由昌化回省的情报，决定利用白果乡的有利地形伏击敌人。

由于一红军战士过早开枪，破坏了伏击计划。敌抢占了山头。双方战斗持续至深夜。此战，虽然毙、伤一批敌人，烧毁一辆运兵车，但红军亦有相当的伤亡，牺牲十八人。

十二月三、四日

三日，抗日先遣队第十九师过夏林、同山下、大小石门、火烧舍至浙皖交界处的大山区浙基田阳山和绩溪县的阴山、岭脚下等村宿营。

四日，红军在浙基田地区休息。

寻淮洲率十九师再次进入浙西，摆脱了曾洪易等人干扰。从实际出发，灵活机动，打击了浙江保安纵队，击退了补充一旅的进攻，横扫浙西，威胁杭州，给敌以沉重打击，红军保持主动地位。

十二月五日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

十二月五日，抗日先遣队第十九师进入安徽绩溪县境。六日袭取旌德县城，接着由泾县、宣城之间北上，前锋逼近芜湖。

中央军委指示：根据敌人对闽浙赣苏区“围剿”日趋严重的形势，红十军团立即率二十、二十一师转到外线，同十九师会合，在浙江开化、常山、衢县、遂安之间创立浙皖赣边新苏区。

十一月下旬，方志敏、刘畴西率二十、二十一师经婺源、开化之间和休宁以南北上皖南，十二月十日，与十九师会合于黄山东南的汤口地区。

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在汤口正式整编，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五人组成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为主席，随军团行动。调任粟裕为军团参谋长、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

红军在汤口会合，声势大振。蒋介石于十二月十一日晚上急电调整部署，编组“追剿队”由俞济时指挥，辖四十九师、七师二十一旅、补充一旅和浙江保安纵队一部，分路对我专事“追剿”。浙西、赣东由赵观涛负责堵击，皖南由安徽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刘振华负责堵击。

十二月十四日，红军在谭家桥与补充一旅作战失利，寻淮洲同志英勇牺牲。敌近二十个团的兵力，蜂涌而来。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从十二月下旬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旬，红军在皖浙赣边的泾县、太平（今仙源）、青阳、石埭（今广阳）、黟县、休宁、祁门、屯溪、歙县、绩溪、婺源等十余县地区往返转移，大小十余战，虽给敌以相当杀伤，但因敌我力量悬殊过大，红军处境日趋险恶，只能利用皖浙赣复杂地形，与敌打蘑菇战，未能摆脱被动的地位。

一月七日

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从安徽休宁的上下横源出发，翻越马金岭，经古楼坦、陈村、桃林进入浙江省开化县的西坑口，折转向北，在开化的丰盈坦、龙门下、大麦坞一带宿营，军团部驻余家。

一月八日

凌晨，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从龙门下出发，经外山村进入遂安县境，天亮时，前军抵储家坞，沿大水坑、札源，下午至樟村。

一月九日

凌晨，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向北翻过七百多米高的毛山岗，复经半山、大厦，穿过浙皖交界的洞门，再次进入歙县。因石门有敌军阻拦，红军中途返回，当日在大厦、半山、茶山一带宿营。

谭家桥战斗失败后，鉴于实际教训，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内一部分同志提出适当分兵问题，由正规军转为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当日就上述问题在茶山召开会议再一次讨论，由于军团领导对分兵顾虑很大，最后决定全军南下，经化（开化）婺（源）德（兴）苏区返回闽浙赣苏区。这个错误的决定，是造成怀玉山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月十日

凌晨，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向南转移，再翻毛山岗，经樟村，札坑、东坑口、枫林坞、青岭脚，越青岭进入开化县境。上午，前头部队到大龙山村，发现敌二十一

旅四十一团和四十二团一营，由南向北往大龙山而来，红军立即控制村西南高地，居高临下射击敌人，敌稍后撤，占据地形与红军激战。后来敌一部绕道从高处攻击红军。

下午，红军后撤。经大龙山去闽浙赣苏区的道路受阻，红军由青岭顶山脊小道向东，下山脊后经芭蕉沿山沟荒道，经里、外乘风源向南行进。

在大龙山东南的凹头庙担任掩护的红军一个连（实际只一排兵力），未能赶上已经改道的大部队，奉令单独转移，后在开（化）婺（源）休（宁）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一月十一日

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昨晚整夜行军，经溪滩村、清风岭进入开化县境。连日阴雨，山路坎坷，行军艰难迟缓，至天亮，前部才至江家、高韩，后部尚在溪滩。当日红军到张村、中村宿营。

敌四十九师约一个团下午追至溪滩，大部沿马金溪岸东抵高岭。补充一旅由中洲折转向南至界亭。浙江保安纵队四团抵龙山街、五团到星口。二十一旅由淳安南下。敌情十分严重。

一月十二日

凌晨，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从宿营地出发，计划昼夜兼程，进入化婺德苏区到闽浙赣根据地。部队经石佛岭、篁岸、路口，到焦坑、杨林。

方志敏、乐少华、粟裕、刘英等同志随先头部队行

动。抵杨林时，考虑敌情严重，没有停留，翻山到化婺德苏区，次日并继续前进到靠近闽浙赣苏区的港头。刘畴西率领的军团主力至杨林后，顾虑部队疲劳，就在当地宿营。

敌浙江保安纵队五团连夜从星口向西南急进，十三日晨，超过红军主力赶到王板、徐家村，占领了堵击我军前进的阵地。四十九师和补充一旅向杨林上下庄一线追赶，红军处境危急。

一月十三日

刘畴西率领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主力由杨林进入南华山，经桃花坞、八里坑抵徐家村，与浙江保安纵队五团发生激战。至夜，留十九师掩护，其余爬菜刀岗沿山脊小路向西摸进。

敌“追剿队”全部加速南下，补充一旅进至杨林、东坑口，四十九师向西南插入上、下庄一线，二十一旅从遂安南下马金。南华山受敌三面包围。

一月十四日

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主力早晨抵南华山西面的王山村一带。十九师在徐家村掩护至午后撤出战斗。晚，红军在王山村一带山沟内露营。这里山高天寒，雨雪交加，粮食缺乏，战士疲劳，红军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方志敏、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在港头等待一天，未见主力到来。情况紧急，方志敏一面派人通知刘畴西迅速跟上，一面要粟裕等（包括乐少华、刘英等伤员）带领先头部队连夜冲出敌童（家坊）暖（水）封锁线，准备粮食

于明晚配合地方武装，掩护主力突围。他自己只带十几名警卫人员留下来等待主力。

夜，粟裕等率先头部队在陇首附近冲过敌人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

敌南北两线向西推进，逐步联成包围圈。

一月十五日以后

十五日上午，红十军团从王山村出发，翻山进入江西德兴县的朱张坞，向西朝港头方向开进，在港首附近与敌四十九师遭遇，发生战斗。红军留小部掩护，主力向南往引浆（也称应江）转移。十六日，敌二十一旅四十一团由分水关趋引浆，以优势火力向我突击。红军分兵掩护，大部向西转移。

方志敏同志在港头附近，未见主力到来，即向东进，在引浆找到刘畴西。这时红军已经粮弹奇缺，伤亡不断增加，在雨雪中顽强行军。许多指战员几天来粒米未进，以草根树皮充饥。方志敏立即组织部队向西突围。

十六日，敌四十九师、补充一旅、二十一旅、浙江保安纵队二、五两团和独立四十三旅等，完成对怀玉山区的重重包围。

十七日起，敌向包围圈内“进剿”，红军几次突围未成。二十一师在王龙山地区，十九、二十师在怀玉山北部的冷水坑、玉峰、马山等地，与敌军反复浴血奋战。在敌人不断围攻下，我军被分割、冲散，但仍各自为战，表现了革命战士无比坚定、无限忠诚，誓死与敌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精神。结果除少数同志和刘亨云带一个连突围回到闽浙赣

苏区和皖南地区外，许多战士英勇牺牲。方志敏隐藏在陈家湾与暖水间的山上，至二十九日不幸被敌搜捕。他在狱中，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八月六日，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南昌英勇就义。

结 束 语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浙江活动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四天，但在浙江人民，尤其是抗日先遣队经过的各县人民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红军和白军往往是一前一后经过同一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红军英勇善战，白军贪生怕死；红军对人民亲热和气，纪律严明，买卖公平，白军骄横暴戾，欺压人民；红军所到之处，土豪劣绅丧胆，分粮食等给人民，白军庇护地主恶霸，相互狼狈为奸，残害人民；红军宣传抗日救国，白军污蔑红军，坚持内战。事实教育了人民群众，群众把红军看作亲人，沿途不少群众包括知识分子要求参加红军。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收留掩护红军伤病员，积极为红军带路、抬担架，有的还为此献出自己生命，显示了浙西南地区的人民对人民军队的高尚情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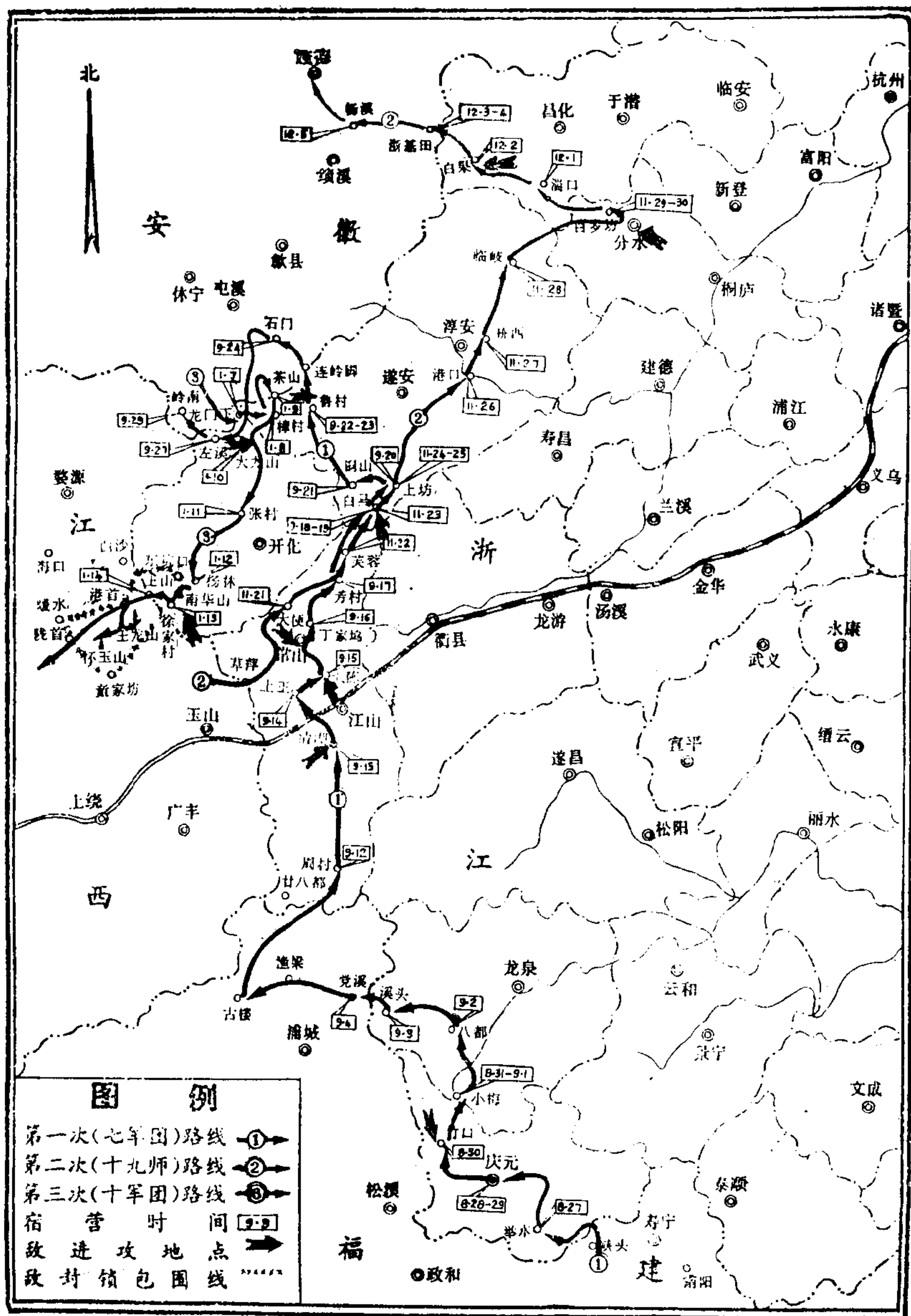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虽然失败了，它沿途留在各游击区的革命种子，依然在闽、浙、皖、赣四省的广大地区，胜利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特别是以先遣队突围人员为主组成的挺进师，在粟裕、刘英领导下，进军浙闽边区，创建了浙西南和浙南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直至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方志敏等许多烈士可歌可泣的事迹，是红军战史中悲壮的一页，永垂青史。

(原载一九八五年《浙江党史通讯》
第五期，本刊转载时略有删节)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浙江活动情形要图

(1934年8月—1935年1月)



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报

凌步机

编者按：《红色中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创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一九三四年十月三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停刊，当时出到二百四十期。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色中华》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从二百四十一期开始复刊，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一直出到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的三百二十四期。从这时起，《红色中华》改为《新中华报》。凌步机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新情况，那就是：《红色中华》在江西中央苏区一九三四年十月三日并未停刊，而继续出版到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文中所提到的继续在江西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的第二四三期、二五九期、二六〇期、二六四期，在陕北复刊的《红色中华》中亦有与这四期序数完全相同的期数，只是出版的时间、内容和出版机关的名义有所不同。由此看来，中央到达陕北《红色中华》复刊时，对在江西中央苏区继续出版《红色中华》这一情况是不了解的。至于党中央离开江西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江西出版的《红色中华》为什么要标明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原因尚不清楚，有可能是为了隐蔽长征（当时叫西征）的军事意图，以迷惑敌人，掩护主力红军突围。

《红色中华》报创刊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以后又改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这份红色报刊在中央苏区到底出刊到何时？有些同志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影印出版的《红色中华》合订本提供的资料，断定《红色中华》在中央苏区只出刊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三日，它在中央苏区的最后一期是第二四〇期。

其实，这个结论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情况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离开中央苏区长征后，《红色中华》报在中央苏区不仅没有停刊，而且继续出版发行到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才被迫停刊。

历史文物是最好的见证。到目前止，我们已看到两期《红色中华》原件。一期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出版的第二四三期。这一期的第一版中，刊载了项英于十月十八日为《红色中华》报撰写的社论《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第四版刊登了红军总政治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六日发布的《号召白军士兵哗变拖枪到红军中来的口号》。当年“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北路总指挥陈诚，从中央苏区搜掠了一张这一期的《红色中华》，后收入他的“石叟资料室”（即“陈诚文库”）中，现已制成微缩胶卷。另一期是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第二六四期。这期《红色中华》报，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现收藏有一张，原件已被火烧去一半，但字迹仍很清晰。这两期的《红色中华》报，和红军主力长征前所出的一样，仍是四开、四版、铅印，报头装帧亦未改变。所不同的是，一九

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出版的第二四三期，仍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而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第二六四期，则标明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报”。除了上述两期以外，我们还在于都县博物馆看到了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出版的第二五九期、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出版的第二六〇期的复制件。其中第二五九期的第一版，在《各地扩大地方武装突击运动的形势》的标题下，分别报道了于都、登贤、瑞西等县扩大地方武装的情况，还发表了题为《严厉纠正阶段论倾向》的评论。第二六〇期第四版，在《各地粮食动员概况》的标题下，分别报道了于都、瑞金、西江、瑞西等县动员群众搞好坚壁清野、贮藏粮食的情况；同时发表了李六如撰写的《各地筹款工作情况》文章。

为详细了解红军主力转移后《红色中华》继续出版发行的情况，我们曾先后访问过当年任《红色中华》编委委员的韩进和袁血卒、张凯、赖绍尧等十余位老同志。据韩进等同志介绍，红军主力长征前，《红色中华》报社原有五个编委委员，即瞿秋白、任质斌、徐明正、韩进、谢然之。红军主力长征时，任质斌、徐明正两人随主力长征了。谢然之兼任中央政府办事处秘书长，被安排在附近农村养病，后来投敌叛变了。《红色中华》报社编委实际剩下瞿秋白和韩进两人，由瞿秋白负责。瞿秋白同志患有肺病。为了使报纸能按时出版发行，他费尽了心血，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加上营养不足，显得更加憔悴。红军主力长征后，

《红色中华》报仍接着原期数编号，每周出版三期，后由于环境恶化，改为每周二期，最后是每周一期。发行对象仍是中央苏区军民，但发行数量减少，最后仅发行三千多份。报纸发行主要靠各级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纸由苏区印刷厂用活字铅印。印刷厂地址在会昌白鹅乡梓坑村的深山密林中，编辑部则设在于都黄麟乡井圪村，两地相距二十多里。由于人员少，稿件主要靠通讯员投稿。报纸的宣传内容，主要是扩红、征粮、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战争、保卫苏区等，后来又以大量篇幅揭露国民党军队侵占苏区后大肆烧、杀、抢掠的罪行，号召苏区人民同敌人斗争到底。为保守秘密，对于红军主力突围长征的消息，《红色中华》始终只字未提。

一九三五年二月，坚持在中央苏区斗争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红军部队，被敌人围困在于都南部狭小地区内，形势十分严重。二月五日和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中央分局发来电报，要中央分局立即改变斗争方式，将机关人员和部队分散到各地去打游击。这时，报纸已不可能再继续出版了。根据中央分局的部署，报社工作人员将机器埋藏后，到了赣南省军区，同赣南省机关部队一道于三月四日从于南地区出发突围。突围中，报社工作人员绝大部分被打散，有的牺牲。瞿秋白同志则在二月上旬末就离开中央分局驻地井圪村，同何叔衡、邓子恢等同志一道，经瑞金武阳往福建长汀突围。后来，他被俘在长汀英勇就义。

红军主力长征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红色中华》

报在中央苏区坚持出版发行四个多月。它大大地激励了中央苏区军民的革命斗志，坚定了广大军民对革命必胜的信心，有效地指导了中央苏区军民的斗争。它在中国革命的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九辑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